

《闽都文化》杂志理事会

理 事 长	练知轩		
执行理事长	林宏修	黄 涛	徐启源
副 理 事 长	林 锋	高 翔	
理 事	卓继辉	陈伙金	林 山
	黄文山	苏 忠	

《闽都文化》编委会

主 任	徐启源		
编 委	汪征鲁	赵麟斌	陈伙金
	卓继辉	林 山	陈章汉
	黄文山		

《闽都文化》总第 99 期 2020 年第 4 期

主 管	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 办	闽都文化研究会 闽都文化研究院

出版单位	《闽都文化》编辑部
主 编	卓继辉
执行主编	黄文山
副 主 编	刘小敏 郭志杰
编辑部主任	曾建梅
编 辑	李铁生 王春燕
编 务 主 任	王 坚
编 务	单 南 何财铭
装帧设计	乔 麦
封面摄影	林登豪
地 址	福州乌山八十一阶 1 号
邮 编	350005
电 话	0591-88302020 88302021
电 子 邮 箱	minduwenhua@163.com
网 址	http://www.mdwhyjh.com/

闽 都 文 化

M I N D U C U L T U R E



敬请关注
闽都文化研究会微信公众号

杂志刊号	CN-35(Q) 第 0093 号
印 刷 厂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	12.00 元

声 明：本刊所发文章、图片未经作者和本刊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刊登。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支付的稿酬已含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作者不同意网络传播，请在投稿时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本期图文资料署名如有疏漏、差错，请与本刊联系。刊物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591-83782241。

P4



何人不起故园情

P45



失语的石头

P48

福清少林寺的前世今生



世味流年

- 4 叶家松 何人不起故园情

闽都世家

- 6 葛兆光 葛家大院纪事
- 14 董山静 烟火刘家
- 18 岱 蒙 马道街古厝
- 24 陈 碧 双韵楼：林寒碧与徐蕴华

纪念沈葆楨诞辰 200 周年

- 27 林 山 沈葆楨与《晚清台湾番俗图》
- 34 陈 绛 信中窥人
——读沈葆楨致吴氏兄弟手札

聚焦世遗

- 40 章 武 海上环游鼓浪屿
- 45 舒 婷 失语的石头

史池钩深

- 48 薛 菁 福清少林寺的前世今生

双塔视野

- 55 江宝章 扑朔迷离南少林
- 93 戎章榕 东渡扶桑谱新篇

Contents

P55



扑朔迷离南少林

P62



乡声

P78

走过康里



百年文档

62 陈岱孙 乡声

福地风采

64 鹿野 清晨的闽江
78 陈守溢 走过康里
90 翁梓健 话说“半旦节”

榕垣旧事

67 潘健 福州万寿江南二桥改建风波
81 江梦笔 恒盛布行拾旧
86 傅振明 五福巷往事

在线读城

72 燕子 满城飘香
——老福州人的文化情结

封面 林登豪 梯田锁农事
封二 郭东健 船政之父沈葆楨
封三 陈章汉 云舒千鹤，海纳百川
封底 吴秋风 青花瓷·剪纸

何人不起故园情

叶家松

我的故乡在福州郊外，那是我生命的摇篮和沃土。离家越久，思乡之情越浓；年纪越大，想家之心越重。

最难忘故乡那弯弯的小河。她是乌龙江的一条支流，乡亲们世代辛勤劳作、繁衍生息，都把她作为母亲河。对河的最早记忆，是跟随母亲到河边洗衣，坐在河畔石头上，津津有味地观赏眼前的一派明媚，柳影婆娑，微波荡漾，水面鸥鸟点点，仿佛仙境。长大一点，这条河便成为儿时

伙伴玩耍的天堂。那个年代，物资匮乏，孩子们所能追逐的，就是绿水青山，蛙声蝉鸣，鱼虾泥鳅，蜻蜓风筝。在大自然怀抱中度这五彩斑斓的童年。再长大一点，每天涨潮时，就要到河里挑水，挑满自家水缸后为邻居挑，那时的心情好极了，感到自己也能为家里做一点事了，很自豪。多少年后，我游览了塞纳河、莱茵河、多瑙河，也领略过亚马孙河的风光，但最令我魂牵梦萦的，还是故乡那条弯弯的小河。看到故乡的河，



便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孩童时代那无忧无虑、不识愁滋味的日子。多少悠长的往事，多少泣血的恋情，多少游子的思念，都维系在故乡的河流之上，涤荡沉淀，留下文明，世世代代地传承。

最牵挂的是故乡浓浓的人情。祖先从河南辗转迁徙而来，在江边聚族而居。那是一个完全的熟人社会，张三李四之间彼此都认识。我在老家辈分很小，遇到年龄稍大一点便称为叔公、婶婆，就是年纪相仿的也得称叔叔、姑姑。有一年老家发大水，两天两夜不退，地势低一点的人家便无法煮饭、睡觉。母亲叫我蹚水把年迈而无子女的叔公、婶婆背到家里来，两天的时间把家里能吃的东西全吃光。虽然那时的生活很清苦，乡亲却都没有埋怨，心里都觉得甜。1967年夏天，我父亲在劳动时摔成重伤，大脑出血，乡亲们七手八脚用手扶拖拉机把他送到省立医院，动脑手术要交400元，而家里却拿不出，乡亲们就你10元、我5元帮忙凑齐了手术费。这两件事让我明白，什么叫守望相助，什么叫金厝边、银乡里。半个世纪的时光流逝，前辈基本都已故去，然而故乡人的音容笑貌却铭刻在脑海中，不能忘记，

也不敢忘记。

最依恋的是家乡厚重的乡土文化。这是因为，在我最初睁开好奇的双眼去认识、理解和感知这个世界时，是故乡厚重的文化给了我滋养、希望和信念。老家虽然够不上“人杰地灵、海滨邹鲁”的美称，但也有一定的文化积淀和耕读传家的好家风，历史上也不乏精通翰墨经略的硕彦名流，这里还诞生过一门双将军。学先贤吐哺之雅量，承先哲修身之真传，成为老家教育下一代的名言。故乡的乡土文化开启了我人生旅程的新起点。故乡把稚嫩的我紧紧拥进温暖的怀抱，让我把根永远镌刻在故土青史间。正是有了故乡厚重的文化根基，才使自己无论身处何地，都无法抹去烙在灵魂深处的故土印记，故乡永远都是我精神的慰藉和心灵的港湾。

乡情是一生解不开的情结，是乡土文脉传承的基因。它把故乡对游子的爱融化在血液中，所以才会有“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惶恐，才会有“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牵念，才会有“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的感叹！



葛家大院纪事

葛兆光

—

从籍贯上说，我是福州人，虽然我出生在上海。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作兴填籍贯，所以我填表也好，办护照也好，各种证件上都写的是“福

建福州”。我父亲葛耀昌（1922-2004），从小在福州长大，虽然大半生在上海、北京、天津和贵州打转，但终究叶落归根，近退休的年龄从贵州回到福州。一直到去世，一辈子操着浓重福州风味的普通话，他算是真的福州人。

葛家在福州著名的“三坊七巷”之一的黄巷



里，有一处老宅。在现在福州的各种坊巷志或者旅游书里，都把它叫作“葛家大院”，也算是一处名胜，这里就是我的老家。我父亲一直很得意地对我们说，葛家大院原来的大门口，有一副对联，写的是“丹井传家远，黄楼卜宅长”，用了东晋道教中人葛洪的典故，说明这是葛家祖上传下来的。但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这个老宅最早是不是葛家的，也许，是我的爷爷或者爷爷的爷爷时买来的。我父亲曾说，早年葛家大院的大门上方还悬挂了“中宪第”，二门还挂有匾额，上书“会魁”二字，可我一直没有查出葛家哪一代有这么好的科举功名。所以，我怀疑这个院子原本是别姓的，只是葛家后来买了下来。但不管怎么说，现在的各种书里，它都叫“葛家大院”。传说中，它还是唐代一个叫黄璞的文人的旧居，传说晚唐黄巢闹事，大军越过仙霞岭，打到福州的时候，因为尊敬黄璞是读书人，下令不得焚烧这里的民宅，它才得以保存下来。但这个故事有几分真实，几分想象，几分编造，谁也说不清。葛家大院毗邻另一个清代名人梁章钜的故居，两个宅子中间有一个“黄楼”，但长期以来，为了黄楼究竟应当归属谁家，葛家和隔壁争执了很多年。

老宅过去确实是阔气过的。据说，左右两边好几大片宅子原来都是葛家，院子里有七口井，一处池子，俗称“七星八斗”，花厅也有山石叠成的假山和雕梁画栋的亭阁，还有一处不小的水池。不过，1979年我第一次回到福州老家的时候，那个大院已经破败不堪，穿过原来很不错、

可已经瘦身再瘦身的天井，七八家人已经把这个有些历史的老宅，分割得七零八落，原本有假山亭囿小池的花厅，也早已经堆满杂物，上面瓦间漏水望得见星星，下面则晴天满是晾晒的衣物雨天满是接水的锅盆。一直要到政府想发展旅游，重建三坊七巷作为旅游的景点，这才重修了大门。今年（2013）夏天我回去看的时候，原来很破败的大门，突然变得古雅堂皇，连我自己也吓了一跳。

二

更有趣的是，在福州一些旅游书上，有一个很吸引人的传说，就是葛家来自古麻刺朗国。古麻刺朗国倒是真的，《明史》卷三百二十三《外国四》说，“古麻刺朗，东南海中小国也”，据说，大概位于现在菲律宾棉兰老岛。明代永乐十五年（1417），中国派了中官张谦去传达天朝诏令，海道遥远，张谦大概在那里待了三年。永乐十八年（1420），麻刺朗国国王幹刺义亦奔“率妻子、陪臣随（张）谦来朝，贡方物”，永乐皇帝就给了他们如同苏禄国王一样的待遇，为他们颁赐了印诰、冠带、仪仗、鞍马等。可惜的是，这个国王回国路上生了病，永乐十九年（1421）死在福建。于是，随同诸臣便留在福州为其守丧，因此寓居在福州，成了这一方人氏，传说中的葛家祖先就是陪臣中的一个。这原来是个故事，真的还是假的？不太清楚，也许，是因为黄巷这里所

谓三大姓“毛、萨、葛”都算是外来人口？萨家过去就是蒙元时代的色目人，传说祖上是雁门萨都刺，元末迁到福建。毛、萨、葛都是以前地方志里应当归入“流寓”的那一类人。

葛家究竟来自哪里？过去，连我父亲也说得不太清楚，但没有疑问的是，葛家原来应该住在福州城外的洪塘国屿一带，我父亲晚年给我写信，说他小时候曾经去国屿的葛家祠堂参加过祭祖。

1990年那里大兴土木，要把过去的坟茔拆掉，曾通知葛家去迁祖坟，我二伯匆匆赶去，一块大碑已经毁坏，另一块小碑很幸运地保存下来，这是一块清代康熙年间的石碑，高约80厘米，宽50厘米，篆文题额为《皇清敕授儒林郎蔚庵葛先生墓志铭》。有了这块碑，我才把祖上的历史渐渐解开。

三

《皇清敕授儒林郎蔚庵葛先生墓志铭》碑文，是一个叫翁煌的人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撰写的，篆额的则是另一个叫林文英的，而书丹的则是自称晚生的蒋晟。据这位翁先生写的碑文说，蔚庵先生也就是我这个祖上，叫作葛煥（1647-1702），字子章，蔚庵是他的别号。给他



作者在葛家大院门前留影

撰文书丹篆额的三位，我没有专门去考察过，不过，看来都有些功名，但我的这位祖上蔚庵公，却好像没有什么太高的地位。根据碑文记载，虽然他的祖先也曾在明永乐年间中进士并督学山左，但后来的子孙却很难跨过科举那道“荆棘之门”，蔚庵公也只是“少攻儒业，卒入成均”，并没有中过进士，据《福州侯官县志·耆旧录》的记载，只是一个监生而已。他可以被写出来夸耀的事情，主要是在当地作了一个有力量的乡绅和有道德的典范。据说，他“素好行善，闻人有义举，必心羨之，曰彼何幸，乃得好事行之？常出镪，为人完聚骨肉，匪直匍匐救丧而已。遇后生寒酸，出贖礼，劝之卒业，往往因而成名”。按照翁煌碑文的说法，“闽中盐政，不至大坏，实先生力也”。但是，我怎么也想不通，一个乡间儒生的善行，与福建的盐政坏不坏有什么干系？不

过，他可能是一个很能干的乡绅，经营了洪江山也就是国屿那一个葛家的基业。据说，他为了家族，先购买了“烝尝田”以防万一，也建造了七世坟地，把两百年来的家族坟地整饬一新。他又害怕老人寂寞，特别在城里买了夏屋，“迎奉入城色养”，不知道这个“夏屋”是不是就是黄巷的这片老宅，如果是，那么这个宅子姓葛，至少也有三百多年了。

碑文里面说到，蔚庵公的先人讳回公，“由永乐进士，督学山左”，既然中过进士，似乎不像是从古麻刺朗国刚刚来的外国人，看来我们追溯上去，还是中国的读书人。一直到蔚庵公葛焕，仍然是“雅喜读书，款延师傅，训诲子侄”，后来，我父亲那一代葛家人，也曾延请了一个本家叔叔做私塾老师，从小就读四书。看来，“丹井

传家远”，不是因为信了葛洪炼丹，而“黄楼卜宅长”倒是因为奉了孔老夫子，能读书的缘故。

四

按照碑文的记载，蔚庵公葛焕，先娶陈氏，续弦王氏，共生有子六女三，陈氏孺人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大梁，蔚庵公去世的时候是“郡廩生”，次子大埏，那时是“国学生”，三子经邦，那时是“郡庠生”，都算是读书人。王氏生了三个，叫大培、大疆、大超，大概蔚庵公去世的时候还小，碑文中没有记载他们的身份。二伯曾经问我，为什么他们的名字中间都用了个“大”字？为什么老三名字又不用“大”字？我也讲不清楚。不过这以后，大梁一系的葛家，则按“元



运开泰，保世滋昌，渊源孝友，欲振家声”这十六个字排辈分，我爷爷是“滋”字辈，我父亲是“昌”字辈，我本应是“渊”字辈，只是到了我这一代，天翻地覆，革除旧习，就再也不按照这个辈分起名字了，只有台湾大伯家的儿子还用



黄巷

这个“渊”字起名儿。

“葛生蒙楚，葳蔓于野”（《诗经·唐风·葛生》），说的并不是葛姓的“葛”而是植物的“葛”，不过，葛藤覆盖荆棘，杂草蔓延遍野，倒也可以用来形容葛姓一族在福州逐渐生根。据我父亲说，蔚庵公之后支脉繁盛，我们就是长房大梁的后人。“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似乎是中国的规律，没有不散的宴席，也没有长盛的家族，除了官方护佑的至圣先师孔家之外。以前，潘光旦先生写《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一书，说嘉兴有长达十几代一直兴盛的家族，代代出人物，这也许是比较少的，潮起潮落，兴兴衰衰，在中国传统时代的乡里很常见。葛家也不例外，蔚庵公之后，虽然家族还算是绵绵瓜瓞，但在仕途上葛家并不太兴旺发达，所以地方志、乡绅录里面也不见记载。

直到我爷爷投笔从戎，当了军人，福州黄巷葛家才好像真的要“重振家声”了。

五

我的爷爷葛滋承（1890？-1952），大概生在19世纪90年代初。在那个中国社会重新洗牌的时代，人的命运很诡异。生逢世道巨变的人，或者从绿茵而辗转泥途之中，沦落下僚，或者鲤鱼翻身跃过龙门，一下子成为人上人，全看运气如何。晚清那个时候，福州马尾办过船厂，办过船政学堂，办过最早的大清海军，黄巷的“毛萨

葛”三家中的萨家，就因为办海军而出了很杰出的人物，这就是既当过大清总理南北洋水师兼广东水师提督，又当过民国初年海军大臣的萨镇冰（1859-1952）。我的爷爷不知道和萨家有什么关系，反正是远亲不如近邻罢，也做了这个大潮里的一个弄潮儿。1922年，当时的海军总长李鼎新派了杨砥中，在马尾成立海军陆战队的统带部，曾经发展很快，在福清、长乐、连江、厦门都有驻军，到1928年编为两个旅，成为福建最重要的军事力量。据说，在我父亲很小的时候，大概20世纪20年代末，爷爷就从营长一直当到了海军陆战队混成旅的副旅长。

这里又有一件有趣的事儿。民国那会儿，也许当官需要资历或学历。我爷爷有学历，号称是“保定军校第六期学员”，算起来，和著名的叶挺、顾祝同、邓演达、薛岳，都是同一级的同学。保定军校原来是清朝北洋速成武备学堂，在民国初年，名声仅次于黄埔军校，也是赫赫有名，1912年到1923年间共有九期学生毕业，里面出了很多战将。很多年以后，我弟弟在美国教书时，特意去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查阅保定军校的资料，发现确实有“葛滋承”这个名字。可是，听我父亲晚年病榻上的叙说，才发现这是一个颇搞笑的故事。原来，我的爷爷压根儿就没去军校读过书，用他的名字去军校的，是他最小的堂弟，也就是我的四叔公。换句话说，我爷爷用了四叔公的毕业文凭，而四叔公却用了我爷爷的考试成绩。

更有趣的是，四叔公学成文武艺回来，却并没有货于帝王家。他毕业的时候是20世纪20年代初，他却压根儿不愿意进入军界做事，原因据说是他发痴一样地爱上了一个女子，就是我后来的四婶婆，为了这个据说很漂亮的女子，他天天待在家中。这也许可以理解，一方面四婶婆当年可能真的很漂亮，1990年我在福州还见过她，从她老年时的相貌，也可以想见她年轻时确实很秀气；另一方面，我猜想是保定军校文凭写的是“葛滋承”，我爷爷凭了这个文凭可以当官，四叔公没有这个文凭，在海军就得从下层干起，从小受宠的他也许不愿意吃苦。所以，他就在我爷爷手下当了一个副官，据说是在庇护下吃干饷，根本不去当差，整天宅在葛家大院里面。不过，或许是因为我爷爷当了官，出钱把黄巷葛家大院又重新整顿一番，弄了好多葛家堂兄堂弟来一起住，就由我奶奶主管家务。顺便说一下，我奶奶叫何红蓉，中医世家出身，在福州也算名门。在我奶奶的主持下，这个时候的葛家大院，似乎又兴旺起来。

我父亲葛耀昌（1922-2004），就出生在这个大院里。

六

父亲是爷爷的第二个孩子，上面有一个哥哥，就是我的大伯，他比我父亲大不少，大学时代在上海学化学。据我父亲说，他上大学时常常

出入舞厅，花钱如流水，差一点儿就娶了上海舞女，被我爷爷严厉制止，甚至威胁要断钱断粮才作罢。抗战后期，听说曾经到遵义火柴厂工作过，后来台湾光复，1945年就去了“台糖”就职。父亲下面有两个妹妹，就是我的五姑、七姑，也都随大哥去

了台湾。我奶奶曾经短暂去过台湾，帮着照料大伯一家和两个姑姑，但1948年为了照顾我爷爷，又回到福州黄巷，此后天各一方，一直到死，再没见过她的这几个子女。他们一直留在台湾，直到20世纪90年代，他们和我父母亲才在香港再次聚首，那时都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据说，后来我的五姑和七姑到福州郊外去祭拜爷爷奶奶，哭得像泪人一样。

说起来，爷爷的四个子女中，父亲排行是老二，但葛家却用大排行。祖父一辈兄弟的孩子统统混算，我的大伯是老大，老二即我的二伯，却是我祖父弟弟的孩子，所以，后来我的堂兄弟们总是把我父亲叫三叔或三伯。父亲出生后葛家家境大概是最富庶的，所以，父亲的童年记忆都是



葛家大院天井

欢天喜地，什么过年大吃大喝，什么福州坐大水的时候在天井划船等。2003年夏天，他胃癌手术住院，我去医院陪护，他还和我兴致勃勃地说起他小时候的读书经历。他先是读私塾，由同宗一个当过云霄县知县的长辈坐馆，教他读四书，这位私塾先生也姓葛，就是祖爷爷之叔伯兄弟，据说很严厉，但父亲是爷爷奶奶宠爱的孩子，我猜想他当时一定学得不好，常常被打手板心，所以后来改弦更张，去读新式的英华学校。据说，在洋学堂里面，他旧学古文算好的，但是新学即数学和英文却不好，不过，英华学校很有名，他总算后来也考取了当时设在上海的暨南大学。

可是，父亲上暨南大学的时候，日本人已经打过来了，暨南大学撤到福建，先在三明，接着在武夷山继续办学。我父亲回忆这一段时光，

最喜欢讲那时暨南大学的三件事。一个是何炳松是校长，不过，尽管何炳松是中国有名的史学家，可我父亲并不学历史，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夸耀的；一个是他的同学里面，后来有一个当过副总理的吴学谦，但吴学谦后来当大官，同学从来也没有联系过，也没有沾过半点光；再有一个，就是他在福州家里带了不少洋钱出来，出来的时候，怕日本鬼子搜查，大洋都绑在腰上，所以，尽管当时山里的暨南大学伙食极差，但他可以时不时拿出大洋在茶馆里吃鸭子，这倒是真的，也符合我父亲那种老饕性格。我曾经开玩笑地问他，是不是那时根本没有好好上课？他也毫不忸怩地爽快承认，他原来上的是法文系，但考试总不及格，于是，二年级转上外贸系，改学英文，好不容易才毕了业，于是一辈子就干了对外贸易这一行。

七

海军陆战队的差事并不好做，抗战时期，海军陆战队很快就丢了船，海军变成陆军，我爷爷随着部队，辗转到了江西、湖北和湖南。1945年，中国抗战胜利的时候，我爷爷正在湖南芷江警备司令部任职，曾经亲历了日军投降仪式。不过，那时他已经厌倦了军旅生涯，就在湖南倒腾了两车药材，辞去了军职回到福州。也因为这个缘故，国共战争的时候他没有参与，1949年后这段戎马历史侥幸没有被追究，直到1952年患病去

世，还算平安一生。

可是，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海关做事的父亲，却被簸弄到巨变之中。海关原本是常言说的“金饭碗”，可1949年前后他却失业了，生活陷入困境。那时，他已经与我母亲结婚，金圆券大贬值，人心惶惶。据说，那时他为了尽快花掉手里的钱，曾经急急忙忙拿一麻袋纸钞，匆匆地抢购了一件英国呢子大衣。尽管有我外公和爷爷两家作后盾，生活不至于无法维持，但是，他心里却很苦闷烦恼。我父亲原本性格就很不安分，福建人的性格也很勇于冒险，于是，在著名的共产党人冀朝鼎的鼓动下，在我出生之前的1949年，他就悄悄跑到已经解放的南京，进入共产党的军政大学学习。按照规定，在1949年10月1日之前参加革命的人，可以享受“离休”即老干部的特殊政策，他也算赶上了这个尾巴。

尽管他一直很想跟随潮流，但潮流却总是在嘲弄他，他一辈子都不得意。

我出生后，父母去了福州，后来又辗转到了北京，又到了天津，我却一直在上海外公外婆家住，福州黄巷葛家，好像与我没有太多关系。但1957年要上小学了，外公外婆下了狠心，让我回到父母身边。于是，我沿着京浦线“咣当咣当”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来到了当时在天津的父母身边。从此，福州黄巷葛家的历史，就开始和我的人生交集，我也从此一点一点地，融入了这个黄巷葛家大院的烟尘往事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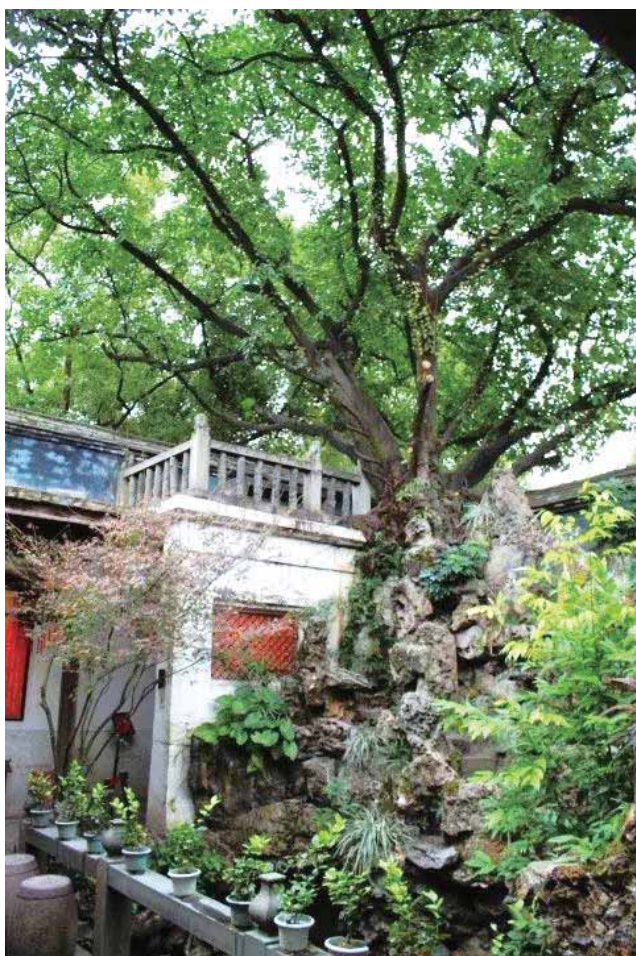
（原载于《今天》，本刊略有删节）

烟火刘家

董山静

当年那一盏盏明晃晃的电灯，照亮了三坊七巷的街巷和院落，也照亮了福州城。历史清晰地记录着刘家大院的曾经。“电光刘”也成为福州一张不曾褪色的城市名片，岁月静好中，述说

着美丽而又略带伤感的往事。刘家客厅前假山的小池、池里悠游的锦鲤、客厅两旁透着灵秀的窗棂，还有那曲线优美的风火墙，仍旧神闲气定。当年郁达夫就曾在刘家大院的锦屏轩，品味过这



里的诗情画意，且留下难忘的记忆。

一

故事从1983年那场全国烹饪大赛说起。闽菜大师强木根做鸡汤氽海蚌，端上评委桌时，服务员将灌在开水壶中的鸡汤氽入碗中，海蚌入口时，绝大部分评委都被这道美味所征服，一时愣怔无语。只有溥杰当场站起来说：“这道菜我50年前吃过，当时刘家厨子郑大水是皇帝的御厨，我陪同吃到，今天又尝到了，真是太好了。”美味也会让时间停留。

2019年夏天，中央电视台拍摄《家乡至味》时，曾专门介绍过刘家大院的“电光刘”私房菜，系由聚春园佛跳墙第八代传承人杨伟华主勺，再现当年让人津津乐道的“电光刘”家族菜肴。道道美食记录里，显现当时的生活风貌与人情世故。熟悉的味道在舌尖舒展，“电光刘”家宴里的闽菜，既有浓郁的家国情怀，还有挥之不去的乡愁。乡愁包含对家乡至味的思念，无论游子在外闯荡多少年，即使口音变了，但故乡的美味，依然沉埋心间，一旦唤醒，便是一幕幕对于故乡的美好记忆。

“电光刘”的家宴中有一道名菜叫茉莉石鳞腿。从这道菜的由来，就可以看到刘家长辈对子女的爱。当年刘家有位大小姐经常生病，身体虚弱。刘家的厨子就提议把石鳞（石蛙）煮汤给大小姐吃。没想到大小姐听说桌上这道菜是石蛙

煮的，怎么劝说都不吃。因为在大院里面，时常会见到青蛙在假山一带捕捉昆虫，所以小孩子觉得这么可爱的动物，不能把它吃了。厨子左思右想，想出了一个办法，用饮食雕花工艺把这个石鳞的后腿雕刻成茉莉花，然后再下锅烹煮。当这道汤再次上桌时，大小姐很是欢喜地说：“茉莉花做成的汤真好吃呀！”中医里讲到肺主皮毛，不妨适当吃一点属性偏凉滋阴的食物。石鳞称得上是上等食材，可除肺火，增强免疫力。其肉质鲜美柔嫩，富含矿物钙铁磷锌等元素，还有丰富的蛋白质以及各类维生素，因此具有保健功效。常常食用石鳞，小孩子的骨骼会更健壮。

二

郁达夫在《饮食男女在福州》一书中写道：“福州的食品，向来就很为外省人所赏识，前十余年在北平，说起私家的厨子，我们总同声一致的赞成刘崧生先生和林宗孟先生家里的蔬菜的可口。当时宣武门外的忠信堂正在流行，而这忠信堂的主人，就系旧日刘家的厨子，曾经做过清室的御厨房的。”刘崧生和林宗孟就是刘崇佑和林长民。

早在晚清，闽菜就是京城的主流菜系，前清八旗子弟带着八大胡同的名妓，总要去吃闽菜才算显示贵族的荣耀。闽菜煎、炒、烹、炸、氽、烩、炖、熘、蒸样样齐全，对食材的挑选与烹饪技法极为讲究，被京城人称为官府菜。当年的

“忠信堂”则是京城西长安街最著名、最气派的闽菜馆，有几进的院落，院子中间还有个大戏台。“忠信堂”掌厨郑大水过去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御厨，他也是御膳房里薪俸最高的大师傅。当年北洋军阀混战，奉系军队在喜峰口一带打了胜仗，名噪一时的大律师刘崇佑先生和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先生商量要犒赏三军，于是派人在京城找个饭馆预订酒席1500

桌。整个北京城没有饭庄敢承接，只有忠信堂把这笔生意给接下来，最终将这1500桌酒席办得妥妥当当的。将士们欢欣鼓舞，饱餐豪饮，赞不绝口。民国十四年（1925）三月，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来到京城，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林长民在北京前门车站台迎接，让林徽因安排在忠信堂设家宴款待，晚宴陪席的都是世家名人，有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梁漱溟、蒋梦麟、辜鸿铭、熊希龄、梅兰芳、梁思成、徐志摩等。郑大水为晚宴安排的头汤是珍珠豆腐汤，然后是五荤五素，分别是醋熘黄鱼、红烧鱼翅、炒小牛肉、火腿鸡丝方饺、清蒸鸡，炒油菜花、炒花芥蓝、焖豌豆、炒小白菜、香菇烧笋。餐后按照西式的习惯，奉有甜点，是枣泥馅饼、杏仁酪，还有咖啡。中西合璧，名气煊赫，这场家宴颇显出福建家宴菜肴的特色。



刘家大院内陈列的团圆宴蜡像

说起刘家的家宴不能不提到团圆宴。在今天的刘家大院内陈列了仿真菜肴及蜡像，展示出一家人团圆的画面。餐桌上既有闽菜状元佛跳墙，还有荔枝肉等。其实真正的家宴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奢华。如正宗的芥菜粥，保留了入口青涩的味道，忆苦思甜。刘家教育子弟们要励志创业与勤俭持家并重，粗饭淡菜皆宜，只有吃过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因此在大年三十团圆饭之时，第一道上来的就是一碗芥菜粥，包含着言传身教的劝诫。当然，地方习俗上还有“该去”“债”的谐音寓意。

三

刘家大院的牌匾，是林则徐题写的“掖均厝”三个字。现代译为“掖韵居”，意思是“弘



林则徐题写的“被均尻”牌匾

扬韵学的居所”。这是林则徐写给儿女亲家刘家镇的。林则徐将长女林尘谭许配给刘家公子刘齐衔，足见刘家当年文风之盛。

从刘家大院步行百步就到了光禄吟台。这里一向是文人墨客聚会的场所。但光禄吟台仅是一块大石头，周围空间有限，而来吟诗作赋的文人墨客每一场都有几十人，宛如今天的文化沙龙。故而，真正的聚会场所是在刘家大院。

刘家人喜好茉莉花茶。这时，家镇公总会以茉莉花茶招待宾客。茶香、花香中洋溢着诗情与友爱。刘家有个厨师班，厨房有200多平方米，五个灶一字排开。好客的刘家人常常请客人吃卤面，面条寓意长寿。先是把面条煮熟捞出放在冰柜。客人来了，取面入锅余热，摆放碗中，泼上特制的卤汁，鲜香扑鼻，引得客人赞不绝口。

福州冷冻厂是刘家的企业，每日里，厂里都会运几大块冰，敲成块状放在柜子中，海鲜买来就放在这个冰柜里。想知道这个冰柜是什么样子吗？外壳是木头做的，约1.5米高，内裹着一层保温材料。冰柜分三层，最上层是个铁皮的抽

屉，里面放上敲碎的冰块，并拌上粗盐，使冰不容易融化。另外有根小管可连接到下一层，这样融化的冰水就会沿着小管流到下层。食品放在中间层，可以放置准备冷藏的食品。最底层有个盆子，盆子边上有水洞，水会不断流走。冰箱最上层的那个盆子给冷气留了条缝，冷气会向下走，热气则向上飘。结构这么简单，配件还是国外进口货。这样，很好地把冰箱内部包得很严实，达到冰寒冻鲜。

刘家大院是三坊七巷的富足之家，虽然是钟鸣鼎食之家，但毫无奢靡之风。家风是一个家庭的风尚，是一个家族长期形成、世代相传的精神风貌。书香世守的刘家，很好地传承了中国儒家教化中的餐桌礼仪，要求刘家子弟饭前洗手、衣冠整齐方可入座；用餐时尽量不能说话；尊长者未入座不能动筷；夹菜不许用筷子去搅；菜离位置远，不许站起越位，可以请离菜近的人帮忙夹菜；夹入碗中的饭菜要吃完，不能剩下；用餐时筷子不能直插碗上；用餐结束饭汤匙放碗中，筷子放碗上，与大人讲声吃好了方可先离桌。

而修身读书更是家族兴旺的重要因素。刘家文风鼎盛，人才辈出。1841年，刘齐衔与他的哥哥刘齐衢同榜考中进士，“一胞双进士”轰动一时，成为久久的美谈。当年来家中贺喜的场面可想而知，刘家厨子早早就备足好酒好菜招待亲朋好友，当然，少不了温情的刘家卤面。

饮食文化，也对家族文化文脉的涵养和传承，起了重要作用。

马道街古厝

岱 蒙



作者的爷爷

爷爷祖辈世代务农，家里有 5 个兄弟，他排行老六，比他大十多岁的三哥、四哥早就坐渡船过了乌龙江，在福州城内当学徒，学做生意。

中国近代化从洋务运动（1865-1895）算起，至今也不过 100 多年。细究起来，城里人大多在爷爷这一辈才开始进城。

1895 年甲午战争大清帝国战败，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就在这一年，爷爷 12 岁，仅在村里私塾念了 2 年，粗识几个字。家里虽给了他一块约一亩三分的田地，但他养不活自己，又觉得种田没出息，于是，向人借钱做盘缠，几件旧布衣服打个包，几根吊钱捆一捆，一根粗竹扁担肩负着全部行李，独自一人从老家闽侯南屿来到省城，从南门进入福州城。

福州的南门曾叫宁越门。唐时最早唤作登庸门，唐天复四年（904）翁承瓚诗云：“登庸楼上方停乐，新市堤边又举杯。”爷爷作为创业第一代，把自己的长子命名为“建庸”，或许与这个登庸门有一定关系吧。

南门兜原为明府城南门出口处，往南走就到了茶亭街。茶亭街是在明、清才渐渐形成街市。

古时这里是福州城区通往台江汛的必经之路，后被开发成池塘。一直到清末，这里都是人们步行、乘轿或者骑马穿过的一条南北走向的狭窄石板古道。沿路老屋的背后，与整条街平行的是流淌的茶亭河，全长1000多米。沿途有茶亭桥、福德桥、六柱桥、洗马桥等石桥，桥头开设多家茶馆，茶馆因避阴濒水四面来风，成为行人歇脚的好去处。清末民初的茶亭街也是一条手工业街，最盛时手工业作坊达到100多家，多是前街后坊的格局，但几乎都是低矮简陋的木屋。

爷爷在靠近茶亭的南门兜斗中路一家角梳店（他三哥的店）当学徒。那时的学徒除在店堂学做生意外，其他生活杂务也脱不开身，早起倒尿壶、刷马桶、扫地、卸门板、抹桌椅板凳、烧开水、打洗脸水等，晚上还要给店主打洗脚水、刷锅洗碗等，甚至还要帮着带小孩。

三年后爷爷出师，有了点积蓄，自己租房开店，做小本生意。他吃苦耐劳，接受新事物快，过年回老家时乡下人都穿着连裆裤或长袍马褂，他却一身西式衣裤，被同村人取笑。

爷爷本领渐长，日子也开始滋润，当腰包中终于有几文小钱叮当作响时，心便随之膨胀了。先是经营角梳，以后转向牙刷生意。若干年后，自己也开起一家牙刷店，当起了老板。终于创出了自己的品牌——“五旗”。其生意不仅在当地站稳了脚跟，还扩大到上海，其产品曾供不应求。

据福州地方志记载，这是福州城里由手工作坊起步，最早使用马达生产的牙刷店。以后，爷

爷陆续在上海、台北等地也设立分店。

民国的茶亭街已是商业古街。福州人形象地把它比作一只神奇的扁担，一头挑着省城的行政中心鼓楼，一头挑着繁华的商贸中心台江。一条茶亭街，开设牙刷店的店号就有万春、五旗（有的记载错写成王旗）、六佛、丰记4家。20世纪30年代初期，爷爷派二儿子到上海购进马达等机器。“五旗”牙刷店成为台江洋头口、斗中街一带最早开始采用机器生产的家族企业。

作为第一代创业者的爷爷，从一个乡下“农民哥”到省城“坐商”的人生跋涉是艰辛曲折的，腰带得勒紧，四肢得勤快，额上滚下的汗珠才能一滴滴在地上砸成白花花的银子。从1895年到1944年，经过半个世纪的打拼，千辛万苦，给家人留下了省城中心繁华地段的7套大宅、临近市中心商业圈与地处十字街头交通要道的3大间商铺店面。

爷爷偌大产业后来衰落的直接原因来自战争。1937年后，大片国土沦陷，福州两次沦陷。1945年全面爆发的中国三年内战，产业遭受波及在所难免，这是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命运注定的。

爷爷出身贫寒，从社会最底层一步一步艰难跋涉而来的他，性格温和，善待家里雇工，对工人态度和蔼，一再交代家里要按时发工钱、让工人吃饱饭。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两次入侵福州，福州两次沦陷，爷爷家的掌柜和多个伙计一直舍不得走。



旧茶亭街

爷爷出生于1883年，1944年因结核病在福州家里逝世，享年61岁。这在人均寿命不到40岁的旧中国算是高寿了。

20世纪80年代迎来改革开放，爷爷当年的小伙计从台湾、香港等地回来，特意前来寻找“久大”“久和”“五旗”牙刷店，说是不忘当年老东家的帮助，才有学徒出师做师傅、当老板的机会。

二

奶奶一生哺育了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她见过的孙子有三个。

在小孙子的幼时印象里，与奶奶接触的机会屈指可数，暮年奶奶劳累成疾，经常躺在古厝里的摇摇椅上歇息。等到小孙子长大后方得知奶奶娘家与爷爷老家都在南屿，爷爷是尧沙村的，奶

奶是江口村的，那里可是福州著名的纺织之乡。

奶奶自小就是纺纱好手，后随着爷爷进城成了老板娘，又因大儿出息被称为太夫人。奶奶性格刚烈，在家里爷爷都得听她的。她信佛供菩萨，见不得乡下亲戚来家喊苦诉冤，手头一旦宽裕些，常帮助乡下亲戚。

奶奶是纺纱女工出身，不识字却爱听家人读报纸。虽说在国事上懵懵懂懂，但是在民族大义、大是大非上却毫不含糊。抗战时期，有人来家里动员她儿子去南京伪政府任职做事，被她大骂一顿赶出门外，说宁可全家饿死也不当汉奸。

抗战胜利后，当时的福州市政府曾发一张由第一任市长、留法博士黄曾樾签名的“抗战军人家属”奖状，颁给奶奶以示表彰。



作者的奶奶

福州解放后，在1955年开展“三大改造”运动时，古稀之年的奶奶把自家古厝拿出来捐献给政府，并作为第一批业主接受由福州市人民政府颁发、张继中市长签名的《房屋改造模范守法户》奖状。失去房租的生活费来源后，奶奶由几个孝顺儿子供养。

奶奶一生吃素信佛，耄耋高龄老死在马道古厝老家里，留下遗言交代家人火化遗体。消息传开一度轰动街坊。20世纪60年代前期，当时人民政府刚开始在社会上进行相关宣传，很多老人尚未接受这个做法。

三

随着家庭人口的添加，帮佣工人的到来，为适应家大业大的需要，爷爷陆续在马道街、茶亭斗中街、水部门下、城边街的羊肉弄、凯凝铺的卖鸡弄等处购置了几处古厝与店铺。

爷爷最早购买的老宅古厝在福州城南门城墙护城河外东侧的马道街首段。马道街不是名巷，但距三坊七巷不远，坐落在民国初年还是城郊接合部的于山南麓。当时从这里往南望去是一大片的池塘湿地。东侧鼓山，西侧旗山。西边举旗，



1911—1913年间，福州南城门附近

东边擂鼓，前面的五虎山犹如五只老虎注视着东方。

马道街老房屋后边不远是一大片水塘和鱼池。水塘连茶亭河通闽江，可观览潮起潮落。每当夏晚，东南季风带着暗香迎面袭来，蛙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景色虽好，也有尴尬之处，每逢台风来袭，狂风呼啸，刮得木屋嘎嘎作响，更兼四处漏雨，油灯在风雨中闪烁。

旧时福州老城，大宅院主要分布在有名的三坊七巷一带，马道街这一带大户人家不多，与三坊七巷相比，略显寒碜。但是住屋之间的马头墙也是不可或缺。马头墙又称风火墙，特指高于两山墙屋面的墙垣，也就是山墙的墙顶部分，因形状酷似马头，故称“马头墙”。当时马道街有一半的房子姓唐，故又被人称“唐半街”。

古厝均不是在爷爷手中建造的。家中至今还留有一张清朝同治元年（1870）的房地契，原有主人具体情况无人知晓，建造它的是一位大商人，他建的不是一座房，而是建一片，院落与院落间如云相连，蔚为壮观。爷爷买房子时掏尽腰包所有，在马道街购下他的第一座古厝，也算是那里的大宅第了。

爷爷买的古厝所在地名多与十二生肖有关联。此后，陆续购置了羊肉弄、卖鸡弄等处的古厝。

关于马道街的由来，有个说法是“马道”系旧时军队巡城遛马之通道，民国后将护城河（月河）填平后新辟建而得名。因此商人设店成街，经营铜钻、铁器、鞍革等“马上”商品，故称“马道街”。

五代十国的闽国时期、明朝嘉靖年间的戚继光抗倭时期、清顺治年间的八旗入闽时期曾有大量军队驻扎福州城内，催生了许多带有“营”字的地名。营，顾名思义就是军营，也就是军队驻扎的地方，或者是和军队相关的地方。如今以“营”称的街巷，据说尚有 30

多条。这些驻兵之地空间局促，巷道狭窄，走马尚可，列队行军则太挤，通车更不行。清朝八旗步骑兵驻扎在西营里，每天经过不，5 米宽的马道街石板路到南教场操练。辛亥革命之后，南教场改名省立福州公共体育场（今五一广场前身）。

位于今鼓楼区安泰街道的福州南门兜的羊肉弄，因长期有人在此贩卖福清花生、羊而得名。卖鸡弄在今福州乌山风景区的天皇岭南侧，当年古田人把鸡运到福州城里贩卖，多在南门兜附近歇脚，发现将小弄的民居作为鸡栈，比较便宜和方便，人们就把这个弄子叫“卖鸡弄”。卖鸡弄的出名，还与现代一位福州名人、著名的“左联”五烈士之一的胡也频有关，乌山卖鸡弄 4 号作为胡也频故居，被福州市人民政府列为文物保



胡也频故居



如今的马道街

护单位。

爷爷购置的几处古厝有个共同特色，就是厝内都带有水井。冬暖夏凉的井水水质甘甜清冽，源源不断的井水还让福州人养成了洗地板、进屋脱鞋的好习惯。盛夏午后，用井水浸泡的“冰镇西瓜”成了孩子的最爱。

爷爷对古厝呵护有加，在细致用心的翻修维护中，他的汗水已经渗进厝里的一砖一石。爷爷临终前执意做了一件事：给四个儿子一一指定了居住的房间，并留下话：房子只许住，不许租，更不许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马道街巷道依旧，爷爷购置的百年古厝成为一家街道工厂的车间仓库。后门相通的斗中街已拓宽成大马路，命名为817中路。

我们曾住在临近南门兜马道街口的一处爷爷留下的古厝里。这是一座单门独院三进后面的砖木结构楼房，上百年头，有些倾斜。南面的窗，

面向对房的后墙壁。30厘米厚的古墙头上，小榕树破土而出，根藤蔓延，紧抱着墙头延伸到墙根。春天来临，常常探着新枝嫩芽，伸进屋内。到了秋天，枝头上会结出许多褐色松子，引来小鸟抢食。盛夏夜晚，凉风习习，月光透过摇曳的枝叶洒在斑驳脱落、灰白相间的院墙上，那景色令人难忘。透过天窗可以欣赏和感受生命在大自然之中一年四季不同的韵致与情境。

东边的窗望出去，不同斜面的大屋顶一片连着一片，错落间，曲线流畅的山墙有节奏地起伏。天空是蓝色的，屋顶是黑色的，墙是白色的。屋脊墙边几棵细弱的小草随风飘摇，自然形成了线与面、静与动的对比与和谐。闽都古厝民居透过这个窗口传达出一种典雅的气息。

马道古街历经数百年上千年风云。原先靠南门的街口处曾有个牌坊，描绘的是骏马奔腾的画面，横匾额上书“马道街”。古厝旧宅故地上那棵百年古榕树，依然苍劲参天。

双韵楼：林寒碧与徐蕴华

陈 碧

林景行（1885-1915），原名昶，号寒碧，字亮奇，福建闽侯人。南后街林家林孝简的儿子，民国时期著名的反袁志士；徐蕴华（1884-1952），字小淑，号双韵，出生于浙江石门县城（今桐乡市崇福镇）。徐自华之七妹，7岁能作诗，10岁受学于胞姐自华。她和胞姐徐自华曾被柳亚子誉为“浙西两徐”“玉台两妙”。

林孝恂入仕后，带领林家走向清末民国的一代代风华。他任职于浙江一带，曾三次在石门（崇福）任知县。家族中的子侄随他赴任就学，其中就有儿子林长民、林天民、林觉民和林尹民。林寒碧少年时则在广州。

林、徐两个家族的交往似乎是从林孝恂开始的。徐氏一家是石门的望族大姓，除了我们知道的徐志摩之外，徐家一对姐妹，徐自华、徐蕴华也得大名，其原因是与秋瑾的生死交往——秋瑾与她们亦师亦友。

林寒碧出生于福州南后街，9岁时曾同父亲宦游羊城，即通经史，能文章，有神童之称。在

广州时遇兴中会革命党人起义，他的姐姐身在城内，他冒着清军矢石，救之出险，人口传唱。13岁到沪，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学塾。1902年17岁留学日本中央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在日本期间，参与反清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前夕，林寒碧学成归国，奔走戎马，不辞劳瘁，在革命队伍中颇有声誉。民国时，宋教仁出任农林总长，礼聘寒碧为秘书，寒碧成了宋教仁的左右手，并被推为众议院秘书。

宋教仁被刺后，身为众议院秘书的林寒碧遭袁世凯政府追捕，不得不离开上海避祸。先是赴北京，继而避难辽东，在奉天兴华书院主讲日文，并自习德语，游学欧洲。

1915年袁世凯称帝。林寒碧是坚定的反袁分子，经常在报上发表激烈的反袁言论。夏，徐蕴华带着5岁的女儿林惠随寒碧赴辽东沈阳附近的本溪湖避难，过了近一年清苦的生活。

1915年袁世凯称帝失败，林寒碧始返沪杭。返回上海后，出任《时事新报》总编辑，以笔为



徐蕴华（右）与女儿林北丽

戈讨伐袁氏，抨击军阀。主笔三个月，著文30多篇。其间还约同乡林庚白等人撰写时评。8月7日夜，寒碧从报馆外出赴挚友梁启超之约，在静安寺路马霍路口被英国人克明的汽车撞死。此时，他的大女儿林惠7岁，小女儿林隐（字北丽）出生才17天。

林寒碧去世后，《民国日报》等有悼念诗文载诸报端，有记者还撰写长文《记林寒碧先生之惨死》。李拔可（曾为林旭收尸）是他的中表亲，本拟为刊《双韵楼》，但是，出版社认为生者与死者不宜合刊，所以独为他刊了《寒碧诗》。

林寒碧去世时年仅31岁，短暂的一生紧紧与革命相连。尤其是他的夫人徐蕴华也是一位革命者。他们的结合本身就极具反封建意味。

徐蕴华的词作中有赠别堂兄林长民的《满庭芳》：“休忧路长远……此去乘风破浪，卜他日，事业千秋。”另有《水调歌头 和林宗孟词人观

菊》：“冷眼严霜威逼，回首群芳偏让，比隐逸高流。”及《浪涛沙 和宗孟词人忆旧感事》：“蒿目感苍生，漫赋闲情。”反映时代，抒写时情。

林寒碧在日本与鉴湖女侠秋瑾曾为同学。徐自华与秋瑾是密友，妹妹徐蕴华则是秋瑾的学生。秋瑾为徐家姐妹革命道路的指引人。1905年，秋瑾曾写诗《赠女弟子徐小淑和韵》：“素笺一幅忽相遗，字字簪花见俊姿。丽句天生谢道韞，史才人目汉班姬。愧无秦聂英雄骨，有负阳春绝妙辞。我欲期群为女杰，黄龙饮罢共吟诗。”鼓励徐蕴华要做个女杰——走出闺房，争取男女平等，投身革命活动。徐蕴华听从指导，一改诗风，有了更强的政治意识。如在其后的《吊璇卿（秋瑾）先生》中有句“欲除奴性酬斯志，甘作牺牲不辩言”“大抵英雄皆热性，断无家国不关情”等。在秋瑾影响之下，徐氏姐妹加入了同盟会，其后，徐蕴华还加入了光复会。秋瑾创办《中国女报》时写道：“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之先导，为迷津筏，为暗室灯，使我中国女界中放一光明灿烂之异彩，使全球人种惊心夺目，拍手而欢呼，无量愿力请以此报创。”秋瑾原预定集股万元，办报印书，但只征得股款数百，徐氏姐妹慷慨捐资1500元。

光绪三十三年（1907），徐蕴华在秋瑾沪居处，得识林寒碧。林寒碧个子高挑，容貌清秀，

才思敏捷，性情温和，给秋瑾和徐蕴华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秋瑾悄悄地对蕴华说：“可妻也。”郑逸梅在《南社丛谈》中记载了徐、林二人由吴江陈去病（蕴华之师）做媒的事情。“当石门徐自华、徐小淑姊妹追悼秋瑾于杭州，陈巢南（去病）前往参加，这时寒碧才弱冠，巢南见其温文尔雅，识为奇才，而小淑为巢南女弟子，便由巢南做媒，成为佳偶。”此事在陈去病《林亮奇哀词并序》文中得到印证：“戊申初春，余自沪入越，道出杭州，值寄尘、小淑追悼璿卿秋氏与湖上，余往莅焉，始识亮奇于宾座……并为委禽于小淑，作蹇修焉。”徐小淑（蕴华）还是清末著名诗人王允皙长乐籍的女学生。

1907年7月15日，32岁女革命家秋瑾蒙难后，姐妹俩风雨渡钱塘，义葬秋瑾，士林传为佳话。1908年冬季，清御史常徽奏请削平秋瑾墓，同时参奏吴芝瑛与徐自华为秋瑾余党。清廷准之，勒令迁墓，并通缉吴女士与徐自华。自华避居沪上日侨丸乔医院半年。当时妹妹蕴华在爱国女学读书，浙江巡抚增韞就此事近问及仁和县令林孝恂。林孝恂曾任石门知县5年，以“徐自华妇人之仁，物伤其类（指浔溪同事），徐蕴华是女孩子，少不懂事，盲目附从”答之。吴女士又运动两江总督端方。一场风波，方才平息。秋瑾的精神激励了后来的革命者，在她逝世4年后，辛亥革命起义推翻了清政府。

族兄林长民曾被称为“名教叛徒”，但其实他的婚姻还是合乎封建旧道德要求的。林寒碧与

徐蕴华的结合则更显叛逆。因徐氏姐妹对于“革命”的热心与积极，林家虽同情，但对家族中将有这样的儿媳颇为排拒，认为她不符合林家长媳要求。林徐的女儿林北丽在《二十七年的旅程》文中写道：“他们俩自友谊而恋爱，在父亲22岁的时候，他接受了母亲‘不效劳清廷，决不做官’的条件和母亲结了婚，这是对祖父一个致命的打击，母亲不但夺取了他的儿子，并且毁掉了继承他传统政治生命幻想的对象。”虽然林家反对，林、徐二人还是在宣统元年（1909）春结婚，徐蕴华也在这年秋天加入了南社。

林寒碧去世后，徐蕴华曾为国民党杭县党部妇女部长，守节终身。她曾作诗明志：“梅花手植已无存，松柏常青覆墓门。今夜迟明天有意，要留凉月葬诗魂。”有《双韵楼诗稿》传世。1995年学者周永珍为诗人夫妻辑《徐蕴华、林寒碧诗文合集》。



《徐蕴华、林寒碧诗文合集》

沈葆楨与《晚清台湾番俗图》

林 山

—

同治十三年正月二十日，也就是1874年2月25日，才4岁的光绪，懵懵懂懂被抱上紫禁城的龙椅，接替一个多月前去世的同治皇帝，继位皇帝，纪年改为光绪元年。当然，真正掌握皇权的是坐在他身后那道神秘帘子后面的皇太后慈禧。

两年后的光绪三年五月二十六日（1875年7月17日），一套手绘彩图送到宫里。5岁的光绪自然看不懂，慈禧一看就明白：这是她一年前布置给沈葆楨的作业。

1875年5月19日，沈葆楨奉旨补授两江总督并兼充南洋通商事务大臣。8月8日，立秋，正在台湾与福建巡抚王凯泰交接台湾善后工作的沈葆楨，接到慈禧给他的谕旨：“福建内地并台湾所属各县及各番社，着详细绘图呈览；并着将各

种番族形状另行详绘成帙，一并呈进。”慈禧不是心血来潮突发奇想。早在乾隆执政15年的时候，她就颁旨：“我朝统一区宇，内外苗夷，输诚向化，其衣冠状貌，各有不同。著沿边各督抚于所属苗瑶黎獞，以及外夷番众，仿其服侍，绘图送军机处，汇齐呈览，以昭王会之盛。”慈禧传承的是乾隆的做法，经由读图了解各类民情。

沈葆楨接旨，马上安排随他巡台的张斯桂组织船政学子们着手田野调查，绘制图册。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完成任务。1875年3月31日，沈葆楨上《进呈台湾全图并各番族形状风俗折》，“将南、北、中路各番族状貌风俗，以及出产花果，详细分图，凡三十有六幅，每幅俱缀说其旁”。

时光流逝137载后，2013年8月，这套手绘彩图华丽转身，变成《晚清台湾番俗图》出版面世了。

那年秋天，为筹办“闽都文化与台湾”论坛



福州官巷沈葆楨故居

活动，我到了台北，有缘来到沈府翰林筵。

在翰林筵，与沈葆楨后裔沈吕遂、沈冬兄妹品尝沈府菜，这是沈葆楨先生创制的私家菜，简约不简单。席间获赠台湾史研究所刚出版的精美大画册《晚清台湾番俗图》。台湾著名史学家谢国兴教授题赠时，特别说明因为我们是福州来的，沈葆楨先生是福州人，所以我们是第一读者。翻阅带着油墨香的《晚清台湾番俗图》，这些画，就是沈葆楨巡台抚台时，奉旨让当时随他赴台的船政学堂学子严复等画的。这 35 幅画，构成了晚清时期台湾东部少数民族生活的浓缩全景图。

喜欢画马的沈先生在《晚清台湾番俗图》封二上画了一匹疾飞的马，落款“癸巳秋，福州沈吕遂”，盖了圆形名章，并特别在封二左、右上角，相对钤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闲

章。沈冬也欣然题词：“沈葆楨在台的创格事业此书可为确证。”

二

《晚清台湾番俗图》是怎么来的呢？事情还得从 150 年前说起。

1871 年底，在太平洋西岸的一个水域发生了一起海难，有两艘琉球贡船在航行中遇到大风，失去控制，漂到台湾。其中“八重山”号船获救，船员被送到台湾府城。另一艘“太平山”号船在台湾南部北瑶湾触礁沉没，大部分船员游上岸。谁知上岸后，许多人被高士佛、牡丹两社的人杀害，少数人被营救至府城，与在那里的“八重山”号船员一起，乘轮回到大陆。这是历史上

“牡丹社事件”的肇始。

琉球国位于太平洋和东海之间，是西太平洋岛链中连接日本九州和中国台湾的重要环节。琉球国从明洪武五年（1372）起向中国朝贡，延续500多年。琉球国许多国王受中国皇帝册封。由于福建离琉球最近，所以册封使都是从福建出发。福州有多人担任过册封正使。如嘉庆十三年（1808）的齐鲲、道光十八年（1828）的林鸿年 and 同治五年（1865）的赵新。

1874年5月，觊觎琉球乃至台湾的日本，以三年前在台湾发生的“牡丹社事件”为借口，出兵侵台，攻打牡丹、高士佛等社，并盖营房，建立“都督府”，实行屯田、植林，准备长久占据台湾。

历史会记住这一天，在台湾乃至全中国：1874年5月29日（同治十三年、明治七年，农历四月十四日）。

这天，皇城传下一道圣旨：“沈葆楨着授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以重事权。钦此。”

恭亲王为此照会各国外交使团：“本衙门查台湾等处遇有各国事务，闽浙总督驻扎省垣，相距较远；船政大臣沈素悉中外情形，兹奉特旨派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自能悉心筹划、尽其事权，以符条约而敦睦谊。相应照会贵大臣查照可也。”

5月14日，钦差大臣沈葆楨和福建省布政使潘蔚帮办率船政轮船水师赶赴台湾台南。抵达台

湾府城后首先备战，编组团练、调兵遣将，积极布防，在安平兴建炮台，修筑亿载金城。并且深入民间，进行田野调查，为台湾今后发展打好基础。

10月31日，大久保利通与李鸿章签订《台事北京专条》，日军全部撤回。

1875年3月，台湾土人抗官起事，沈葆楨再次奉旨赴台。沈葆楨不愧为一代名臣，他站在历史的高度，为不让台湾与大陆骨肉分离，让台湾牢牢地镶在中国版图上，提出开山开发和开化抚番思路，作为杜绝外患，巩固台湾海防的根本性措施。

一是开山开发。台湾地势，除西部平原外，山地占全岛的三分之二，海拔3500米以上山峰有50座。四大山脉纵贯南北，更有原始森林覆盖全岛大部，岛内南北东西交通阻隔，各族、各部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极为不便。沈葆楨来时，台湾才开发了被称作“前山”的西部平原，而被称作“后山”的东部还是蛮荒之地。

沈葆楨实施开山开发的措施主要有：屯兵卫、刊林木、焚草莱、通水道、定壤则、招垦户、给牛种、立村堡、设隘碉、致工商、设官吏、建城郭、设邮驿、置廨署。

而在开化抚番方面，沈葆楨也下了功夫。番族特指居于“后山”、保持落后生产生活方式的台湾少数民族族群。开山抚番的主要措施有：选土目、查番户、定番业、通语言、禁仇杀、教耕稼、修道途、给茶盐、易冠服、设番学、变风俗。

沈葆楨特别重视设立义塾，兴办教育，使当地民众很快从渔猎过渡到农耕。他请旨表彰郑成功，奉准建“忠节祠”。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和保卫与建设台湾的沈葆楨，至今仍受到台湾百姓的敬仰。

台湾原是福建省的一个府，孤悬海外。沈葆楨建议巡抚移驻台湾，并整顿吏治。清廷决定福建巡抚每年冬春二季驻台，并增设台北府，下设淡水、新竹、宜兰三县，强化了对台湾的管理。他奏请派人往欧洲采购铁甲船、水雷、洋炮等，更新武器装备，在台南训练洋枪队，在澎湖、安平、旗后等处修筑炮台，加强了军事力量，把台湾与大陆紧紧连在一起。

沈葆楨巩固台湾海防和加快台湾开发的“开山抚番”，促使台湾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各方面与大陆各省完全相同。

说到乡先贤沈葆楨先生，他创办福建船政，在我国乃至世界近现代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而他奉旨巡台抚台开台之功绩亦是彪炳史册。因此，台湾民众感恩沈葆楨，在台南立塑像，在台北市政府设沈葆楨厅。皇帝称赞沈葆楨：“综理船政，殚心竭虑，创立规模。其巡视台湾，于抚番、开山各事，尤为不辞劳瘁，弭患无形。”

三

谢国兴介绍说，这部画册上的画是沈葆楨让随其赴台的船政学堂毕业生画的，主题与沈葆楨



《晚清台湾番俗图》

力倡且对台湾近代有重要意义的开山抚番有关。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船政学堂毕业生集体创作的唯一画册，也是晚清时期对台湾东部少数民族描绘最丰富的画册。

当年，船政学堂绘事院招收艺徒，“特开画馆二处，择聪颖少年通绘事者教之，一学船图，一学机器图。”教学图纸的绘制和现场放样，培养中级测绘人才。

2012年夏天，谢国兴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达成共同研究、出版《台湾风俗图》协议。于是，有了大型画册《晚清台湾番俗图》。至于为何加上“晚清”和“番俗”字样，谢国兴说：“因这批画绘制于晚清，主要涉及台湾少数民族风俗，故在台湾出版时用了现在这个名字。”

《晚清台湾番俗图》主要描绘了台湾屏东、

台东、宜兰的形貌和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景物等，36幅图直观地描绘出当时的台湾社会实情。

按照《晚清台湾番俗图》编撰者的分类，这36幅图分成三类：一是纪事图。呈现的是张斯桂对台湾少数民族的认知与其在台经历，有3幅，表现沈葆楨赴台初期少数民族的归顺场景。二是番社风俗图。描述少数民族的生活、猎首、狩猎、婚姻、生计等，有28幅。三是花木果物图，描绘当地树木、花卉、瓜果等景物，有5幅。

读读画册中的几张图。

《台湾生番归化图说》，描绘的是光绪元年（1874）六月二十四日发生的事。当时台湾的琅琦（现恒春）一带，当地住民有数十个社，社各有长。而牡丹社人数最多，其他社都听其号召。自从日军攻破石门后，牡丹一社被焚，民众四处

逃匿。经过福建布政司潘霨、台湾道夏献纶到当地了解情况，请翻译通事去各社张贴布告，才相率归来。来时有170多人，大部分留在10里外。入柴城见官的只有十多位男女。他们都紧握枪刀弓箭。引人注目的是，领头那位胸前挂着一面大银牌，是乾隆年间大将军福康安所赏。那是1788年，台湾发生林爽文事件，陕甘总督福康安受命赴台处理。他在击败林爽文及庄大田部的战斗中，得到当地民众的协助。胜利后，他颁发银牌给有功的当地人，获得者感到很荣耀。此时，官员们宣示清朝廷的指示精神，要大家剃发，大家都没有意见。官员又赏以红羽毛马褂及银牌，大家更开心了。

《台南生番状貌图说》，描绘的是当地人的面貌和服饰。图中可以看清，台南当地人状貌跟



《台湾生番归化图说》



《台南生番状貌图说》

汉人差不多，只是没有剃头理发。男子用绳子绑住头发，垂在脑后。女子把头发编成辫子，盘在额头。用红绳或者是麻丝染红后来绑。耳垂都穿个大窟窿，用牛骨磨制的两个圆饼塞之，大小将近一寸。当地的头目穿着有衣有裤，脖子上挂着珠子一串。头目的妻子也着衣裤，而且穿短裙。红丝网络披肩，上面挂缀一排排小铜镜。腰以下也如此。男女头上都有花饰。男子戴的是花草编成的花环。女子则是把花枝插在辫子盘成的发环上。花草装饰，既美观，还可以遮太阳。

《番社饮食图说》，描绘的是当地民众的饮食。台湾当地人的饮食，南北大同小异，都是以番薯和芋头为主食。谷米和瓜菜只有台东、台南种植和食用。台北仅有黍与番薯、萝卜，有时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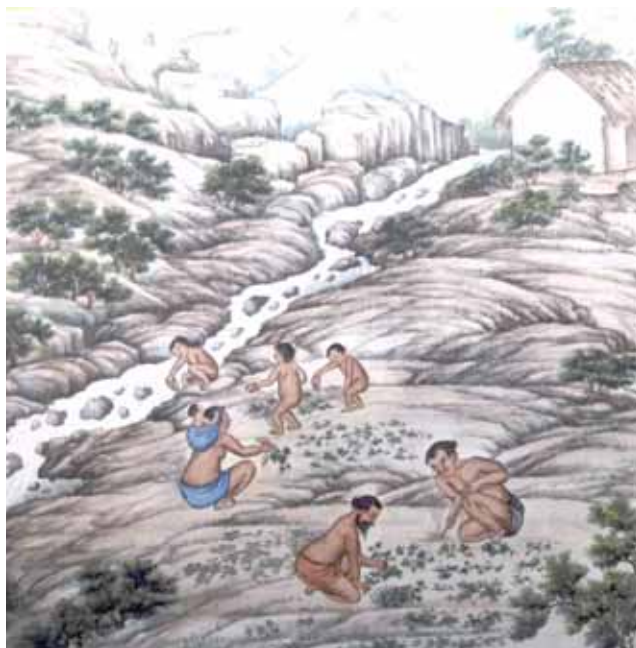
米和麦，也是向汉人交易来的，不是本地生产的。使用的器具，主要是用木头制作的。只有台东、台南偶有用陶器的。大家都席地而坐用餐。

说到当地主食的番薯，《台南北番社种薯图说》描绘了台湾当地的农业、种植业。台南的民众懂得种五谷、薯、芋、瓜、蔬。而台北的民众就只种薯。其中也有一部分种植麻和黍。当地是丘陵地带，野猪多。为了避免作物被野猪啃食和糟蹋，人们在野猪不易到的峻岭，开辟番薯园。而且种的也不多，够一年的食用就好。长出叶子就吃叶，番薯成熟就吃薯。

台湾的番薯来自福州，是明代福州长乐的陈振龙引进的。他是我国的“甘薯之父”。陈振龙去菲律宾经商时发现“朱薯被野，生熟可茹”，



《番社饮食图说》



《台南北番社种薯图说》



《番女嫁汉图说》



《番社贸易图说》

觉得这种作物如果种到老家，就可以解决一些粮食问题，于是他带了一些薯藤回到福州，试种成功。经官方推广种植，“教民种之，赖以度荒”，在荒年发挥了重要作用，迅速推广到了山东、河南、河北、浙江、台湾等地。

《番女嫁汉图说》，描绘的是婚姻嫁娶的情景。从当时社会看，当地妇女生活比较辛苦，所以当地女孩都喜欢嫁给汉人。经常有山里居民带女儿出来找婆家。在卑南、秀姑峦一带都是这样。找到好的人家，提供的聘礼就多。如火枪两杆、腰刀两把及猪、酒、红布等。条件差的人家，可能就没有什么聘礼。而且，结婚第二天，娘家人都会把新娘的陪嫁衣饰都带回去。

《番社贸易图说》，反映的是当地人们的商贸经济的状况。当地特产有熊掌、熊胆、鹿皮、

鹿筋、鹿茸、鹿角、鹿胎、鹿脯、鹿肚石、鹿肚草、鹿皮、薯蓣、茯苓、麻，还有生鹿、兔、猴等。因而当地人特别需要的是狩猎必需的火枪、腰刀、火药和铅弹等。当然，食盐、火石、针、线、布幅、红羽毛等也是生活必需品。这里的贸易还停留在以货易货时代。到约定俗成的交易时间和地点，各种需求者带着自己所产的东西，来交换自己需要的东西。以货易货，不需要也没有货币做中介中转。交易时，完全看双方的需求和对货物价值的主观判断，并不计较客观价值的贵贱方面。

《番社贸易图说》中还有“猎首图”“狩猎图”“渔织牧图”和“花草瓜果图”等，丰富多彩。

《晚清台湾番俗图》折射出沈葆楨爱国主义者的情怀和实务，彪炳史册。

信中窥人

——读沈葆楨致吴氏兄弟手札

陈 绛

沈葆楨平生事功，以经营福州船厂、筹建近代海军和保卫与建设台湾最为突出，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事业进展的影响最为深远；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杰出人物，其历史地位也主要由此奠定。笔者往岁尝在福州故宅先君来章（懋丰）公书房有幸获睹沈致其妹丈、笔者外曾祖父吴仲翔及其弟叔章公手札百余封，益增对其性格、志趣和行谊的景仰。

吴仲翔，名维允（1829—约 1899），福建侯官人，咸丰乙卯科（1855）亚元，1857 年以内阁中书銜莆田县学训导，由沈葆楨调赴福州船政局办理文案，1874 年沈奉旨巡台，奏委船政提调，翌年先后奉旨赏加三品銜、二品銜。1879 年船政大臣吴赞诚请假，他曾暂行代办所有船政事务。1881 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派令总办天津水师学堂，一直到 1885 年请假回籍修墓，经署船政大臣裴荫森奏充船政提调。1887 年应两广总督张之洞函邀，并由张奏委为广东水陆师学堂总办。



沈葆楨

1891 年补广东肇州、阳春、罗定道，叠署按察使司，约在 1899 年卒于广东官邸。吴仲翔兄弟三人，兄伯敬（维肃），道光进士；弟叔章（维贞，1831—1903），咸丰己未（1859）举人，曾充福州船政局支应处委员，保直隶州知州，著有《韵学备考》，是当代围棋名家吴清源的祖父。吴仲翔和叔章兄弟同沈葆楨既在船政局内有上司与属员的同事关系，同时又结有秦晋之好：吴仲翔本人娶沈的四妹，又有一女嫁沈五子濬庆，因而有两世

姻谊；从信札得知，叔章亦有一女嫁沈子，唯不知何故，沈氏家谱和吴氏家谱均未有记载。

吴仲翔是沈葆楨主持福建船政和办理台湾防务深荷倚畀的左右手，而且得到后来历任船政大臣的器重。除此之外，吴仲翔还得到李鸿章、张之洞等其他洋务领袖人物的赏识。李鸿章称他“久充福建船政提调，务理精密，任事勤能，熟谙制造及驾驶学堂事宜”。张之洞称赞“船政始规皆其创办，嗣经北洋大臣李鸿章调赴天津委办水师学堂，亦著成效”，为此积极罗致他主持创办广州水陆师学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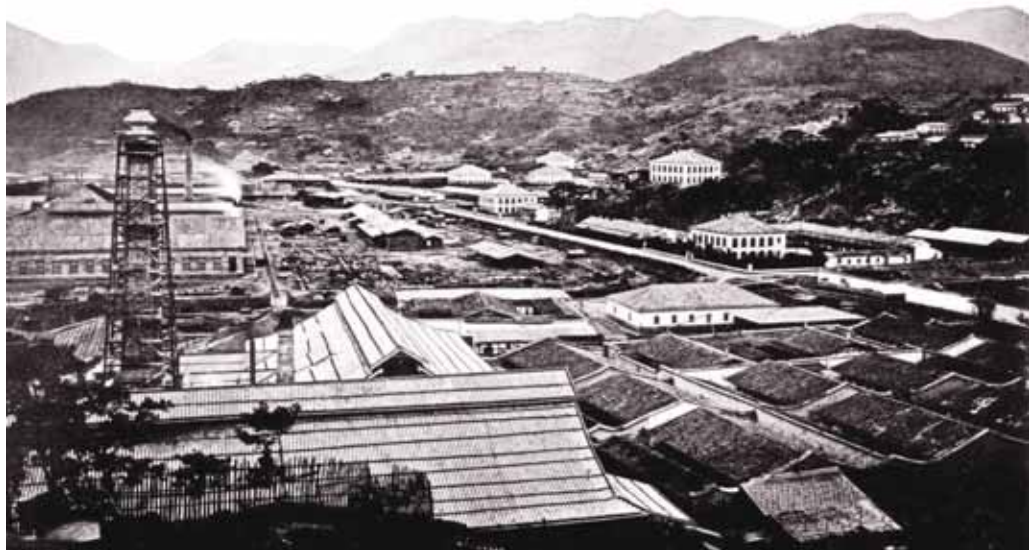
沈葆楨这批手札大部分是写给吴仲翔一个人的，一小部分兼致仲翔、叔章兄弟两人。依寄发地及信函内容，约分三部分：一为沈从福州城内寄到马尾，多为交办船政事务的短笺；一为沈奉

旨办理台湾海防，从台湾寄回福州；一为沈就任两江总督，在赴任途中或任上由南京寄回福州。各信末或仅署月、日，或署日无月，均无年份，最后一封信署十月五日，据内容考订，当系光绪五年十月初五日，即1879年1月18日，距沈十一月初六日（12月18日）去世，恰一个月。

信札谈到铁甲舰的购置、船只的修造、木材的采购、船坞的建筑、经费的筹划、薪粮的发放、外籍人员的请赏、艺徒的请恤，以及兵船的调拨、电报线的架设，等等，充分反映沈葆楨身居高位，办理船政，亲自作如此切实认真、深入细致的具体领导，这在与他同时、地位相埒的洋务大员中实不多见。

中国早期现代化事业的创办，历经种种困难。就福州船厂而言，沈葆楨接任伊始，便上奏

历陈他将面临的难题，经费支绌是他所列举“七难”之一。他预感到“轮船经费与别项军需不同，稍不应手，便碍大局”。事实也正是如此，由于成船愈多而负担愈重，经费问题不但后来成为内阁学士宋晋



马尾船政旧影

等守旧派人物抨击福州船厂、企图扼杀新兴的造船事业的一个重要口实，实际上也是维持船厂正常运转和发展的严重障碍。他致函吴仲翔称，“吏治、洋务之难且不待言，至筹饷虽三头六臂，亦无法可想。”他一面以“柴干米尽，处处皆然，岂但船政”作自我宽慰，一面叮嘱吴：“船政经费只得耐性苦索，所谓债怕讨也。”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经费问题如何深深地困扰着他，以及他为了筹措费用如何煞费苦心，极力避免船政因费绌而中止。1875年10月底，他乘轮船北上入江就任两江总督前，在《报赴新任起程日期折》中，除陈报遵旨赴任外，特别提出：“伏念船政经费万难，经臣叠次缕陈在案。吴仲翔工程熟悉，廉正朴诚，任怨任劳，此臣所素信者，倘费无所出，课虚责有，不特非一道员所能为力，即丁日昌到闽后，亦断不能空拳赤手从事其间。”同日他又致函总理衙门恭亲王奕訢称：“惟船政欠发之款累累，仰屋之嗟，日甚一日，殊恐丁帮办见此局面，不乐久居，则前功尽弃为可惜耳。”沈葆楨视船政如家事，对船政经费支绌，欠款累累，一直到离开福州船厂前夕，仍然念兹在兹，积极提出建议，争取这一事关自强、中外瞩目的事业在丁日昌接任后得到继续发展。

当然，船政的困难不仅仅在于经济方面。自1855年底左宗棠自闽调离赴甘之后，先有新任闽浙总督吴棠扬言“船政未必成，虽成亦何益”，后有内阁学士宣称夷事“早经议和，不必为此猜嫌之举”，对船政极尽阻挠；而闽海关税务司、法

国人美理登和法国驻福州副领事巴士栋则横加干涉，企图控制船政。沈葆楨除了以坚忍的毅力排除来自局外的困扰，同时还须沉静应付局内复杂的人事关系。人事掣肘本来几乎是近代洋务事业中可以见到的普遍现象，沈葆楨以居家乡绅身处桑梓之地，更深感到这是他办理船政“七难”中又一个困难。他说：“盖互相推诿，则事不行；互执己见，则事又不行。构隙甚微，顿成冰炭，虽封疆大吏均公忠体国，而权势所在，媒孽者多，下至胥隶，皆足以簸弄是非。”在致吴仲翔信中，他以“瑜亮纷纷，机械林立”形容他所看到的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而深叹“绅士办事之难，弟所尝惯”。他真诚希望为了船政事业而相互体谅，和衷共济，如他所奏称：“勿以事属创行而生畏难之见，勿以议非己出而存隔膜之思，则大功之成拭目可俟矣。”

现存沈葆楨写给吴仲翔、叔章兄弟的信札以19世纪70年代中期为最多。其时正值日本出兵台湾而引起台海危机。这些信札连同他的有关奏折函牍，表明他极力主张制造和购置铁甲舰，并把它看作是建立中国近代海军、加强沿海防务的一项重要措施。他在手札中多次谈到铁甲舰问题，一则说：“铁甲舰实系好的，必须速购，应俟日军门（日意格）自琅归，问其详细，再函总署及制军（李鹤年）、将军（文煜）。”再则说：“经此变局，中外齿冷，自制铁甲之请恐亦因此中乖，然颜厚心粗者何知后顾，如厂地无待更张，尚可集事，亦不敢以一蹶灰心。请我公与日

军门、清翁熟筹之。”沈葆楨和李鸿章虽然同为近代中国海防论的积极鼓吹者和近代海军的主要创建人，但是两人当时在购置铁甲舰问题上存在分歧。李鸿章以经费不敷、议论不齐、将才太少、驾驶乏人等理由反对南洋购舰，总理衙门也没有给沈坚决的支持。沈葆楨告诉吴仲翔：“铁甲船图样即管寄来，唯伯相（李鸿章）意甚游移，盖以经费浩大，急切难筹，又闻克乐卜（克虏伯）、安蒙士唐（阿姆斯特朗）大炮均能洞穿尺余，铁甲恐一击便成废物。弟函争之，未知能挽回否。”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写道：“铁甲船总署不肯向公使（威妥玛）招呼，日军门云，如是则英国的恐买不成，闻日耳曼有一号，尚可打电报细查。”他慨叹“铁甲船如俟河清”，这后来使他抱憾终天，弥留之际口授遗疏，仍不忘以铁甲舰装备海军，遗疏称：“臣所每饭不忘者，在购办铁甲船一事，今无及矣，而恳恳之愚，总以为铁甲舰不可不办。倭人万不可轻视，倘船械未备，稍涉好大喜功之见，谓其国空虚已甚，机有可乘，兵势一交，必成不可收拾之势。目下若节省浮费，专注铁甲船，未使不可集事。”由此可见他对购置铁甲舰建立一支强大的近代海军矢志不渝的热忱。

由日本侵台而引起中日交涉，是19世纪70年代中期中外关系的一个突出问题。沈葆楨一面积极布置台防，一面主张以坚定的立场和灵活的手腕作外交的应付。先是，1871年琉球船遇飓风，漂至台湾避风，与当地高山族人发生冲突被戕，1873年5月，日本原外务大臣、首任驻华公

使副岛种臣到北京，遣副使柳原前光以此事质问总理大臣毛昶熙、董恂等，毛、董答称：“夫二岛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日本人抓住毛、董答语“杀人者皆属‘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作为出兵的借口，将早已蓄意侵台的图谋进一步具体化。翌年7、8月间，柳原向总理衙门强辩台湾系“无主野蛮”，“该国（日本）有自主之权，伐一无主野蛮，奚容他国旁论”，日本外务省复照更蛮横声称，出兵台湾不过是往年“面咨毛、董两大臣，据其趣旨，今甫下手而已，别无他意”。沈葆楨对此深为气愤与焦灼，他致吴仲翔函云：“倭使复总署文，直指毛、董及孙士达（记名天津海关道）前言，不知将来如何回答。聚九州铁铸此大错，唇焦舌敝，庸可挽乎？”他寄希望于总理衙门不要为日本军事侵略所屈服，为其外交狡辩所蒙蔽，只求息事宁人而放弃主权。他在信中写道：“但望总署不震不动，不竦，则必就范，倘厌烦求速，恐作茧自缚，治丝而棼矣。”台湾事件最后以1874年10月31日总理衙门大臣奕訢等同日本外务卿大久保利通在英国公使威妥玛调停下，在北京签订《北京专条》而告解决。

有两件具体事件反映出沈葆楨以大局为重、以事业为重的坦荡襟怀。一件是他函告吴仲翔“刘、林二生极当优奖”。“刘、林二生”当系曾在船政后学堂学习并于1877年首届派往英国留学的刘步蟾和林泰曾，他们将北上工作，李鸿章未作明确表态，沈葆楨说：“万一伯相将二生

一并留任，此乃大好事，同是供国家之用，何分彼此？”他认为他们到北洋，将比在南洋有更好的前途，这“岂非朝廷之福”？刘、林二人后来都参加北洋舰队，十几年后在中日甲午海战中为国捐躯——刘步蟾管带“定远”号，英勇抗击日军进犯威海卫，最后沉舰自尽；林泰曾管带“镇远”号，在黄海海战中牺牲。人们尝憾北洋、南洋畛域之见，联想到这两支海军初建时，分用海防经费各200万两，总理衙门于1875年5月有“请先于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之奏，沈葆楨不顾有人善意劝阻，毅然支持这种移缓就急的方针，以南洋200万两经费统解北洋兑收应用，南洋海军的筹建虽不能不因此受到严重的影响，但却有利于中国早日建成一支强大的海军。在人才使用方面，不也同样体现了沈葆楨这种可贵的公忠体国的精神？

另一件事是沈葆楨调离福州船政后，要吴仲翔将他主持船政时期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向前来接任的丁日昌如实汇报，不可掩饰护短。沈葆楨尚未卸任船政大臣时，曾拟举荐与曾国藩、左宗棠都有很深渊源的湘人郭嵩焘继任，但沈奉到两江的新命不久，极有可能出于李鸿章的安排，郭即奉命出使英国，与李有密切关系的丁日昌出任船政大臣。沈葆楨即致函关照吴仲翔，“厂事应整顿者亦乞禀商雨帅（丁日昌，字雨生），勿以恐形前人所短为虑。”片言只字，光明磊落，与许多当政者粉饰政绩，以无为有，掩盖缺点，以有为无，实不可同日而语。



沈葆楨手迹

1875年10月29日，沈葆楨乘轮北上，赴两江总督任，11月18日接篆视事，此后直至1879年12月18日病歿，均在两江任上，前后四年又一个多月。辖区满目疮痍，常令他忧心忡忡。他谈到：“复起视事以来，日日提心吊胆过之，始而苦旱，既而苦蝗，继又苦雨，幸畅晴矣，而江淮骤涨不已，扬属堤不没者数寸，民妇恐官之开坝以保堤，日夜露宿坝上以争，一动即成泽国。”他还谈到：“此间弥月不雨，蝗飞蔽天，不祷不应，委顿殊甚。”因江南的灾情而联想到故

乡民间疾苦，他扼腕长叹自己回天乏力：“吾乡风、水相继，此地旱、蝗相继，民不聊生，我生何为？”“闻中洲（在福州）于初二日大火，此其祸酷于乌石山，何故乡之多故耶？金陵二月将半，忽得大雪，甚为菜麦忧之。”“诸同事闻家园患潦，彻夜不眠，谨借廉三千，托荔丹呈雨帅备一粥之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忧时亲民、热爱桑梓之情，溢诸楮墨。

晚年的沈葆楨深为衰病侵寻而苦恼不已。例如他写道：“弟昨患腰疼，近始稍愈，而痰喘甚不可耐。”“鄙人则腰疾大作，行坐交苦，盲人骑瞎马，夜半过深池，斯境近之。”疾病折磨着他，一次病后，“两脚无力拜起，需人扶掖，咳甚则晕，迎风则呕”但他仍力疾从公，在信中一再表示：“不敢以一蹶灰心。”

这些信札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沈葆楨的刚毅坚定的性格和务实的精神。他告诉吴仲翔兄弟，“办洋务总以坚忍为主，好见长，避处分，无往不自诘伊戚”；“凡事总以‘尽其在我’四字为定盘针，我不自尽，何尤于人？若因人为转移，则举足都无是处矣。”他新任江督后，曾具折力辞，思想和感情上处于十分矛盾的状态，“船局不兼顾不是，兼顾亦不是，累夕不寐，思之无恰好处”，“唯望阁下（吴仲翔）致意共事诸公，此非弟一身一家之事，勿以一人去就而有遐心。弟历事长官，谁是所素所相得者。吾辈出而任事，国家是为，岂其为朋友私情耶？”这种精神正是他的岳父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

之”崇高思想境界的传承。他在去世前一个月写的信中有句云：“人无贤不肖，我总对之说实话，便颠扑不破。”这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一生行止的自白或总结，也不妨说是他对朋僚和后人的劝勉和淳嘱。

由于沈吴既有长时期的上下级共事经历，又有多重姻亲关系，这些信札没有官话套话，有的只是真挚感情的流露或对事物看法的直率表达。沈葆楨在信中有时还用一些福州方言谚语，如“做脸”“倒拍猪八戒一耙”“做官备家伙，太爷打把式”“黄牛面前骂白马”，既显示写信人的风趣，又拉近了与收信者的距离。有几封信都提到“死”，尤其晚年，一方面病魔折磨着他，另一方面，工作的重担压着他。他在信中写道：“不才以病躯视息江南，满野哀鸿，一筹莫展，除祈死外，更无长策。”“世间那有极乐世界，第言之无益，遂亦置之不言耳，大概除死方休。”“须知苦债未偿，万无死法也。”读者可以从这些话语窥探他内心世界深处于一二，同时也可以看到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如何支撑和推动他为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事业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

沈葆楨的书法雄浑遒劲，深得鲁公精神，与他信札中坚韧不拔的精神交互辉映，相得益彰。这使这些信札既是富有研究意义的历史文献，又是深具鉴赏价值的文物瑰宝。除了前述这些信札多缺写信明确日期外，所涉人物多为字号，未署正名，所涉史事也还有待作钩沉笺释。

海上环游鼓浪屿

章 武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有成千上万只白鹭飞来栖息……

于是，人们就把厦门岛称为鹭岛，把厦门岛与鼓浪屿之间的厦鼓海峡，称作鹭江。

我们乘坐游船从鹭江出海环游鼓浪屿。对岸的鼓浪屿渐行渐近，日光岩、八卦楼、钢琴码头，连同码头左侧岸边那一母二幼、活蹦乱跳的白海豚雕塑，全都历历在目。接着，船头往左一偏，按顺时针方向，开始了360度的环岛之行。

正值早春时节，风从海上来，多少有点寒

意。年轻的游客们不怕冷，全都上了顶舱。我则安然端坐在底舱温暖的沙发上，隔着舱门和舷窗，静静地听涛，观海，赏读眼前徐徐展开的鼓浪屿长轴画卷。几十年来，我不知多少次来到鼓浪屿，或晨登日光岩观日，或夜游皓月圆赏月，或漫步于菽庄花园的四十四桥之上，远观海潮如千万匹白马从天际席卷而来……可惜每次都来去匆匆，我所能观赏到的，其实都只是海上花园的某一个角落，尽管玲珑剔透，美不胜收，但对全岛的山海大观，却总是“只缘身在此山中，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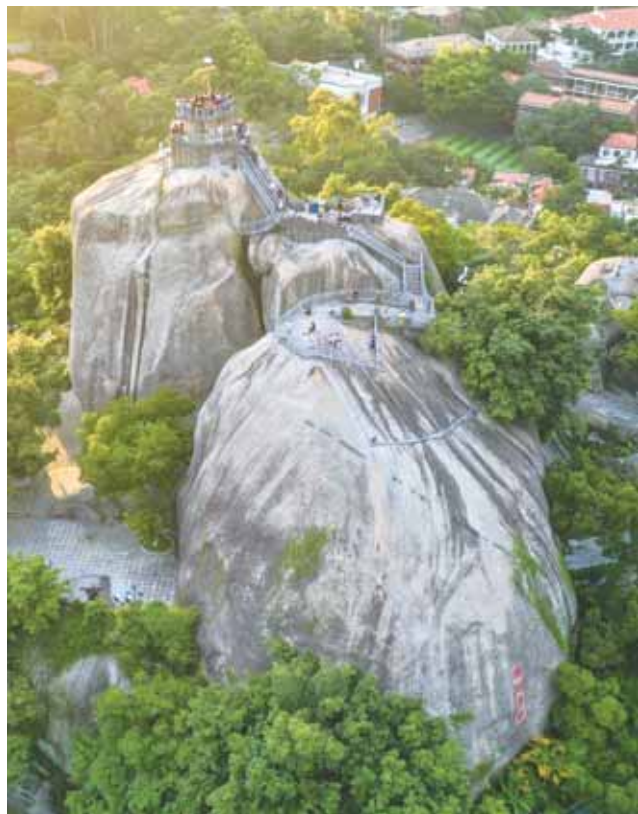
俯瞰鼓浪屿

识庐山真面目”。好在到了晚年，总算有这一次迟到的海上环鼓之旅。

由于人在船上，船行海中，呈现在我眼前的鼓浪屿，全都是在不断移动与变幻中的远景，加上又是阴天，能见度有限，一切全都朦朦胧胧，影影绰绰。但这样也好，因为它省略掉许多局部和细节，分不清团团簇簇的绿云中，哪是榕树、木棉、凤凰木、柠檬桉或旅人蕉，辨不出层层叠叠的楼宇里，哪是罗马式、哥特式、巴洛克式或带有闽南红砖大厝建筑元素的东西合璧式……但与此同时，全岛的海岸线及天际轮廓线，反倒明晰起来，多方位、多侧面、多角度的远景图，便渐渐延伸、扩展成鼓浪屿立体式的全景图。

于是，我从中第一次发现，小小的鼓浪屿，其实小中见大，内里大有乾坤。就拿山来说吧，全岛叫得出名字的山，就有龙头山、鸡母山、笔架山、燕尾山、英雄山等等，尽管它们海拔高度都不足百米，但层峦叠嶂，高低起伏，却也把全岛的天际轮廓线，勾画得错落有致，显得颇有气势。其中，位于天际轮廓线的最高端，自然就是龙头山了，它与厦门岛上的虎头山隔海相望，两山山势，犹如生龙活虎，民间因而有“一龙一虎守厦门港”之说。龙头山的主峰，就是大名鼎鼎的日光岩，它原名晃岩，据说1647年郑成功来此，觉得此间风景远胜于他幼时在日本所见的日光山，便把晃字拆开，改称为日光岩。

从船上远眺日光岩，可明显看出它由一竖一横两大巨岩组成。其中，竖者为峰，显得挺拔、



日光岩

雄伟，大气磅礴；横者为基，又显得浑厚、壮实、稳重，底气十足。环岛一周，日光岩时近时远，时胖时瘦，时而拔海而起，高悬头顶，时而退往远处，在群峰背后露出一头，但它始终冠盖全岛，是全岛的核心和灵魂。如果说，鼓浪屿是一个淹没在海中的石头巨人，那么，它就是巨人探出水面，高高昂起的头颅！正是它，每天迎来朝旭的第一抹曙光，每晚抖落夕照的最后一片晚霞，给小巧玲珑的鼓浪屿增添了万千气象！

鼓浪屿的天际轮廓线以波澜起伏、气势不凡令人肃然起敬，鼓浪屿的海岸线，则以凹凸有致、玲珑剔透而动人心弦。鼓浪屿海岸线全长

5.1公里，内含7处峭壁带、8个小海湾、9个小半岛、10处礁石群，大大小小40个景点……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真奇妙！小小的鼓浪屿，居然像千手观音般向四面八方挥动玉臂，让海岸线像轻柔的飘带一样，一会儿远远地抛了出去，一会儿又轻轻地旋了回来，同时，它又像瓔珞一般串起了许许多多的红玛瑙、绿翡翠、蓝宝石！

如此曲折优美、丰富多彩的地形地貌及海岸景观，若要用移步换形的手法一一写来，显然，远非我的笔力与本文的篇幅所能承受。那么，退而求其次，就让我试说一下我印象最深的几处吧！

首先是峭壁带。过去，鼓浪屿的海岸线在我印象中多为半月形的海湾、金黄色的沙滩，那是得天独厚的海滨浴场，光洁而又平坦，柔美而又浪漫。今天环鼓一游，方知鼓浪屿还有多处险

峻的悬崖峭壁，如刀劈斧削一般，从山巅直插海底，直挺挺，赤条条，光秃秃，硬邦邦，其落脚处，可谓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好一派水石相搏、山海交响的壮丽景观！尤其是英雄山一带，连新建的环岛路到此，也只能穿越长达百米的山洞隧道而过，让载满游客的一溜电瓶车，暂时在我们的视线中消失。听说，此山原名旗尾山。1949年10月15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31军和29军，开始对厦门发动跨海之战。当日18时，31军271团与277团各两个营的船队，在支前船工的协助下，顶着海上的险风恶浪，冒着国民党守军明碉暗堡的密集炮火，在此抢滩登陆。激战中，271团团长王兴芳等指战员及张锦娘一家支前船工共550人壮烈牺牲，以身殉国。为了缅怀先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厦门人民把旗尾山改名为英雄山，并在山上建起浩气



半月形的海湾



英雄山陡峭石壁下的环岛路

长存的英雄园。同时，作为历史的见证，山上的明碉暗堡，也一律予以保存。由此可见，人们并没有忘记：和平宁静的鼓浪屿，也曾有过战火与硝烟、流血与牺牲。

鼓浪屿的石头，不仅高耸为峰，笔立为崖，还以各种造型、各种色彩，在紧贴岸边的海中，组成大大小小的礁石群。它们之中，以石相称的，有鼓浪石、印斗石、剑石；以礁命名的，则有灯塔礁、鹿耳礁、江心礁、章鱼礁、将军礁……它们或孤峰独耸、砥柱中流，或钩心斗角、聚合成群，或光洁如镜、灿若云霞，或遍体鳞伤、色黑如墨；更有无数裂隙与沟槽、洞穴与孔窍，迎送天风，吐纳海浪，弹奏起惊天动地的交响乐。大自然以其千万年的日晒雨淋、风吹浪打，把它们精雕细刻成千姿百态的艺术造型，船行一侧，如同进入水上的石雕艺术长廊，令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

其中，最著名的，当数西南角的鼓浪石，因为“先有鼓浪石，后有鼓浪屿”，整个鼓浪屿就是因它而得名的。据专家考证，唐宋时的鼓浪屿，还只是个荒凉的小沙洲，洲上巨石满坡、绿草丰茂，但却渺无人烟，人称圆沙洲、圆洲仔。宋代末年，才有对岸嵩屿的渔民，因出海捕鱼遇风，到此暂避风浪。到了明代，圆沙洲上的居民越来越多，而且修了庙宇。人们发现海滩上屹立



鼓浪石

一块巨岩，中间裂开一个大洞，潮涨潮落时，风吹浪打，咚咚作响，俨如击鼓，于是，便称它为“鼓浪石”，久而久之，整个圆沙洲也就名为“鼓浪屿”了。如今，沙滩向外延伸，这块鼓浪石已端坐在海岸之上，虽然再也不能鼓浪扬声，但却成为一处受人喜欢的海蚀景观。远远望去，巨石中部那一人多高的岩洞，有游人正在钻进钻出，岩顶斜斜长出的一棵小松树，在海风中飘动成一面绿色的旗帜，更有一群白色的海鸥在其上下翔舞，让这一景点充满激情与浪漫，难怪有好几对新郎新娘正在这里拍婚纱照呢！至于鼓浪屿东南角覆鼎岩附近的礁石群，其内涵就更丰富了。

覆鼎岩，顾名思义，其形状有如一只倒扣在海中的大铁锅，闽南人崇古，把锅称为鼎。它海拔29.5米，三面临海，一头靠岸，地势险峻，气

势不凡，并与海中的剑石、印斗石鼎足而立。传说郑成功挥师东征之前，命士兵“拆除军灶，掀锅鼎于海中”，接着，又把自己随身佩带的一柄宝剑和携带的一颗玉印相继抛入海中，以示不逐荷夷誓不回师之壮志。于是，人们就把这三块天然巨石称为覆鼎岩、剑石与印斗石。1985年8月27日，正值郑成功诞辰351周年，厦门人在覆鼎岩上建成了巨大的郑成功人物雕像。像高15.7米，由525块“泉州白”花岗岩精雕组合而成，其设计者为中央美术学院女教授时宜。此番，我从船上隔海瞻仰，但见英姿勃发的郑大将军，身着盔甲，手按佩剑，身后的大披风，随风飘扬，如大鹏鼓翼，凌空欲飞。我虽看不清他的脸部表情，但其目光所注视的方向，不正是金门及其背后的台湾宝岛吗！挥师东渡的雄图大略、驱荷复台的必胜信念，在这海阔天空的大背景中，得到了最完美的艺术体现。

这时，风浪大了起来，千万朵雪浪花在礁石群中盛开怒放，一群群鸥鹭逐浪狂舞，又有一架客机，从头顶上轰鸣而过……忽然间，我觉得眼前的鼓浪屿，变成古代的一艘朦朧巨舰，头顶上的日光岩，是舰上帅旗飘飘的桅杆，覆鼎岩则如同舰首的甲板，老船长郑成功正迎风伫立，率领船队向台湾宝岛方向乘风破浪……我以为，这是鼓浪屿环岛行中，我所看到的最令人心驰神往、荡气回肠的一幅画面。

鼓浪屿，鼓浪屿！

海上环游一圈，我看到了鼓浪屿的另一面，



覆鼎岩上矗立着郑成功雕像

也可能是最本质的另一面：秀丽中的壮丽，阴柔中的阳刚，婉约中的豪放！我终于明白：

你，既是海上的一座花园，更是一艘不沉的战舰；

你，既是月光下的睡美人，更是风浪中一往无前的堂堂大丈夫；

作为全国钢琴密度最大的琴岛、音乐岛，你用千百架钢琴与千万年海涛所共同弹奏出的乐曲，不光有温柔的摇篮曲、浪漫的小夜曲、欢快的圆舞曲，更有气壮山河的正气歌、惊天动地的英雄交响乐！

失语的石头

舒婷

鼓浪屿最负盛名的是各种风格的建筑。号称“万国建筑博览会”，未免有些自夸，至少十几国领事馆，却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鸦片战争后，厦门被辟为通商口岸。西方列强纷纷涌进鼓浪屿，除了领事馆，还有商行、公馆、别墅、教堂和学校，甚至还有一个小小的足球场。洋人记载：岛民穿人字拖鞋踢球，往往拖

鞋先破门，球却飞了。因此得出中国足球不可惧的结论。姑且不论中国人是不是踢足球的料，起码这里的足球意识开发得比较早。岛上的中学生足球队十分骁勇，转战全省无敌手。现在的足球场，大铁门日夜紧锁，不准孩子们入内奔跑和操练。透过铁栅，可以看到茵茵绿地，像橱窗里摆设的绣花缎面，被自动洒水机精心熨烫着。据说



鼓浪屿英国领事馆旧址



鼓浪屿洋人球埔旧址



大夫第



八卦楼

正规的球场本来需要如此保养着。

福建沿海历史上，多有漂洋过海谋生求发展的传统。

出于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少华侨回鼓浪屿投资兴业，筑巢而居。他们既想保留闽南古风，又吸纳侨居国的建筑风采和技术，直接从国外自带设计图纸，进口高级建筑材料和家具，因地制宜，依山望海，竟建成了一千多栋私人楼房。

有纯欧陆式别墅。牵藤攀藓的廊柱和拱门，虽斑驳残缺，犹见考究的百合浮雕和古希腊宏伟气势。风轻摇松动的百叶窗，似乎可以窥见当年的壁炉、枝形烛光、细瓷银刀叉，以及踮在留声机上如痴如醉的白缎舞鞋。

有庭院深深的大夫第和四落大厝。铜门环凹凸剥蚀，击一声绵长再击一声悠远，声声清亮如磬。红砖铺砌的天井里，桂香一树，兰花数盆，

月季两三朵。檐前滴水青石，长年累月，几被岁月滴穿。中堂的长轴山水，檀香案上的青瓷描金古瓶，甚至洒扫庭院的布衣老人的肩头，似蒙着薄薄一层百年浮尘。

更有“穿西装戴斗笠”的中西合璧的别墅。建筑主体是西洋式的，有地下隔潮层，卫生设施十分先进完备；但屋顶却是飞檐翘角，门楣装饰挂落、斗拱、垂桂花篮等，花园里既建喷水池，又造假山、八角亭等。甚至有集清真寺、希腊神庙、罗马教堂和中国古典于一体的建筑，如“八卦楼”，即现在的厦门博物馆。

最耐人寻味的是那些别墅的名字：杨家园、番婆楼、春草堂、观海别墅、西欧小筑、亦足山庄等，听起来出彩得很。名如其楼呀！在或富丽奢华或沧桑古朴的外貌下，掩藏着一部部真实的南洋华侨家族史，不知有多少“大宅门”锁锈路埋，讳莫如深，鲜有人知。



被称为“中国第一别墅”的黄家花园

它们成为许多电影和电视连续剧的场景。扛摄影机的人进进出出，名演员不戴墨镜随便徒步上街，讨价还价买烤鱼片和桂圆肉，见惯不惊的小店老板一样放血，绝不手软。

有一本书我百看不厌，胜过任何畅销小说，它是《鼓浪屿建筑丛谈》，作者是龚洁。

我曾经很热切地要去认本家，因为在厦门，只要姓龚，大致都会有些瓜葛。不料龚洁虽在厦门工作多年，却是江西移民，连闽南话也不会。显然我是高攀不上了。

我的朋友、博物馆馆长何丙仲送我两本精美画册：《鼓浪屿建筑概览》和《鼓浪屿建筑艺术》。何先生出身名门，热衷于本地风俗人情，遂时常出入深宅大院，收集大量资料。

他告诉我，春雨潇潇的一个黄昏里，他应约拜访巨富黄奕柱的女儿黄萱。89岁的黄老太太正襟危坐于幽暗的大客厅，奋指叩击一架德国老钢

琴。琴声遒劲激越，倾吐满腹沧海桑田，庭前茶树愈加落寞，竟泣红一地。

每座幽深阴凉的老房子，既可以是一个家族盘根错节的宏大叙事，也可以缩写为攀缘在雕花窗台上，那几茎破碎的缠枝蔷薇。

这个画面扯动了拴在家乡老藤上的我的这颗跃跃欲试的蠢瓜，同时又惊退了笔力贫弱的我。虽然有几家出版社约我写老房子旧别墅的书，几本杂志约我写问题专栏，但我不敢答应。我想我还没有准备好。即使通过家族渊源去恳求，去友情出演，去纠缠磨蹭，也许老人们愿意接纳我引领我，但是深入一座巨宅的内部，就像翻搅一个人的五脏六腑，那种伤筋动骨的痛，他们何以承受？

想到我若是投身进去，必将日日煎熬其中，感同身受不能自拔，就不寒而栗。

遂悲伤失语。

福清少林寺的前世今生

薛 菁

据近代武术名著《少林拳秘诀》记载：中国古代有两座少林寺，“一在中州，一在闽中。”此说自清末以来盛传于世。“中州”是河南的古称，“闽中”则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其区域范围在不同时期有所差异，但大体不离今天的福建。因此，中州少林寺即河南登封嵩山少林寺，几无疑义，而闽中少林寺究竟在福建何处，则众说纷纭，几成悬案。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福建陆续发现了三处少林寺遗迹，即莆田市荔城区西天尾镇林山村、泉州清源山东麓、福清市东张镇西北部的少林自然村。福建少林因此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先后出现了“泉州说”“莆田说”“福清说”。相对少林寺发源于河南嵩山，福建少林寺因位其南，故皆冠以“南少林”之名。也有一说是，唐

朝初年，河南嵩山少林寺志操、惠锡、昙宗等13名武僧（亦称十三棍僧）帮助秦王李世民奠定了统一中国的大业，李世民登基后对少林武僧大加封赏，特敕昙宗为大将军，并准许在南方建少林寺。是故，嵩山少林寺又被称为北少林，唐以后在南方所建少林寺皆称南少林。

福建的三座少林寺中，尤以福清少林寺的资料最详备，是福建省迄今为止第一处明确以“少林”命名的古代寺院遗址。1993年，寺院遗址被发现，1995年至1998年，福建博物院考古部和福州市考古队联合对遗址进行了三次发掘，发掘总面积达5000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珍贵的历史遗物，包括建筑材料、构件和日常生活用品等。所有这些遗物，为我们廓清福清少林寺历史风貌以及南少林的来龙去脉提供了科学依据，对推动福

建少林寺及其与嵩山少林寺的渊源等一系列相关问题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福清少林寺又称福清少林院。众所周知，“寺”和“院”皆为佛教庙宇，通常可以有两种解释：一为，寺比院大，院是别舍，是寺的一部分；二为，二者同义，寺即院，亦可连称，如寺院。在本文中，这两种释义均有。作为嵩山少林寺的分支来说，称福清少林院更准确，遗址发掘的石刻铭文即为“少林院”；从二者同义来说，称福清少林寺亦无不可。尤值一提的是，福州的寺院在宋及宋以前，大多称“院”，明以后称“寺”者渐多。《三山志》《八闽通志》《福州府志》等方志是为明证。如《三山志》“寺观类”

载：闽县凡 173 所（寺院），院 10、寺 13；连江县凡 102 所（寺院），院 9、寺 7；福清县凡 19 所（寺院），院 184、寺 12。其余各县亦然，此不赘述。

福清少林寺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宋人梁克家淳熙《三山志》，该志卷 3《寺观类四·僧寺》福清县部分载：“东林院，新宁里，旧产钱一贯一百四文……少林院，同里，旧产钱一百七十七文。”

此后的方志中仅只鳞片爪且大多语焉不详，兹移录如下：

明代黄仲昭的《八闽通志》卷 7《寺观》“福州府·福清县”载：“方乐寺（陈大建元年间）、



东林寺（宋元祐中建）、后塘寺（宋政和七年建）、龙溪寺、招福寺、龙居寺、少林寺、大侉寺，以上八寺在新宁里。”又，“通上凡七十七寺，俱洪武间并入报慈寺。”

明正德《福州府志》卷40《外志·寺观》“福清县”，亦有方乐寺、东林寺、后塘寺、龙溪寺、招福寺、龙居寺、少林寺、大侉寺等记载，后又注：“以上一百四十三寺今废。”

据此可知，福清少林寺最迟在南宋已存在，明正德年间（1505-1521）已废，故而清初地方志（如康熙六年即1667年的《福清县志续略·寺观》）中已不见其名。而且，宋代名为“少林院”，明代称“少林寺”。

三次考古发掘大体印证了文献的记载。

据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福清市文化体育局合编，高健斌主撰的《福清少林院》载：少林院遗址中的历史遗物主要位于弥勒山发掘区，虎咬马山发掘区也有简单

零星的一些遗物。

位于弥勒山麓的宋代建筑群遗址是当时寺庙的主体建筑遗址，虽然局部受到元、明之后的改建和破坏，但是整个建筑的布局结构仍然比较严整清楚。主体建筑是古代传统的山门、前后殿堂与前后院的庙堂结构；有着中轴线的四合院式的布局。弥勒山遗址的不同遗迹可细分为五期，时间最早的建筑可以达到五代时期，之后还有两宋时期的大型建筑，元明时期也有部分建筑，最晚可到清初。其中，有南宋时期规模最大、结构最严整的殿堂、院落寺庙建筑群。数十件瓦当基本为宋元时期的产品。之后的元、明时期仅局部地方进行了重建和改建。其中，建筑材料的数量特别多，质地有石质、陶质两类：石质建材有石柱础、柱顶石、石条、石板等；陶质建材有台阶砖、门槛砖、墙砖、铺地砖、天井砖、灶台砖、砌沟砖、佛堂砖、楔形砖、镂空砖和墓砖等；还有瓦、瓦当、脊饰、水管等。瓦当均模印不同的



石板遗迹



石柱础遗迹

花纹，主要是莲花纹饰，其次是牡丹或花草之类。

遗址中发掘的生活用品主要有陶器、瓷器和钱币等。

瓷器是三次发掘出土的主要文物，除少量明清的瓷片外，大部分是宋元时期的青瓷、青白瓷、黑瓷和少量墨绿釉瓷。器物的种类有碗、碟、盏、瓶、盅、罐、执壶、器盖和香炉等，多为生活器具，也有一些水器、陈设器，基本出自民窑，可以确定的窑口有福清的东张窑、莆田的庄边窑、泉州的德化窑、浙江的龙泉窑、江西的景德镇窑等。其中一部分瓷器的底部、口沿，写有“少林”字样：“少林院用”1件，“少林”7件，“少林会司”2件，“少林常住”1件等，充分证实了历史上福清少林院的客观存在。

遗址中出土的陶器种类有益、罐、瓮、缸等；还有 203 枚金属钱币，质地为铜、铁两种，均为最常见的圆形方孔钱。钱币中有 106 枚钱币可辨认钱文，其中 78 枚为北宋钱币，17 枚为南宋钱币。毫无疑问，这些钱币肯定是历代少林院（寺）使用过的钱币中的一小部分，其中以宋代的数量为最。

在寺庙周边也发现了一些记录少林僧人信息的桥梁、石盂和石碾等，上书“大观”“庆元”“绍定”等字样，均为两宋时期皇帝的年号。在少林遗址通往东张的古道上，距离遗址 300 米有一座少林下洋桥，为单孔石梁桥，南面的桥板上阴刻有“少林院沙门谨募众缘，共发心德，舍银造下洋石桥一间，具芳德在沙门显言舍钱三贯，僧显



刻着“少林院沙门谨募众缘，共发心德，舍银造下洋石桥一间”字样的桥板



刻有“少林当山僧月休为考妣及自身舍石盂一口”的大石盂

希、显甘各四百，显□三百贯子□舍三贯□贯弟
 一贯□众亲各五百□圣□用□诸积□照□朱□”
 的文字。北侧一块石板上阴刻有“□□时岁次戊
 午冬月题□□都劝首沙门显言□劝首周传善推
 □□□□□伏恭实明后因满和沈□□乡□□□居
 贵”的字样。一口题为“大观四年十二月”的大
 石盂边沿上，清晰地刻着“少林当山僧月休为考
 妣及自身舍石盂一口”的铭文。村中一块“乾隆
 乙卯年”（1759）的吴氏祖墓坟碑上，赫然刻有
 “少林高峰吴公之墓”字样。

上述考古发掘资料，确证了福清少林院的存在，并可推断其始建于北宋末南宋初年，盛于南宋，沿用至元、明，毁废于清初，自清初起湮没至今。据此，学者们断言：“福清少林寺就是历史上的闽中南少林寺，即福建少林寺。”

考古发掘进一步还原了福清少林寺与河南少林寺的渊源。

关于福清少林寺的由来，民间相传是河南少

林寺于唐代派（或逃来）武僧南下创建的。也有学者认为福建少林寺是外来移民或高僧带来的，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郭裔博士即是持此说的代表，其著《晚清民国时期的广东武术》指出：“当移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迁往新的定居点时，由于怀念故土，往往以家乡地名命新土。这是农耕文明孕育下的汉民族常习。”众所周知，北方汉族南迁入闽有过三次高潮，从汉末三国经两晋到隋唐五代，700多年间北方移民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在实现民族融合的同时推动了福建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而且还将他们的文化与习俗植根于此。福清少林寺的建立即是缘自晋唐时期“以河南中州人为主体的”移民潮中移民或僧侣对故土景物的眷恋。唯其如此，福清的“少林院”在称谓上才直接沿用河南“少林寺”之名。还有，唐以来，一些名僧尊宿受邀赴别处讲经弘法，因酷爱旧山，故每每将说法之地以其旧山名之，以示尊重。譬如唐高僧希运（？—



遗址中发掘的部分陶器，其上可见“少林”“少林院用”字样

855)原出家于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后在江西宜丰县鸢峰山建寺弘法,建鸢峰寺,改山名为黄檗,据《景德传灯录》记,此为“酷爱旧山,还以黄檗名之”的结果。《江西通志》亦载:“黄檗山在新昌(今宜春市宜丰县黄岗乡黄檗村——笔者注)西,山使绝顶有寺曰鸢峰。”《新昌县志》云:“黄檗寺,唐名灵鸢,断际禅师道场也。临济宗风遍于海内外,实于兹得法。”断际即希运禅师的谥号。史载:希运禅师于唐开成年间(835-840)到宜丰黄檗山驻锡,见此处山峦起伏,壑深林密,是修道的好场所,便决意驻锡于此,并改鸢峰为其家乡同名之黄檗山,以解其思乡之念。自此,“四方学徒望山而趋,睹相而悟,往来海众常千余人。”黄檗山遂成禅宗的大道场,成为中国佛教禅宗南宗五家之一临济宗之祖庭。

从考古发掘的文物来看,历史上福清确实存在以“少林”为名的寺院。如前述,无论是在寺庙遗址附近桥梁的石刻还是出土的部分瓷器底部、口沿的文字,多见“少林”的信息。

从形胜来看,两寺的所在及周边地貌也极为相像。河南少林寺的选址,有独特的标准。据《续高僧传》载:“当年天竺高僧佛陀从西域跋涉东来,看到幽邃的嵩山很像一朵莲花,便有意在‘花’中建少林寺。”由是选择嵩岳林谷并带有莲花宝座的佳境建寺院,成了少林寺的独特风韵。福清少林寺的遗址亦在“莲花”中,无论是山川地貌、寺院风水还是文化内涵,都与河南嵩山少林寺相似。从福建博物院高建斌所撰考古报告

看,少林寺遗址北山面溪,朝东偏南,四周有石壁山、竹马山、东坑山、尼庵山、驴路山、虎咬马山、寺塘山和弥勒山九座山头,簇拥成圆形,其状似莲花,故统称九莲山。该寺的建设依山起势,背倚着五老峰(又名“嵩山”),坐落在九莲山中,这种地形格局山环水抱、藏风聚气,正是风水吉地。少林寺东面的五老峰与河南嵩山的五乳峰惟妙惟肖,少林溪的流向亦与北少林寺旁的少阳溪相同。1995年11月23日《光明日报》头版发表的《福清发现南少林遗址》文章中提及:登封嵩山少林寺第三十三代法师释永寿在福清少林寺对记者说:“这里的各种文物都体现是少林的文物。这里的山川地貌,与嵩山的五乳峰、少林溪相像……这是当年少林寺和尚效仿北少林祖庭苦心选择的结果。”

此外,南宋诗人刘克庄(1187-1259)的诗词别集《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59中有一篇题为《诚少林、日九座》的墓志铭,文中不但有“嵩山少林”之记载,而且有南少林僧德诚之行状记述。其文有云:“余有方外之友二人也:曰德诚者,福清人,姓郑;曰祖日者,闽县人,姓郑。诚得法于铁鞭韶师,尝住邑之嵩山少林、汀之南安岩,辙(辄)弃去;坐草庵、翁陂庵各三载,又弃去;入浙,憩净普蒙堂者六年,以宝祐甲寅季夏朔日示寂,俗寿五十二,僧腊三十七。”

文中的德诚(1205-1254),俗姓郑,其师铁鞭韶师,即南宋高僧允韶,俗姓刘。在清初如一编修的《福清县志续略》中有记,师徒俩均是

福清人氏。鉴于此，刘克庄所言的“邑之嵩山少林”之“邑”，按文章的语境承上句之意，当指德诚之邑福清无疑。刘克庄所谓“邑之嵩山少林”向世人昭示：福清不仅有少林寺，而且少林寺也坐落于嵩山。关于福清少林，刘克庄其他诗文中也曾提及，如《石塘感旧十绝·其九》曰：“中军晚岁甥辞去，左相今朝客不来。看取少林诚长老，死生林下伴寒斋。”刘克庄与南宋理学家、文学家福清人林希逸（1193-1271，号肃翁、竹溪）过从甚密，每年生辰互为祝贺，均有酬唱。刘克庄《生日再和竹溪二首》中的一首有云：“吾今会得逍遥义，懒访曹溪同少林。”又，《读竹溪诗》中刘克庄称赞林希逸的诗，谓“不敢匆匆看，晴窗几绝编。参它少陵（林）髓，饶得奕秋先。友愿低头拜，师曾枕膝传。已将牌印子，牒过竹溪边。”林希逸诗歌的一大特色即是以禅、道入诗，其诗多见“少林”字样，如咸淳五年己巳（1259）作《回檠山照老生日启》诗云：“七言虽妙，不入半山之宗；五叶相传，独得少林之髓。”又，《和柯山玉上人三首·其一》云：“身如孤鹤万缘空，吟得交情底许浓。我老学禅无长进，相逢却讲少陵（林）宗。”由此可见其时福清少林风气之盛。

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替以及地域名称和管辖范围的变动，加之福清少林寺建筑的毁损，使得福清少林寺谜案重重。但不可否认的是，“少林村”已然成为当地百姓心中的认同标志，少林村的地名不仅见于清末和民国年间出版的福清县地

图，而且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1950年政府颁发的土地房屋证上还有“少林村”字样。1955年后一段时间内“少林村”的名称被改变，但当地关于“少林村”的记忆一直被传承下来。1989年在福清编写的《地名补查和资料更新成果表》，其中有载“少林村因村后有一古刹，相传是嵩山少林寺分寺，也名少林寺。吴氏于清初择此而居，村以寺名”。（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福清市文化体育局编：《福清少林院》）1995年后当地恢复使用“少林村”的名称。1995年有关人员有福清及周边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在南岭村发现了一座南岭宫，其宫庙木柱上还保留一副楹联，其曰：“宫向嵩山兴万载，神居南邻佑千家。”当地村民指认宫庙前面那座高山，世代相传都称为嵩山。

甚至有学者考证，福清少林寺法脉还有可能传播到福建的更多寺院，其传播脉络如下：由福清少林寺传至仙游九座寺再传至东山苦菜寺、古来寺、长林寺，后伴随天地会的发展而传播开来。（王伯余、林荫生：《福建少林寺的兴废及传承脉络考论》）当然，也可以有另一种解释，神秘的“南少林”，应是福建多座寺院的化身。

总括上述，无论是历史文献的记载还是考古发掘的实物，都确证福清少林寺的存在。福清少林寺文化是中原佛教文化与福建地方文化共同凝结而成的文化遗产，是福清市的一大文化名片。对福清少林寺遗址的保护和利用，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扑朔迷离南少林

江宝章

1982年1月，一部以少林武僧报父仇为题材的电影《少林寺》在香港公映，随后引进内地并迅速风靡大江南北。“十三棍僧救秦王”的故事借由电影这一现代大众娱乐形式深入人心，“少林美名天下扬”。

这个少林，就是在中国佛教界被称为禅宗祖庭，在武术界被誉为“泰山北斗”的河南省嵩山少林寺。传说当年印度高僧达摩在嵩山少林寺面壁9年，参禅悟道，创立了中国佛教史上一个重要流派禅宗，达摩也被尊为东土禅宗初祖。然而令少林寺名扬四海、妇孺皆知的则是它那充满传奇色彩的武林故事。这些故事，使少林寺成为无数武林传奇的源头，近百年来扑朔迷离的南少林疑案即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众说纷纭南少林

刀光剑影，恩怨情仇，夹杂着忠奸善恶、民族大义，由电影《少林寺》引发的武侠热也延烧

到对与之相关历史事件的关注。在福建，有关南少林的传说以及寻找南少林寺的活动便是从那时开始重新升温的。

近代武术名著《少林拳秘诀》载：“国内有两少林，一在中州，一在闽中。”闽中概念较为宽泛，福州、莆田地理上都可算是闽中。

所谓南少林，是指嵩山少林寺在南方福建省境内所建的分寺。明末、清初以前，各种史志和笔记杂志中鲜有“南少林”或“南少林拳”的记述，只是到了清朝乾隆、嘉庆年间，有关南少林传说才骤然多了起来，这些传说多与天地会的反清复明活动相关联，并有许多史料、小说以及民间戏剧等与之相呼应。而关于它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由进入福建的则众说纷纭。

说法一：唐初“十三棍僧”之一的智空和尚建于泉州。1990年泉州华侨大学青年教师林少川发现一本清朝晋江东石人蔡永兼（1776—1835）所著的杂记类著作《西山杂志》（成书于清嘉庆年间），其中“少林寺”条记载说：“十三空之

智空入闽中，建少林寺于清源山麓，凡十三落，闽僧武派之始焉。”该书又记载泉州少林寺历史上曾三次被毁。第一次因寺僧反对闽王王审知依附后梁被毁。第二次在宋元之交，因为少林寺僧人反对蒲寿庚降元，元军将领奇握温思儿和唆都率3万大军攻打少林寺，“激起千僧之愤。”“唆都至，发矢，千僧毙焉，存者百人也……亡入德化。”第三次因闽人胡惠乾在广东为报杀父之仇，殴打粤人，伤人甚多。粤人报官，乾隆二十八年（1763）秋下诏焚毁少林寺，“从兹无敢复修者。”《西山杂志》属于杂记类著作，不是正史，所载事件，讹误百出，甚或子虚乌有，实难作为信史资料，其杜撰的“十三空”之智空和尚，亦与北少林寺的有关碑记不符。

说法二：唐初“十三棍僧”之一的道广和尚建于莆田。据河南省登封电视台甄秉浩叙述，嵩

山少林寺第29代名誉方丈德禅大师1990年4月在其交谈时说：“当年我师爷贞俊和尚常对我说，继禅宗祖庭之后，建筑最早的就是莆田九莲山这座南少林寺了。它建筑在李唐贞观年间，当时是最兴盛的了。”德禅大师还向甄秉浩讲述了一段莆田南少林寺的建寺传说：李世民在收服了江南张善相、薛举、杜伏威三路反王后，杜伏威手下大将辅公祐不服。李世民杀辅公祐，其手下路得才又聚众沿海，沦为海盗，骚扰百姓。奉太宗之命，已受封为大将军的少林寺“十三棍僧”之一昙宗派道广和尚和僧满、僧丰三人，带领五百僧兵前往福建沿海讨伐路得才，几经周折，平定了海盗。事毕，沿海百姓希望他们在当地建一分寺。道广和尚回祖庭见昙宗，昙宗当即作一偈答复：“傍海平盗日月久，九莲山下有宿头。南北千里同一寺，大乘禅在心中留。”道广和尚听后，知



莆田南少林寺

道县宗是要他们在福建找一处同嵩山九顶莲花相似的地方，建一座少林寺，传播大乘禅宗。回到福建后，道广和尚与同门师兄弟跑遍了沿海的山山水水，终于在莆田建起少林寺。寺院曾有过一段较长的兴旺时期，至清朝初年，由于害怕南少林和尚参与反清复明活动，“康熙准派率领官兵三千人，夤夜包围少林寺，四面纵火，为一网打尽计，间有未经灼毙者，亦悉殄乱箭之下……”

说法三：明朝嘉靖年间垣然和尚建于泉州。嵩山少林寺德虔法师 1983 年所著《少林寺武僧志》称：《少林寺内传》载，垣然和尚武功超群，受到嘉靖皇帝嘉奖。其时倭寇为害东南沿海，垣然和尚的高足月空法师受命带领 30 多个打出山门的武僧到福建平倭，在泉州建立了南少林寺，做了该寺的方丈。

南少林毁于何时？上述传说大都指向清朝康

熙、乾隆年间。说是清军入关后，南少林寺成为反清复明的大本营和洪门子弟的聚义厅，大批反清复明义士隐姓埋名，削发为僧，隐身山林，成立天地会，或与郑成功势力勾连，成为清廷的心腹之患，遂被剿灭，寺院被焚毁。这些传说都与当时民族矛盾尖锐的历史背景有关。

遗址之争的“三国演义”

1984 年初，泉州市在位于东岳山仁凤村的东禅寺挂出“东禅少林寺”的木匾和“少林古迹”的照壁，并刻了一块“南少林寺遗址”保护碑，声称这里是南少林所在地。泉州南少林的出处主要见于明抄本《丽史》、清中期抄本《西山杂志》和清末出版的《万年青》等，其中有“读书少林寺”“居少林寺”等字句和“白眉道人奉旨



泉州南少林寺

大破少林寺”等情节。这些书多属小说、杂记，均非正规史志，所记资料非常芜杂。另据泉州文史工作者介绍，1962年，泉州市在进行文物调查时，发现市内东岳山仁凤村东禅寺前挂有“少林古迹”匾额一方，相传是晚清时所书；寺院大门还有一副对联“东岳名山称第一，南拳祖地本无双”，但或已遗失，或仅为当地故老口耳相传，没有文字记载。

泉州挂出南少林牌匾引起福建其他地方尤其是莆田市的强烈反应，认为“仅凭一篇体裁属恋爱小说的手抄件里两处抽象的描述和几则民间故事，就宣布东禅寺为南少林寺，显然不符合考证历史遗址的程序”。相反，近代天地会的相关资料中提到，南少林寺在福建莆田。如《近代秘密社会史料》（萧一山著）载“少林寺在福州府莆田县九连山”，《中国秘密社会史》（日本人平山周著）称“少林寺在福州府莆田县九连山”。



泉州南少林寺“南少林寺遗址”保护碑

清末徐珂在编纂《清稗类钞》时认为福州无“莆田”“浦田”县名，而它又与“莆田”县名最为接近，遂把天地会文件中的“福州府圃龙县九莲山少林寺”“福州府浦田县九连山少林寺”等径改为“莆田县九莲山少林寺”。这种说法也被现代一些史学家如范文澜、李方晨、邓子琴等人采用。

泉州的行动激发了莆田市尽快在自己区域内寻找南少林的决心。1989年夏秋之际，莆田市文史工作者在距莆田县城北约35华里西天尾镇的林山村，找到一座废弃的林泉院寺院遗址，并在林泉院遗址附近找到了两口石槽。一口石槽上刻有“当院僧兵永其津其合共造石槽一口以嘉祐癸卯九月造住持比丘（身+本）茂立”，说明该寺有僧兵；一口刻有“诸罗汉浴煎茶散治平二年乙巳岁二月日造”，说明该寺练武之风盛，需要经常药浴。（“嘉祐”“治平”均为北宋年号）在林泉院寺址北面约500米，还有一座据称建于南明隆武二年（1645）的“红花亭”，相传是“反清复明”义士们歃血为盟的地方。莆田文史工作者据此认为，林泉院既然有僧兵和大型练武场所，再结合各种资料和民间传说，林泉院应就是历史上的南少林寺无疑。1989年11月21日、22日两天，《中国体育报》连续在头版位置刊登了关于莆田发现南少林寺遗址的报道。此后，莆田市文史工作者又从南宋状元梁克家编纂的《三山志》以及《福清县志》《兴化县志》等地方志中找到“林泉院”在莆田“清源（远）里”，始建于南朝陈永定元年

(557) 的证据。1990年4月3日，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嵩山少林寺第29代名誉方丈德禅闻说莆田已找到南少林寺遗址，专门写了“南少林寺就在福建莆田九莲山下”的一幅题词，托人送到莆田。1990年12月，福建省考古队开始对林泉院遗址进行发掘，又发现了几个石槽和一批底部有“林泉乙丑”“泉山”“库司用”“常住”等墨书文字的瓷碗、瓷碟等文物，证明此寺的确叫林泉院，至迟在北宋年间香火已非常鼎盛。1991年9月14日至15日，中国武术学会、福建省体委和省武术协会在莆田市联合召开南少林寺遗址论证会，北京、河南、四川、广东、甘肃、广西、福建等地的武术、历史、考古、宗教等学术界专家30多人与会，并形成如下结论：“根据现有文献和第一期考古发掘的成果以及所搜集的诸多文物，可以确认林山村寺院遗址，就是历史悠久的重要禅寺林泉院遗址。林泉院始建于南朝陈永定元年（557），至迟于北宋中叶仁宗嘉祐年间，此寺业已形成很盛的武风，成为我国东南沿海武术活动的重要中心。”“基本判定：林泉院即武术界通称的闽中少林寺，也就是南少林。”

针对莆田市的说法，泉州市文史专家反驳说，福清境内原有清源里和清远里两处地名，一字之差。清源里后划归莆田所辖。《三山志》《八闽通志》等史料明确记载，建于陈永定元年（557）的林泉院在福清县清源里，《八闽通志》载莆田县亦有一座林泉院，莆田市发现的林山村林泉院即在古清源里所在地。《八闽通志》卷

79兴化府莆田县寺观条载“资福院、北平院、林泉院、龙藏院、灵鹫院……以上凡九十院俱废”，说明最晚在《八闽通志》成书的明弘治二年（1489），位于莆田清源里的林泉院已经废圮，何谈成为反清复明义士聚会的据点！莆田称清源里林山村的林泉院建于南朝陈永定元年（557）是明显的“张冠李戴”。

拂去蒙尘见真容

就在莆田、泉州为谁才是真正的南少林发祥地争执不下时，1993年4月30日，福清市侨办主编的刊物《玉融乡音》突然刊登一篇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副教授刘福铸的文章《福清也有少林寺》，指出《八闽通志》记载少林寺在福清新宁里。文章如石破天惊，引起了福清市文史工作者陈华光、余长通、俞达珠等人的注意。经过进一步搜集资料，他们发现在宋淳熙梁克家《三山志》，明弘治黄仲昭《八闽通志》，明正德叶溥、张孟敬《福州府志》，以及清朝乾隆年间钦定的《四库全书》等史志中都明确记载少林寺在福清新宁里。

1993年5月，陈、余、俞三人前往东张镇古代新宁里所在地寻找少林寺遗址，终于在少林村找到少林寺遗址，并在附近的一座石桥上发现刻有“少林院沙门谨募众缘，共发心德，舍银造下洋石桥一间”字样的少林桥桥志铭。以后三天，他们在遗址周围又相继发现了刻有“少林当山僧

月休为考妣及自身舍石盂一口，大观四年十二月日题”的大石盂（“大观”为北宋徽宗年号，大观四年为公元1110年），和刻有“少林院僧显清舍石梁一条，显常一百文”的桥志铭，以及一批石础、石碑。在少林村调查时，他们还搜集到多本《请神簿》，发现所有《请神簿》中，除了请“福清城隍神主”外，“少林寺伽蓝”、少林寺“土地”、少林寺“库司大王”等诸神祇同在被请之列。此外，在少林寺周围还有许多以少林命名的地名如少林村、少林桥、少林路、少林溪、少林洋、少林境、少林庵、少林大丘、少林驴路、少林尾等等。一千多年来深锁在历史迷雾中的南少林寺终于第一次清晰地露出了真容。

此后，福清市开始向海内外宣布，福清发现南少林寺遗址，地点在东张镇少林村。省内外，包括国家文史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陆续来到福清南少林寺遗址考察，均对发现的文物深信不疑。1994年4月19日，嵩山少林寺33代法师（首座）释永寿专程到福清考察后，郑重宣布：福清东张发现的少林院遗址，就是南少林寺遗址。

1995年7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福建省和福州市联合组成考古队，对福清少林寺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从遗址中又挖出大量文物，如石槽、石碾、石碑、石香炉、瓷器、钱币、铜镜等上千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有20多件瓷器底部烧有墨书的“少林”（7件）、“少林院用”（1件）、



福清南少林寺遗址

“少林大王”（2件）、“少林会司”（2件）等字样。至此，南少林寺遗址即在福清的事实已确定无疑。遗址发掘表明，至迟在北宋年间，嵩山少林寺已在福建建立分寺。至于建寺的原因，笔者认为也许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富于传奇，而仅仅是禅宗自身传播的需要，正如元朝初年北少林福裕禅师也曾在北方和林、蓟州、长安、太原、洛阳等地修建少林寺下院一样。

福清少林寺坐落在少林自然村九莲山弥勒峰南麓，背山面溪，朝东偏南，东面为五老峰，北面为嵩山，寺前有少林溪，流向与北少林寺旁的少阳溪相若。五老峰与北少林五乳峰几乎一模一样，地貌与嵩山少林寺也十分相似。北少林第33代法师释永寿在对福清少林寺遗址进行考察时曾惊叹，这里山、水、形胜都与北少林寺相似。“这是当年少林寺和尚效仿北少林寺祖庭苦心选择的结果。”

2001年，笔者曾陪同福州市委某领导参观福清少林寺。该领导惊讶于为什么福清少林寺地形地貌与北少林那么相似，而且寺名也叫少林，背后也有叫“嵩山”的山峰，难道是巧合吗？我对曰，地形地貌自是当年少林僧人精心选择的结果，而山名和寺名相同，亦是有意为之。正如唐朝高僧福清人希运禅师先是在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出家，后来到江西鹞峰山开山建寺，因想念祖山，乃把鹞峰山改为黄檗山、寺名黄檗寺一样。又如今日台湾岛内，有大量与大陆同名的乡镇，均是迁岛大陆百姓不忘根本怀念家乡而起的名

字。领导称是。

如今，泉州、莆田、福清三地关于南少林寺遗址的争执已基本尘埃落定。诚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罗炤教授所言，福清少林寺（明代院改寺）的资料，集文献、实物于一体，“都是信史，是无可挑剔的”，“是最过硬的，令人信服。”但是莆田、泉州文史专家们所做的工作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他们的热情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为拨开福建南少林寺的历史迷雾做出重要贡献。在互相质疑、辩驳和探讨中，他们不仅廓清了不少史实中的谜团，而且为发现南少林寺提供了大量宝贵史料。他们对南少林在福建的描述并非没有价值，也不能说历史上少林僧人就从来没有在泉州、莆田活动过。在福清少林寺存在的数百年时间跨度中，禅宗教义和少林拳术势必随着寺院间的交流和僧人流动而传至福建各地。从广义上说，他们都可以自称是南少林传人，甚至在历史的某一时期，南少林在某个地区发扬光大，形成福建禅宗或拳术的中心也不是不可能。据明弘治二年（1489）《八闽通志》记载，福清“少林寺”在此前已经废圮（见《八闽通志》卷75“寺观·福清县瑞云寺”条注“七十六寺今废”）。废圮后的南少林在福建还存在不存在？如果存在，又在何处？明末清初南少林僧人在“反清复明”的秘密会社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今天在福建泉州、莆田、福州、漳州等地流传着的种种南少林传说，难道都只是小说家者言吗？南少林的研究也许才刚刚翻开一页新的篇章。

乡 声

陈岱孙

我原籍福州。1918年至1925年外出求学，期间有六年（1920-1925）负笈国外，只有1919年和1920年暑假回过两次家。从1925年学业结束后，五十多年来，我一直旅食他乡，回里的次数极少。

我最近一次到福州是在1948年的夏天，算

起来也是三十五年前的事了。记得，前于此的一次回家是在1932年，和这次相隔十六年。

1948年，我乘飞机在福州南乡机场降落。下机后，我强烈地受到古人曾说过的“童稚皆作故乡之声”的一种说不出的感触，一方面是亲切，另一方面又觉得陌生。这种似乎总是互相抵触，



而不太习惯的感觉一直陪伴我在福州一个多月的勾留。

方言的乡声没有变。在1948年，福州的都市面貌，人民生活也似乎和我童年所知道的没甚变化，但我仍然感到似乎有些不可捉摸的东西是在变。只就乡声来说，有一种我青年时所习惯的熟听的，从广义上说也是一种的乡声，这一次却听不见了。这就是闽江上下水船船工们的号子歌声。

闽江流经闽西北山谷中，到了近省城一段江面骤变趋平阔。春夏间江水大涨，上流的木排，夹杂着小木船，随着溪水下放，到了江面平阔的水域，便争流而下。就在这时候，木排和小船上的号子歌声就迷漫江上；先自远而近地越来越响亮，然后又自近而远地从轻到消失。

我青年时所上的那一所中学位于闽江的南台岛上。我们的宿舍北面临江，在春夏间，我们几乎每天下午都听到这来自闽江上游的木排和小船

的号子、歌声；沉郁但又带着豪放。当时，我觉得这号子和歌声有一种说不出的感人魅力。

这次回乡，我借住在一位亲戚家里。他的家去我的母校不远，也面临江水。夏天，季候是对的。我期待着再一次领略这难忘的号子和歌声，但失望的是，在我住下的几星期，我根本没有一次听说过这种乡声。我也曾向人打听过，但没人能说出其所以然。也许在当年有这种号子歌声的年月里，他们就是听而不闻，根本对之没有任何印象罢了。

现在去1948年又已是三十五年了。从家乡来的人说，三十多年来，家乡的变化很大。真想有机会能回去看看。虽然童稚故乡之声将仍会是亲切而陌生，但故乡的面貌和生活，都会是虽陌生而更亲切。只是不知道江上的号子、歌声是否终于销声匿迹了。

1984年

（摘自陈岱孙《往事偶记》）



清晨的闽江

鹿野

清晨的闽江，其实已经不是闽江的清晨，它的清晨开始得比我们都要早，比整个城市都要早。

第一只飞过闽江的白鹭知道，当晨跑的年轻人、跳舞的大妈以及忙碌的上班族所组成的车流在江滨大道上奏响一曲交响乐的时候，闽江已经醒来多时了。

江中捕鱼的小船也知道。因为它已经沿着闽江的潮水，来回梭巡一圈，归了航。

妇人侧蹲在船舱内，用旧毛巾使劲地擦洗小船。一遍一遍，用力地擦。那些砖红色的木板被她擦洗得干净光滑，像新漆过的一样。接着，她开始清洗渔具、雨靴、雨衣。就着舷外的江水提起来，揉下去，提起来，揉下去，雨衣上的泥垢就被江水带走了。

并排停在旁边的几条船只，船身糊满了泥浆。油漆被侵蚀久了，已经剥落，木板表层都是裂缝。看来被主人放逐在这里，多日不用了。

清洗完渔具，妇人开始整理吃过早餐的碗盘。那一定是凌晨从家中带着的早餐，来不及坐在桌边慢慢吃；潮涨是不等人的。他们用两个绿

色的搪瓷盆子装了，带到船上吃。就着来回移动的晨雾，一边吃一边挑一点喂给船头张望的白鹭。

男人把网一节一节地卷起来，捆扎好，一边查看着有无破损。他拉动船头的浮板，把自己渡上岸来。一只白色的油漆桶晃来荡去，里面装着今天一早的收获，几条黑鲫鱼，几条黄甲，还有几只并不肥大的江蟹，但因为是江中野生的，总能吸引一些厌弃人工养殖，对于自然生长有谜一般信念的老买主。

其实闽江边的渔民多数已经不能指望靠打鱼维持生计了。早在2000年初，政府就鼓励渔民上岸，有的安排到厂矿，有的给予失业补助。对岸就是这个城市最为繁华的商业区，CBD；超大体量的建筑群一到夜晚就会亮起炫目的灯光，那是最新科技操作下的灯光秀。这岸是他们的家。原先的窝棚早已拆除，他们都搬进了政府修建的安置房。这些闽江边的原住民，凭着对一条江的守候，已经拥有了令许多外地人羡慕的家底。随着近年来闽江沿岸楼盘的大涨，他们也早已不用为生计发愁。许多人因为拆迁都坐拥好几套房产，

价值几百上千万。他们的子女也告别了古老的生存方式，上大学、考公务员，或者到企业工作。

但打了一辈子鱼的渔民还是舍不得水中的生活。摇摇晃晃的船上的舒坦，大概是走在平整宽阔的陆地上的人所不能体会的。江上的自由开阔大概也是拥挤的城市所不能给予的。

作为旁观者，我每天清晨途经闽江。每天清晨看着这对夫妇清点渔获，如同参与了他们的生活。但我始终不曾和他们有过一句交谈，始终是一个旁观者。

我在他们漠然的眼光中，继续我的散步，或

者小跑。

沿着闽江跑。经过一座桥，两座桥，三座桥。

夏日初启，蓝花楹开放，闽江沿岸种了一溜的蓝花楹，在青绿色的浓荫中一树蓝紫色的花瓣高扬。怎么会有这么美的颜色的树呢？蓝色的花树。花瓣无声地掉落到地板上，一整片蓝色……有跑步的男士也忍不住停下来掏出手机对着拍，感叹着说好美啊。见我在看他，有点不好意思又腼腆地笑一下走了。

爱美有什么不好意思呢？



如果时间充裕可以再跑远一点，跑到花海，跑到鼓山大桥下。各种时节各种花。成片成片的紫色的马鞭草，黄色的硫花菊。不是羞答答地开，是轰轰烈烈地开，排山倒海一般地开，是像海一样翻滚着浪花而来。

闽江水如同一条加粗的波浪线，把这个城市最美的诗句划了出来，那么醒目、耀眼。

于是你总盯着江水看，看久了，你会以为它在倒流。这令人恍惚的怀疑的时刻，你如同看到你自己。

泅水的人从下游逆流而上，双臂轮番挖向水下，像在拥抱什么，又像在打捞什么。身后波浪千重万重地跟随着，阳光一打，好像披了一件浩荡的金色披风，又像一个人牵引着千军万马。

雨季的闽江，江水浑黄、污浊。一些上游的残枝、水草顺着浑黄的江水漂下来。水直接淹到步道了。整个雨季，都是昏暗的。天空，闽江，

全是浑浊的。即使这样，也有人下去游泳。多半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他们似乎一点不惧怕江水汹涌。他们从小在江边长大，入闽江，跟我们街道上行走一般自在。于是我们只能站在岸上，看他们戴着泳帽的圆乎乎的头像个皮球浮在汹涌的江面上，一点一点漂远。

落潮时的闽江干枯贫瘠，白鹭像捡拾残渣的流浪者聚集在干枯的河床上互相追逐，发出沙哑的叫声。那些停泊在江边的无主的船只像被遗弃多时。你以为它就会这么病下去了，丑下去了。不，它没有，自然界用一种无声的强大的力量修复它，水涨起来，一切又丰盈、光亮，不留痕迹。

人生不也是这样吗？一切都会随时间流逝。伤病和痛苦、贫穷和孤独，必然也包括美好的、令人留恋的情感。我们从未停止修复自己，完善自己。像一棵树、一朵花、一颗茶籽，会被闽江带到最适合的地方，然后，重生。



福州万寿江南二桥改建风波

潘 健

闽江自闽北逶迤而来，到达福州南台后分为南北两支，其中北支穿城而过，造就了沿江的繁华景象，但江水同时也阻断了闽江两岸的交往，仅靠渡船远不能满足民众交通的需求。福州闽江上最早出现的桥梁是宋代修成的浮桥。宋元祐八年（1093），知州王祖道以楞严洲（位于今天的中亭街）为中点，南北各造一座浮桥，总长3000尺（约1公里）。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楞严洲与闽江南岸之间又淤积出一个沙洲（即今天的中洲），将闽江水面分割出三条水道，浮桥也随之调整为北（今小桥位置）、中（万寿桥桥位）、南（江南桥桥位）三座。元至治二年（1322），一座新的石桥在原中浮桥的位置上落成。此桥北起台江汛，南至中洲，为纪念万寿寺和尚王法助为建桥所做的贡献，被命名为“万寿桥”，俗称大桥。清光绪癸未年（1883）桥梁被水冲散数丈，嗣后由里人黄鼎高、徐世玉、吴泰和等募缘重修。民国初年南端又被水冲坏，由福州电气公司修复。江南桥位于万寿桥南，与万寿桥中间隔着中洲岛。因长度仅及万寿桥的一半，故又名小桥。元代时桥有九孔，其中五孔为石梁，

四孔为木梁。清乾隆辛未年（1751）部分桥段被水冲坏，次年得以修复，木石混合结构均改为石梁。嘉庆十四年（1809）、二十年（1815）又两次毁于洪水，经闽县知县言尚焜重建。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28年秋许显时被任命为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积极开展各项基础设施建设。1929年底，路面阔及4.8丈的市路总干线（起自鼓楼前，终于台江汛）完工，通往闽南的省路总干线（起自福州的桥南，经兴化、泉州而入永春）福兴、兴泉、泉永各段工程也已次第完成，路面阔3.5丈，汽车可从福州直达永春。但连接市路总干线与省路总干线、横跨闽江南北的万寿、江南二桥桥面宽度，除两旁石栏外，不及12尺，最狭之处，只能容许一辆汽车通过，且承重量仅有1.5吨，成为通往闽南交通的瓶颈。此外，万寿、江南二桥长1400多尺，而闽江最窄之处——由苍霞洲的十六夹铺到仓前山的龙潭角仅900尺，且龙潭角附近的江岸均由岩石构成，不怕江浪冲刷，无须填塞河道加固岸堤。如果从修桥的难度和费用的角度考虑，选取龙潭角新修一桥将是更佳选择。因此，许显

时任职之初，即计划废弃万寿、江南二桥，在龙潭角附近新建一座铁桥。

但是，如果在龙潭角建造新桥的计划施行，热闹的中洲将成为孤岛，同时中亭街、台江汛和仓前桥头一带已有的繁荣景象将不复存在，因此遭到了利益既得者的反对。1930年1月6日又发生了轰动一时的“一六事变”。尤溪民军首领卢兴邦指使其部下卢兴荣，将包括时任建设厅厅长许显时在内的多名省政府高官从福州绑架到尤溪，省政府顿时陷入群龙无首的纷乱状态。为维持日常事务运转，省政府委员江屏藩被临时任命为代理建设厅厅长。江屏藩上任后，将此前准备在龙潭角新建铁桥的议案全盘否决，坚持改建万寿、江南二桥意见，所需费用则是将万寿桥北端的沙滩（西起苍霞洲的青年会前方江面，东至台江汛）填塞成新地后出售，预计可得款15万元，除偿还码头建筑费外，余款尽数拨充建桥之用。

日本大和工业合资会社听闻万寿江南二桥即将改建，便通过日本驻闽总领事田村贞治郎介绍，与福建省建设厅攀上了关系。日本大和称其曾在台湾包揽过数千万元的工程，备有各种工程机器，能在最短工期内将万寿江南二桥改造完竣，并保证大桥20年以上的使用寿命。福建省政府碍于日本领事的压力，决定把工程交由日本大和。中日双方订立了《改造万寿桥及江南桥合约》，内容共20条，大和工业会社负责改造扩展万寿桥及江南桥桥面，并修造桥脚，工程费共需大洋145275元，限期120天完工，由日本总领事

担保20年的改造质量。条约全文经1930年11月4日第73次省政府委员会议决，于12月6日由建设厅代厅长江屏藩、日本大和工业会社代表园部良治签字，日本总领事田村作为工程的保证人也在合约上签字。具体的“工程说明书”与“工程预算书”也于同日签订，对施工的技术、质量以及使用的材料做了具体的规定。

万寿江南二桥改造工程合约签订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刻遭到了民众的强烈反对。自“一六事变”发生之后，闽江上游交通断绝，福州商业因之停滞，市面商景艰难。介于万寿、江南两桥之间的中洲岛商号正想利用年关将至的商机，赚取一些利润弥补此前的损失，建设厅却在年关前后的几个月内修桥，断绝中洲首尾交通，置中洲的商号于死地。而中洲商号的停业或倒闭不仅涉及中洲住民，福州全城的经济也必然受其影响而发生动摇纷乱。时间上，每年1月至4月是福州最冷天气，加上春季雨水多，江水必然涨高，而两桥改造期间两岸来往只能渡船，不但交通不便，且有溺毙危险。而且开工时年关临近，闽江两岸民众往来、商品运输将更频繁，此时断绝桥上交通，实为不体恤民情。为此，中洲商民提议先改造万寿桥，暂留江南桥，使其可与南岸往来，不与外界完全隔绝；一旦遇有火警，也可向桥南逃生，不至于首尾无路，生路断绝。闽江驳船、木排两帮工人则认为，为修桥而填塞桥墩12门，将造成江面变窄，水流更急，驶船容易倾覆，放排更易漂散，要求不要填塞桥门。



20世纪30年代的万寿桥

1930年12月12日下午，各界代表前往建设厅请愿。代理厅长江屏藩以契约已订，不能变更，且桥门如不填塞，就没有土地可出卖，修桥费用无源为由，拒绝商民的请求。愤怒的民众只得对修桥合约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并向闽侯地方检察处举报江屏藩、福州工务局局长林恩溥二人涉嫌舞弊，认为江、林二人与承包填塞桥门的安平公司代表陈彦明互相勾结、营私舞弊。其证据有：一、合约规定由安平公司代垫填塞桥门、进行筑堤工程款19.7万余元，待将来堤岸筑好后，以所卖的地价优先拨还，若有盈余，则以七成归政府、三成归该公司为酬劳。而实际上，堤岸随筑随卖，公司垫款仅是前期部分，根本不用垫至19万元；且公司垫款全数收回后，堤岸如果还有余地未出售，建设厅将原定底价减少两成再进行投票，如果仍没人承买，则公司照减定底价

承受，但酬劳费仍照给，这样必造成政府吃亏。而安平公司的大股东就是江、林、陈三人。二、造桥工程由日本大和工业会社包办，据传就是林、陈二人介绍，实际上仅聘大和技师指导，所有工程均由林、陈自行包办，以致所开各项工程费不免浮滥。而且类似这种大工程，应公开投标，但这次合约只是由日本台湾土木建筑协会

推荐大和工业会社承办。

1930年12月20日，为侦查案情真相，闽侯地方法院特派检察官杨崇实带领法警、巡官，会同第五署警察前往南台塔亭陈彦明家，在其潮器处搜出江屏藩、林恩溥串同舞弊嫌疑证据百余件。证据搜得之后，经闽侯地方法院检察处首席检察官陈世镕同意，杨崇实连夜发出拘传陈彦明的传票，另票传江屏藩、林恩溥必须于12月25日到庭应讯，同时由福建高等法院检察官柯凌汉电呈南京国民政府中央，请将江、林二人停职，以便侦查后提起公诉。为应对告诉，江林二人四处奔走活动，不仅聘请律师多人为自己辩护，同时电乞省政府主席杨树庄援助。杨树庄以地检处票传厅长有损政府威信为由，要求高等法院审慎处理。12月25日，江屏藩、林恩溥到庭后，逐项为自己辩驳，将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同时还要

求地检处易人重新侦查，意图躲避汹汹民情。自被控后，江屏藩态度消极，多日不到厅办公，并令各科处结束业务办理，以致重要公事均停办。此时因“一六事变”得到解决回到福州的原厅长许显时决定于1931年1月15日回职视事。福州农工商各团体闻讯，推举代表于14日到许宅，痛陈填塞万寿桥北端桥门，致水利航行有十大危害，要求停止筑堤，但桥可继续改建，以便将来交通与商业往来。许表示，桥既已拆断，难以恢复原状，且与日方已订有契约，不好中途停止，须继续加以改建；至于填地筑堤工程，经1月22日省政法委员会临时会议议决暂缓进行，但因填地工程停止，万寿桥北端桥身须延长8径间。1月23日省政府召开会议，决定解除与安平公司的契约，改建二桥的经费由建设厅会同福州总商会分别筹垫。

在江屏藩、林恩溥舞弊案公诉的影响下，填地筑堤工程停工了，但大桥改建工程却令人失望。合约签订后，大和会社虽按照规定，于1930年12月9日开始施工，但开工之后工程进展缓慢，每天只有少数工人在江南桥上拆取石板，施工方法也多与合约不符。据时任省建设厅技正兼万寿江南二桥工程监工主任张馨报告，当时大和派驻工程的代表是个门外汉，施工错误尤多。如桥墩两旁模型与钢筋安装都是错误的，江南桥的中线与原施工平面图相核也不相符；合约中规定须用马牌洋灰（即水泥），日方却借口该品牌水泥尚未购到，擅自用日本洋灰取代，违反了合约

规定；各种详细的施工图样均未送到建设厅征求中方同意，因此其施工均无根据。

翌年2月底，承办万寿、江南二桥改建工程的日本大和工业会社主要人员、设计工程师及签约代表都已回国，无人负责工程。工程几乎完全停顿，每天只有六七名工人在桥上移石涂灰敷衍，已完成的工程质量与合约有很大的差距。为加快工程进度，省政府不仅按时将4期工程款共10.2万元如数付给大和工业会社，并加付工程补助款1万元，期望其能够在5月10日竣工。但直至5月，工程完工不及四分之一，4月10日前修好万寿桥桥墩的承诺根本没有兑现，万寿桥南端第十二墩虽经该会社修理一次，但纯属敷衍，桥墩下部依然倾斜如故；甚至连浇筑桥板桥梁混凝土须同日完成的基本施工要求都不能做到，而是拖延了两日两夜，严重影响桥梁的使用寿命。

到了1931年5月10日，江南桥的改建工程总算基本完成，但万寿桥除桥墩已着手修理（修理后的桥墩依然是倾斜的）外，桥面工程毫无成绩可观。自修桥半年来，由于交通不便，二桥两端的工商业损失惨重，商民纷纷向省政府请愿，请其向工程保证人日本领事严重交涉，督促大和会社遵守合约，尽快完成工程。为此，福建省建设厅与日本大和工业会社又签署了《改造万寿桥及江南桥合约之补充及修正》，工程费增至199035元；考虑到因中止填地及延长桥身原因，准乙方延期竣工，但1931年10月10日必须全部完工，如届期未能完工，每日罚以延滞金500元



如今的解放大桥

大洋，上述完工限期及延滞罚金，均由保证人负完全责任。此时的合约保证人已由日本领事改为社团法人台湾土木建筑协会会长藤江醇三郎。

10月10日万寿桥工程草草竣工。21日起先允许行人及人力车货物担通过，11月1日起开放汽车、马车、货车通行。改建后的万寿桥长1098.3尺（335米），江南桥长310尺（94.5米），桥面宽9米（其中行车道5米，左右人行道各1.5米），成为福州南大门的重要进出通道。但工程存在着不少问题，如桥面凹凸不平、主梁下垂、下缘开裂、人行道钢筋裸露等，尤以万寿桥为多。之所以出现种种质量问题，一方面是因为承包工程的日本大和工业会社偷工减料，浇筑混凝土所用的木模过薄、支柱过少，以致无法承受重量；另一方面，日方所聘的工程负责人员缺乏专业常识，错误层出不穷，如万寿桥北端3门内梁尺寸与计划图相较，深度竟然相差4寸之多，以致桥面浇筑混凝土时，两旁人行道均随木

模而陷落1寸至3寸不等，甚至外梁底面也出现弯曲之形；万寿桥南端第8门西边人行道与行车道连接处出现长约15尺的大裂痕，外梁梁底已成弧形，如果不是临时加用木柱支撑，外梁梁底的木架以及人行道早已倒塌。中方遂提出出现这些问题的桥面必须凿掉，重新建造，日方却只肯修补了事。甚至连最基本的载重试验，也因福建省政府要求尽快通车而予以取消。经济上，福建省方也付出颇大代价。除却工程费21万余元外，因工程延期，为修桥特设轮渡的费用亦随之增加了5万元，加上原来即需4万元，共计因拆桥改建，福建省政府耗款31万余元。而中洲商民因交通断绝影响所致的损失，亦不下数十万元。如此巨大的付出，换来的却是一个豆腐渣工程。幸好万寿、江南二桥原来的桥墩墩基稳固，能够承受20吨以下的载重，直至1970年9月再次改建之前，并未出现因质量问题而导致的交通事故，此乃不幸中的大幸。

满城飘香

——老福州人的文化情结

燕子

1

“真鸟仔，啄菠菠，三岁孩儿会唱歌，不是罢奶教奴唱，是奴腹老通通歌。”听到福州童谣，老福州人会忆起花深浓绿的荏苒时光，童年泛着泥土芬芳回溯心尖，感慨万千。然而，年轻人因不懂福州话，听罢会一脸迷茫，难以体味其间的韵味、情愫和故事。

福州话是汉语的八大方言之一，在唐末五代就已定型。它有 4321 个音节，与之对应的有 13000 多个文字，其注音系统带着古汉语清、浊音以及“平上去入”四声调，共计八个节音，俗称八音。若不是从小耳濡目染，一时是很难学会的。

福建省非遗保护项目“福州方言八音”，福州市传承人施文铃，曾进行街头问询，发现生活

在城区的少年，三四千人中仅寥寥几人懂得福州话，知道方言八音。普及率如此之低，让他难以置信。在他看来，八音是福州话的基础，而福州话是福州文化的根脉和筋骨。福州方言失传，本土文化便苍白无力，站不直亦走不远。

施文铃是在评话声中长大的，对家乡话满含深情。青衣长衫的评话先生，操着纯正福州话，



施文铃为小学生讲述福州方言八音的历史

一把折扇，一杯茶，一说一唱，一瞪眼，便把历史、江湖、风情演绎得真真切切，百转千回，跌宕起伏。年幼的他沉浸在声声切切的世界里，迷上了话本，迷上了福州话。他经常趿拉着拖鞋，屁颠屁颠地跟在大伯施尚利身边，问东问西。大伯倍感欣慰，常拿出线装的《戚林八音》字典，一字一音地教他。诘八音“君滚棍谷；群滚郡掘”韵律像诗歌般优美动听，浸染着童趣和春色，根植于施文铃心底，让他未曾遗忘。

小学课堂上，他淘气地用福州话写字条，在班里传来传去。年轻老师走过来，把字条抓到手里，展开一看，傻了眼。字条上的字句，简直是天书，读不顺，也看不懂。当时他觉得有趣，如今回想起来，却难免惆怅。时代日新月异，福州话却濒临断层，几近消亡！

不能让家乡话继续失语下去！凭着一腔热血、一份责任，他开始系统地整理“福州方言八

音”和福州话歌谣、俗语等民间文学。他跑遍各大图书馆，抱着古籍一页一页地寻找失落的字句、字音，走街串巷地记录、搜集依伯、依姆们的闲谈碎语。历经多年，废寝忘食、笔耕不辍，编辑出版了《福州八音字典》等书籍。在有关部门支持下，“福州方言八音”从区级非遗，到市级非遗，最后到省级非遗，一步一个台阶，重见曙光。作为传承人，他身兼重任，夜以继日地进行公益宣传，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以开讲座、录视频等各种方式，下基层、进社区、入校园，殚精竭虑地普及福州话。

他的眸子深处燃着不知倦怠的热情，像一个披甲执戈的斗士，一坚持就是十几年。书桌上的台灯总是亮到深夜，拜访、电话、书信络绎不绝，他都一一回应，用心聆听着人们真挚绵长的诉说。

一位福州籍的台湾人特意打电话找他请教八音读法。苍老声音在听筒里有些急促，情绪显得激动。融入台湾太久，同辈们的福州话已讲得七零八落，后代更是一窍不通。每次听到亲切、熟悉的乡音，内心都深受触动，乡愁像闽江水般泛起粼粼波澜。有同样感触的，还有一位马来西亚华侨。他的爷爷跟随下南洋打工浪潮，移居至马来西亚，终身为生活奔波、打拼，鲜少回福州。临终前，他拉着儿孙的手嘱托，一定要替他回家乡看看，学一学许久未听的福州话。他怀着爷爷的遗愿而来，当唇齿里发出“女后”“歇蛮”等地瓜腔时，才真正领悟“如果忘了乡音，那么根



《福州八音字典》，施文铃编著

就没了”的深意。

令施文铃惊喜的是，一些日本人对福州话也产生了浓厚兴趣。福州话被誉为“唐朝普通话”。唐代，日本人利用汉字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因此福州话与日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修理”一词，日语和福州话一样，都念成“锈里”；“日本”的日语有 nihon、nipon（罗马字音）两种读音，nipon 则与福州话基本相同。此外，“洗汤”（せんとう）、“洗面”（せんめん）、“世界”、“将军”、“一般”等读音也是相同的。许多在福州工作的日本人，认识到两种语言的渊源，觉得既有趣又神奇，也咿咿呀呀地学起来。

这些点滴回馈的温暖，消解了施文铃的忐忑和辛劳。

施文铃知晓自己不是孤军奋战，许多有情怀的文化同行已默默耕耘数十载。闽侯酒厂原副厂

长王可铨，退休后钟爱福州话，竭尽心力 22 年，拿出全部积蓄，著书立说，为家乡发声；前不久离世的福建师大体育馆退休职工林圆，几年前在信息工程师张敬武帮助下，凭单薄之力，开发出有声福州方言字典……

“热爱家乡，热爱家乡文化。”两鬓苍苍的他们，怀有火热之心，为文化星空的璀璨奉献出点点光亮。

2

台江区高桥支路有一个南仙茶摊。狭长空间，一张檀木色方桌，一壶茉莉花茶，20 多个座位，施文铃等方言守护人，以及卢美松、林山、邱登辉等福州文化学者常在此开坛讲课，街坊邻里拿着本子和笔，边听边问边记。岁月潺湲，清



高桥支路上的南仙茶摊



民俗专家方炳桂（右一）与翁文峰在一起

风烟柳，闽都历史文化、名人典故、风土人情、名胜古迹、小吃习俗等伴着茶香，回荡在攀谈、闲聊里，呈现着一种文化气象。

南仙茶摊的发起人翁文峰回忆道：“茶摊的恢复不得不提已故去的方炳桂老师。十多年前，他问我：‘能不能借用你这个地方，把茶摊文化恢复起来？’他还讲，茶摊做起来不挣钱，还要贴钱进去。我说没问题。大家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做。没想到我们这样子，一做就做了这么多年。非常欣慰！”

茶摊文化受到市民青睐，翁文峰特别感谢主讲老师们的全身心投入。有的老师要讲“番薯粿”，就提前在家做好，用塑料薄膜密封后，端过来请大家品尝这热气腾腾的美食，主讲人与听众有问有答，授课在“碎喘”、攀谈中轻松地愉快地完成。20多平方米空间，有时门内门外超载般挤满了人。

“方杰老师是鼓楼区税务局干部，因钟爱文化，经常放弃周末休息时间，来这里攀讲。每讲一个主题，事先便背上相机，实地走走看看，图文并茂地做好功课。他不觉得辛劳，享受其间的乐趣，有时还会有很多新收获……”

前段时间，方杰等几位老师在乌山发掘出几块珍贵残碑：郭柏苍的《乌石山新建三仙楼碑记》残碑、乌石山范承谟御赐碑首残片、朱筠游乌山题刻等。兴奋过后，他们集中对残碑进行清洗，清除青苔、泥土，用水擦洗岩壁，并对残刻进行部分描红、拓本。“没有全描，仅对有字的

石刻描红，已灭失的文字保留原样，保留残缺的美。”这一发现，在茶摊乃至整个福州文化圈引起不小轰动。

茶摊日渐繁盛，事务繁忙，翁文峰一个人忙不过来，许多老街坊就主动过来帮忙。80多岁的刘德铨，捧着签到簿来回穿梭，做好登记；70多岁的林灼官，端着水壶添茶倒水，给大家送瓜子、花生、茶糕等小点心；中学退休教师郑毅，分发自费打印的文章，包括福州民俗、诗词摘抄、文学常识等内容。“只要茶摊开讲，他们就出现在这里，风雨无阻。”

某次“攀讲”，翁文峰听老一辈人回忆，福州曾有10万亩茉莉花田。走到城门，步入上街，沿途都能看到大片的雪白茉莉花。翁文峰依稀记得，幼时自家房前屋后也都是成片的茉莉花。为了重温儿时记忆，再现茉莉花城丰貌，雷厉风行的他，决定为市民免费送茉莉花苗。几年过去，初心不渝，累计送出茉莉花苗200多万株。

2020年4月份，他又从茉莉岛基地剪枝收集20多万株新鲜茉莉花苗，分送到各个领取点，再次向市民免费赠送，并悉心传授种植知识。市民郑美英每年都会来领取，是该活动的“忠实粉丝”。她赞道：“这些茉莉花苗种成后，开出的茉莉花特别硕大、特别香，我自家庭院已经种了好几盆。今天帮亲朋好友代领，他们都很喜欢茉莉花……”

这座被深爱的城市，它的文化与美被千万福州人悉心呵护着，就像这一株株茉莉花苗，在阳

光照耀、雨露滋润下，定会成片成片地抽芽、盛开，迎来文化绚烂、满城花香。

3

风景秀丽的乌山半腰，有一处庭园，两三栋白墙红木青瓦古厝，一片不大的平地种植着桂树、茶花、木瓜等，青翠掩映，风雅幽静。这里便是“闽都乡学讲习所”的基地。讲习所经常开展文化讲座、志愿服务等活动，内容涵盖文史、方志、民俗、饮食等各个方面，聚集了37名专家讲师、上千名文化志愿者。邱登辉既是南仙茶摊的常客，也是讲习所的讲师，深爱福州文化，对民俗节俗颇有研究。

说起邱登辉与福州节俗的渊源，时间还要回拨到几十年前。小时候，每逢重阳节，大庙山便人潮涌动。传说大庙山上有一块从天而降的陨石，三四尺高，带有灵性，站上去，小孩会长高，大人则会延年益寿。大人牵着孩子前往登高，各类商贩也聚集于此大声叫卖，竹子做的水枪、大刀，马粪纸做的孙悟空、猪八戒、关公的花脸壳（面具），各式纸鸢，以及金黄甜糯的九重粿等琳琅满目，

令人目不暇接，充溢着十足的市井烟火气。邱登辉欢喜地紧跟父母沿着石阶一路往上挤，手里玩具越拿越多，嘴里美食鼓鼓囊囊。

年岁日长，原先纯粹喜爱热闹的心性，逐渐成熟，对节俗喜庆背后的文化和故事，生发出急切的探究欲。某年端午节，西湖、左海公园举办赛龙舟，他挤在人群里，惊讶地发现西门村的龙舟舟首并不是龙，而是雕刻得栩栩如生、威风凛凛的红马、白马。活动结束后，人群散去，他迫不及待地跑到西门村舟手面前，虚心请教。舟手边拾掇船桨，边笑着回答：“这跟我们的图腾崇拜有关，我们信奉马的坚毅、强壮，在舟首雕刻马形，相信马会保佑我们平安、顺遂。”此后，邱登辉又实地去了几个村子看龙舟，甚至前往雕刻师傅家拜访。雕刻师傅热情地拿出一幅幅照片或者



“闽都乡学讲习所”基地

模具样式，青蛙、象头、虎头、凤凰等各式各样的舟首，让他叹为观止。

他对节俗文化越发痴迷，通过各种途径，奔走调研、查阅典籍，累积十几本笔记，对福州节俗了如指掌，随时随地都能侃侃而谈。“福州有3个特有节俗，其他地方没有。比如上巳节，有许多掌故逸闻，很有意思，我希望更多人能够了解……”

三月三上巳节，邱登辉会组织一群年轻的闽都文化爱好者到郊外、田头地角采荠菜。民谚曰：“三月三，荠菜当灵丹。”遍野的荠菜开着白色小花，清香怡人。年轻人边蹲着扒菜，边聆听关于上巳节的风俗。

原来，古时上巳节有一个“畔浴祓禊”的重要习俗：人们结伴去一处风景优美的清澈水源，以春水洗涤污垢，期望除去冬天所积存的病害。唐宋时期，“祓禊”习俗渐渐汰去，演变成为一种群体春游活动……

“春游”结束，采摘的新鲜荠菜，带回家可炖、可煮、可炒、可烹，还可做馅。尤其剁碎混合鸡蛋或豆腐做馅包饺子，清甘鲜美。品着上巳节美食，回味上巳节文化，潜移默化的传承带着香味，自然飘得更远。

上巳节还盛行一种游戏：曲水流觞。大家坐在溪渠两侧，盛酒的酒杯弯弯曲曲顺流而下，停在谁面前，谁就取杯饮酒，并作诗一首。现在的乌石山风景区北面山麓，便有现代人设计的“曲水流觞”处。据说，建成后还未使用过。邱登

辉、百六峰诗社社长陈明安等人希望新冠疫情结束后，选个风和日丽的日子，联合“天下汉服”等单位，共邀良朋佳客，举办“曲水流觞”活动，吟诗作赋，补过上巳节，让它成为福州诗坛一大盛事！

乌山文脉鼎盛，从“曲水流觞”处侧望，几棵银杏树、一片小桃林相间处，可窥见一座古建筑。那是闽都文化研究会的办公地。闽都文化研究会集结100多位文化专家、顾问，举办闽都文化论坛、开辟闽都文化讲堂、出版文化丛书，影响海内外。其主办的《闽都文化》刊物，古色古香、图文并茂、文风隽秀，深受大家喜爱。方炳桂、邱登辉等民俗专家曾为刊物供稿，讲述淹没于闽都记忆里的世味流年。

为了以开放姿态扩展闽都文化的广度和深度，《闽都文化》刊物近期还开展了进社区问卷调查活动。社区读者反应热烈，一张张反馈信息，饱含温情和鼓励。鼓楼区东街街道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林丹读罢刊物后，有感而发：“身为一名土生土长的‘闽都人’，我挚爱这方热土，更深爱闽都文化的精气神。我将《闽都文化》期刊翻了一遍，闽都秀丽的山水风光、古代近代现代发生在闽都的一些故事及作者自己的见闻，如琴弦拨动我心，让我陶醉，神游其中，似亲身体验了一把‘闽都文化’之旅……”

越来越多的文化热心人士心手相连，以爱为火，温热着闽都文化美酒，让其愈加绵长回甘、香飘四溢！

走过康里

陈守溢

第一次到屏南康里是因为当地举办文化节，朋友邀我同往。朋友说，去康里的路有两条，但都要从水泥路往小道上走，再翻过几座山才能到。下车后，看见村子被群山环抱着，才知道康里离县城确实有点远了，给人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也许是因为我走得少，才会觉得康里远。天空中的云彩，仿佛一伸手就能碰到。这样偏僻的村子，为何会举办文化节？我深感不解。康里，于2018年12月获批“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其实，在我第一次到康里时，就感受到了那股浓厚的文化氛围。

康里分新旧两个村。当时，在新村的长街上，我看到了传统手工艺的复兴。上了年纪的老奶奶，将自己绣的鞋子、虎头帽等物件摆出，供人欣赏。老奶奶绣得细致，无论什么动物，都给人栩栩如生的感觉。那一针一线间，呈现出的是





康里编百索

一代代手艺人留下的精湛技艺，以及对美好事物的不懈追求。绣龙像龙，绣虎像虎。太逼真了，我拿起相机，拍下了美好。这是我在康里最初见到的、也是最真实的美。老奶奶一定在布艺上花了许多精力，对它们进行研究，才会绣出如此精美的物件。

旧时的康里，进出不便。由于古田旧城到霍童的古道从康里经过，康里人也会将自产、自制的东西拿到古道上与过往的商人交换，渐成风气，代代相传。老奶奶肯定是在年轻时就开始随着师父学习女红，并传承了古老精湛的女红技艺。随着年龄的增长，技艺也日渐成熟，手中的针线活也越做越细致。

到康里，我喜欢去旧村走走，探寻那早已消失的岁月。据说，旧村繁华时，曾有人在炒面店里说书。说三国，讲水浒，说书先生讲到激动处，甚至手舞足蹈地给看官比画起来。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怎样的场景，能让康里人至今念念

不忘？无法想象，如今，往日的热闹景象已不复存在，只留下一条宁静的街以及成排的老房子。老房子安静地伫立在那，成为一种记忆。康里旧村的安静与别村有所不同，它并不是因为村里人外出谋生而变得如此，旧村人只不过是搬到了隔壁的新村，旧村依然与他们日日相守、日日相对。

据说，康里新村所在地原本有一座山，为了建设新村，康里人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将高山夷为了平地。新村，就在这平地上拔地而起。在新村里，不仅能看到一代手艺人精湛的技艺，更能体会到一种敢于挑战大自然的不屈精神在一代代康里人的血液里流淌着。那一座座四层半的小楼整齐划一地矗立在那，与旧村形成鲜明对比。

现在，康里人精心编排，为客人呈上一台又一台文化盛宴。而文化盛宴的总策划，则是由村里的民俗专家郑福顶先生担任。

老郑学识渊博，对乡土文化更是了如指掌。老郑在城关开了一间小店铺，专门从事帮人代写



康里旱地龙舟赛



女村民身穿汉服祭祀屈原

家谱、代写文书等工作。康里文人不止老郑一人，有书画家、作家，可谓文风鼎盛。这文风是有源头的，村中有始建于康熙初年的翠峰书院。书院由八九座古民居组成，里面教学设备齐全，培养出了许多学子。文有根，艺有脉。康里先人重视教育，给康里人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使康里文不断根，艺脉长存。

康里位于闽东山区，受地理环境限制，无

法在湖上赛龙舟。但康里人敢于创新，开创出陆地赛龙舟，名曰“旱地龙舟”。赛龙舟——这个起源于明嘉靖年间的民俗赛事在康里人手中有了新玩法。龙舟最初是由竹子编成，外围包上一层纸，人行其中。2017年，康里人将龙舟装上轮子，用实木代替了竹子。端午的康里，不仅有赛龙舟，还有祭祀大典、女红展示、踩街等民俗活动。节目一个比一个精彩，让人流连忘返。

康里旧村中有一圆湖，名曰“鉴湖”，位于村之水尾。端午当天，康里村组织村民百余人，穿着汉服，扛着屈原像，举着印有“嘉宾”“风调雨顺”“书童”等字样的牌子，挑供品的挑供品，敲锣的敲锣，吹唢呐的吹唢呐，一路热热闹闹地从旧村穿过，前往鉴湖，让人觉得仿佛是在过年。到了鉴湖，锣声与鼓声再次响起，湖中心有个台子，屈原像被抬到了台上，摆上祭品。此时，古曲响起，伴着悠扬的古曲，身穿汉服的女村民跳起了祭祀舞。舞毕，主祭人向屈原像献上祭品，并读起了祭文。接着，主祭人又向屈原像三叩首。礼毕，仪式结束。仪式庄严而凝重，让人肃然起敬。祭祀大典，让人感受到了康里人对传统节日、对传统礼仪的重视。真没想到，在这偏僻的康里，也能让人大开眼界。大概正因康里偏僻，不受现代文明干扰，才让这仪式得以完整保存。也许，这才是对端午节、对屈原的最好纪念。

正如时下人们常说的，一村一品。在康里品出了它独特浓厚的味道。

恒盛布行拾旧

江梦笔

—

1917年的某天，天色暗淡，福州上杭路上人来人往，一位步履悠悠的女子吸引了众多行人的注目。一个转身，她的身影消失在217号，她来这里要选一块雨过天青的料子做新衣裳。这位连料子颜色都挑得如此诗意的女子，便是福州才女庐隐。

上杭路217号，便是当年风靡福州的时尚地标“恒盛布行”。厚实的砖石墙、中开尖顶石框门、中式浮雕，建筑立面里有典型的西式巴洛克的手法，风格呈现西式折中主义。二楼阳台的铁栏杆十分精巧，抓人眼球，简化版的爱奥尼克柱就矗立在圆形漏窗两旁。

再走近一些，抬头便能看到大门赫然刻着“恒盛”二字，行笔徐缓，连贯顾盼，每一笔都遒健俊爽。如果字也有性情，可说是清骨嶙峋。



上杭路恒盛布行旧址



大门上刻着“恒盛”二字

眼光移到落款处，小字醒目挺立着“八十五叟陈宝琛”。作为末代皇帝溥仪最倚重的“智囊”，陈宝琛不仅精通诗歌，书法功力也深厚坚实，有“伯潜体”之称。

一家布行能得到帝师的题款，无形中也展示着它繁盛的一面，“恒盛”寄语生意长久，长盛不衰。如同世上没有一劳永逸的生意一样，福州双杭的布行跟随瞬息万变的形势也走过了跌宕起伏的历程。在清末至民国初年，布行多以旧式染坊形式存在，自染自碾。1914年“一战”爆发后，欧洲各国对华倾销数量锐减，纱布市价猛涨，棉纱织厂获利颇丰。1919年到1937年民族资本迅速发展，布行生意迈入动力机器生产初创阶段，

为民间布行的崛起提供了有利条件。随着抗战结束，市场对花色布匹需求增加，整个行业兴旺，但短暂的虚假繁荣后，福州双杭的布业彻底陷入了困境。1932年，85岁高龄的陈宝琛为恒盛布行题字时，正是恒盛布行发展的鼎盛时期，在激荡的市场风云中，它与时代周旋，在同行中头角峥嵘。谁能想到它也要面临命运的旋涡，起伏的经商之路，犹如书法的提按顿宕，让恒盛布行在岁月中拥有了多维立体的角度。

二

城南的老台江，又称“南台”，是航船由闽江入省的第一站，而上下杭街区就是台江商贸最初的发源地、集散地，是当年福州的商业中心和航运码头。清代中期至民国初年，这里商帮云集、贩夫走卒不断，是三教九流聚集之地，金融业兴旺发达，是当时经济发展的微缩模型。整个街区呈“二横三纵”的倒“日”字形的布局。

早期，在上下杭两条直街及连接双杭的隆平路上，分散着许多布业批发商和零售商，分布形状如汉字“土”字。据相关资料记载，民国时期上杭路就有20多家大户的布行，称得上“棉纱布一条街”。台江棉纱布业先有老“三杰”，双杭占两名，即陈恒记的陈俊甫和华通纱布行的龚忠贞；后有新“三杰”，双杭仍然占两名，且资本最雄厚，即益兴布行的邱华玉与联友布行的罗祖荫。

创办于晚清1890年的恒盛布行是双杭最早

的布业巨擘，以销售高档丝绸和布料为主。翻阅一些资料，我才大致了解布行的创始人黄瞻鳌的创业之路。13岁的他曾在福州南台“林恒盛”染布店做学徒，他大概做梦都不会想到20多岁后的自己会如此走红。他凭借着精湛的技术、精益求精的态度赢得了老板的赏识，有了老板青睐，他的职业晋升之路通畅，先是负责管理染布行的日常事务，后又派到上海的林怡记汇兑庄司账。这些经历让他早年就积累了丰富的企业经营管理经验，为他之后的经商之路埋下了伏笔。老板林裕源辞世后，其子及股东不善经营，便将布店全部盘给黄瞻鳌。1890年，他将店名改为“恒盛布行”，又名“黄恒盛绸缎布匹庄”。

螺蛳壳里做道场，黄瞻鳌凭借颇具前瞻性的商业眼光和审美水平，没几年的时间便把生意经营得风生水起。从最初的经营土布、染布业务进而扩大到销售绸缎纱罗、高档商品等，批发量占80%以上，成为这一带布行大户。接着，他开始紧锣密鼓地上海、顺昌洋口做绸缎布匹买卖，兼营汇兑等业务，在福州本埠也开办起汇兑庄，业务扩及延平、建宁、邵武等地。在福州他跨界办起“齐懋元”“大兴”“长丰”等酒库以及“福源绸布行”“永安堂纸店”等，资产达200多万银圆，产业涉及钱庄、布庄、酒库、煤矿等20个行业。民间称呼黄瞻鳌、黄瞻鸿兄弟为“二百万富翁”，从此，他们跻身福州商家十大家族之一。他的晚辈也一直将生意做到20世纪40年代，黄氏家族的经商之路50载长盛不衰。

在商贾云集的CBD中心，若仅靠商人的精明，远远不够。他不仅重视资本的作用，也注重商业信用的积累，通过兼营钱庄，四两拨千斤，又步步为营，让恒盛布行享誉盛名。有资料显示，当年在沪的汇兑庄“黄丰记”信用度极高，只要经它铺保的商号，期货交易款可达万元。

除了硬实力，他还具备强大的软实力——超前的审美理念。受外来文化冲击，彼时服饰呈现多样化、西洋化、自由化，从晚清的袄裙过渡到文明新装、洋装，从宽衫长袖的宽松繁复蜕变为紧窄裹身的简洁风。服饰变化让他不得不站到时尚的前沿去引领服装面料的潮流。恒盛布行在独特的环境下走出自己的路子，成为当时全福州时尚界的翘楚。

时代的暗流深藏在繁荣的生意之下。从清朝末年开始，日商就雄心勃勃地巩固在福州的垄断地位，与英商、德商、荷商在各个行业展开竞争。日商先是垄断了丝光纱线，接着通过新法精练，挑战传统印染业，间接抢占布行市场。恒盛布行销售日产“东洋布”获利颇丰。外来的布料和花色，无疑给当年时装的多样性增色不少，也吸引了一些客源。1918年“一战”结束，日本接到许多订单，彻底垄断了福州市场，“东洋布”取代“西洋布”。

1919年5月，福州学生响应北京五四运动热潮，要求调查大量囤积日货的恒盛布行。黄瞻鳌让其弟黄瞻鸿出面，设法拒绝学生检查。黄瞻鸿将翻墙进宅的学生打伤。黄瞻鳌谎报学生为匪，

请福建督军李厚基拘捕学生首领，封闭全闽学生月刊社，但学生通电全国，获得各地声援。李厚基迫于群众的压力，只好拘捕黄瞻鳌、黄瞻鸿兄弟。这就是抵制日货的“福州黄案事件”。“福州黄案事件”以后，恒盛布行的生意虽一落千丈，但它在当年的布行里依旧不落下风，由此可见它雄厚的资本积累和强大的社会影响力。

1919年11月15日，日本驻福州领事馆为破坏抵制日货运动，派出便衣警察殴打表演爱国新

剧的学生，次日又打死、打伤多名学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福州惨案”。在京就读的庐隐在惨案发生后到福州会馆参加同乡会，并加入了《闽潮》的编辑部。如同“五四”思潮的激荡、热血，同时期的布行的发展也一样充满了机遇与震荡，在时代的激流里，被裹挟着向前。

1949年后，恒盛布行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的司令部，后来又移交给航管局系统作为职工宿舍。



福州台江上下杭

三

现在走到上杭路，仍可一览这座建筑。一楼是曾经接待客人、招揽生意的地方，二楼是办公区。室内的光线昏暗。阳台上的铁栏杆默然，窗户垂着眼睑，吱呀的脱漆木门自顾自诉说着旧事。

如果能穿越时空，也许能窥见店内长长的柜台，帘幔厚重，案台上的留声机嘶哑，手持尺子的裁缝们给太太小姐们递来各色高端的布料，根据她们的要求裁成了她们喜爱的款式。各种服装在小姐们身上变化出各式造型，旗袍掐出她们纤细的线条，小巧的短袄拼接着阔大的喇叭袖，玉臂皓腕时隐时现……从这里出来走几步就能到三捷河，灯光桨影里荡漾着酒榭歌楼的倒影，小姐们夺目得如同撒在水面上的点点星光。渡口船头，有的是故事。

——这些仅仅是我的假想。在历史的视角里，故事又有着另一版本。

清朝枝巢子在《旧京琐记》里，曾对绸缎庄生意进行描述：“各大绸店必兼售洋货，其接待顾客至有礼貌，挑选翻搜，不厌不倦，烟茗供应，趋走殷勤，有陪谈者，遇绅官，可以应对几句时事，遇文人，也略知几句诗文。对待妇女顾客，一定会炫耀新奇，曲尽交易之能事，一定要让不同的顾客，都高兴而来，高兴而归。”虽然他是针对山东绸缎庄生意的一种细致观察，也提到与南方铺肆的“施施之声音颜色相去千里矣”，但是，

对高档布行生意经营状况而言，他们面对的是同一类殷实的权贵人家，生意里的讲究有共通性，无非略有差异而已。

如今，随着对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文物古建的挖掘、保护和再利用，这里的商贾文化也有了重生、复苏的迹象。但是，恒盛布行所在的这一带的文化挖掘刚刚开始，若不是因为陈宝琛的题字，我差点在迷宫似的街巷中一晃而过。

恒盛布行门楣上的石刻有些斑驳和损伤了，但令我吃惊的是陈宝琛晚年的书法竟没有一丝龙钟之态，风骨未被岁月剥蚀掉一分一毫。书法挺括又硬气，恰如他桀骜不驯的性情。那时85岁高龄的陈宝琛仍然以垂老残躯强撑破局，不知写下“恒盛”这两字时心情如何。

布行命运与时代盛与衰的强烈冲撞，让人不禁发出繁华消歇的感慨。现在恒盛布行前面，一片偌大的废墟之地与它隔墙相望，似乎呐喊一声都能惊起些鸟鸣。更难以想象当时市廛百业的繁华，还有那些闯巷贩夫为了兜售货品而吆喝的喧嚷。两岸活色生香的三捷河，彼时充斥着刨斧凿锯修船的忙碌，船上还飘荡着浓郁的海腥味，这些既兆示日子的富足，也隐含着度日的艰辛。

时代的余温褪去后，留下这些承载着记忆的老建筑，它与岁月生死契阔，看起来坚不可摧，但也许某一天它就和这片土地和解、消融了。从这里引出的老福州时装与时代的话题，不知是终结还是有更多的喻示呢？

五福巷往事

傅振明

曾经的五福巷位于福州五一广场观礼台这个位置，东始市人大边上，西至南门兜。巷里大多是木板房，厢房结构，设前后厅，一般分楼上楼下。巷子路面由大小不一的石块铺成。五福巷或宽敞或窄小，被那些纵横交错弯弯曲曲的巷道分隔着，聚成了一条不规则的巷弄。打开家门就能听到“吱吱嘎嘎”的推门声，少见步履匆匆的过往，感觉这是一条悠闲安逸的小巷，充满了生活气息。据父辈说，我们一家子 1949 年以前就迁入

五福巷了。

五福巷既没有三坊七巷文运兴盛、人文荟萃的历史底蕴，也没有达官显贵的传世之作，更不能与大理古镇、丽江古镇、凤凰古城相提并论，但是街头巷尾乡土乡情十分让人怀念。

特别是民间传统手工艺加工：裁缝、染衣、修理钢笔、精修钟表、磨刀剪、刻印、糖画、吹糖人、捏面人泥人、爆米花等，这些手工作坊如散落的珍珠遍布在五福巷的前前后后。





“染青染蓝”吆喝声

我有一件米黄色的“老人头”全棉便装，洗了几次褪色了，扔了太可惜，想拿去染深色的，可是苦于无处化“腐朽”为“神奇”。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旧厝五福巷，就在我家正对面的染衣作坊“染青染蓝”。

这家店主人是个中年男子，每天上午一头挑着一口锅和柴火，另一头挑一个箱子，里面装着染料等用品，风雨无阻地上街兜揽生意，口中吆喝着：“染青染蓝……染青染蓝……”临近中午才满载而归，下午开店染衣。

小时候，我会神情专注地坐在一旁看着他“染青染蓝”，听他侃侃而谈。染衣火候很重要，染衣前锅水要热，下料后充分化开，加温至开锅后，再冷却至 30℃—40℃ 之间，投入织物，在染衣过程中要经常翻动，染色时间约半小时。出锅



后洗去浮色，用报纸或旧棉布包扎，放入蒸锅猛火固色约 40 分钟。染衣分面料和成衣；可以是新的，也可以是旧的；质地以浅色棉麻为佳。出锅后漂洗干净，去水、整平、熨干。一件旧衣，立刻成了一件漂亮心爱的新衣。

人们很少用的一个字“缣”，即：夹缣、蜡缣、绞缣、灰缣，囊括了所有的传统印染技艺，即今天所说的夹染、蜡染、扎染、蓝印花布。它不仅满足了现代人的保暖与舒适的需求，还让现代人穿出个性与品位。

磨剪刀和着悠长乡音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老一辈的街坊对“磨剪刀”这个行当并不陌生。师傅们挑着加工用具，手提特制磨刀工具“嚓嚓嚓”地敲，随街吆喝着“磨剪子嘞，戥菜刀……”，替人家打磨剪刀、菜刀、斧头等各式各样的刀具。五福巷

至少有3家磨剪子小铺。

在过去物质贫乏的年代，每件物品都显得珍贵。家中日常用品，人们都会非常爱惜。刀具钝了，花上一两块钱重新打磨一番，就会仿如新品，锋利无比。

距我家十来步远就有一家剪子铺，号“老雷磨刀”。这家磨刀师傅姓雷，为人踏实、忠厚但好酒。每逢过年过节他都会免费为街坊邻里磨剪刀和菜刀。有的刀口损伤缺口，他就先用砂轮打磨，再用磨刀石打磨。磨刀石有粗细之分，他先用粗石磨后再用细石磨，使其光滑锃亮。

雷师傅还承接来料加工刀具。一般来料是弹簧钢，有的是不锈钢。他首先点燃炉火，打开鼓风机将炉灶烧旺，然后将坯子丢进炉火中，待烧得通红，夹出用锤反复打成刀的形状；接下来是用大锤整样，再淬火，敲得叮当响；再接下来是打砂轮、打布轮，将其磨光、抛光，再磨口，最后上刀柄。

“磨剪子嘞，戥菜刀……”这耳熟能详的吆喝声，伴随着我们几代人走过了难忘岁月……

被遗忘的手工刻印

五福巷有一家手工刻印小铺，玻璃橱窗里有各式各样的印章坯子，橱窗上立着“刻印”二字。店主人患有小儿麻痹症，终日蜷缩在一张躺椅上，路人和客户都喊他“师傅”。

手工刻印源自活字印刷术，至20世纪80年代，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私章，那时刻制印章的生意很好。现在这个行当已被人渐渐遗忘了。

印章的材质分红木、寿山石、有机玻璃、牛角印章等。像玉雕、钢印、铜章、公章，雕刻师傅则做不来。雕刻字体一般是楷体、宋体、篆体、隶书。师傅写着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刻章时字体必须反写，增加了许多难度。

小时候我喜欢观摩师傅刻章的过程。他说刻章的过程中要心无杂念，不能一心二用。他时不时将圆形放大镜夹在眼窝，小小笔刀在方寸之间行走于纤毫，耕耘在刀笔之末：弧形、抑扬、交错、撇折、提、横、点等都要靠刻印者的刀工技



法来体现。刻印又称凹凸作品，在光线聚合下呈现出视觉效果，是立体的书法创作。

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如今电脑刻印、回墨印章、铜印章、原子印章等，对传统手工刻印形成巨大冲击。但是，手工刻印表现的字体富有韵律感，线条古朴自然，有着独特的艺术价值。反观机器篆刻的文字相对死板，是字库文字模版的复制，只是线条均匀而已，缺少艺术价值。

裁缝，曾经的“香饽饽”

五福巷布满了小商店、食品店、杂货店……人来人往，热闹而市井。在这些小店中，裁缝店显得颇为安静。量体裁衣，20世纪80年代之前一直是百姓生活的必需，虽然那个年代人们并不富裕，但内心依然充满对美的向往，裁缝可以说是引领时尚潮流的人。

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岁末年初，我家请来一位老裁缝到家里“走场”。老裁缝是长乐人，50岁左右，穿一身很得体的中山装，说话很斯文：量体裁衣是一门手艺，所以也就有了安身立命的资本，无论走到哪儿，靠着一台缝纫机、一部拷边机、一把剪刀、一把尺子、一块划粉和一个熨斗，就能养家糊口。老裁缝从布料到成服，经过了量身、设计、画板、裁剪、缝制等大大小小几十道工序。随着剪刀“咔嚓咔嚓”、缝纫机“嗒嗒嗒”声，老裁缝的好口碑迅速在邻里间传



开，许多人慕名而来，生意源源不断，原定两天完工的生意，后来延后到一个星期。

那年姐姐15岁，初中刚毕业，父母和老裁缝商定姐姐拜师学艺，地点就在我家，临街10多平方米的工作间。第二年老裁缝回长乐去了。父母托关系让姐姐到凯旋服装厂学艺。后来姐姐辞了工作，在自家干个体。量体、裁剪、缝纫、熨烫、飞针走线，“嗒嗒嗒”的缝纫机声，清脆地从小巷里传出，直到姐姐出嫁。

姐姐出嫁后对裁缝依然情有独钟。50年过去了，裁缝这一“香饽饽”逐渐被人们淡忘。人们纷纷选择网购成衣，但是网购也给老裁缝带来新顾客，或大或小都要拿来改一改。小小针线活“改”出一片新天地，渐渐地，人们也从姐姐手中看到岁月留给“手艺人”的痕迹。姐姐说：不是为了钱，看着他们烦恼而来开心而去，真是高兴。

五福巷的故事，说不完道不尽，想起来还倍感亲切、暖心，如一帧帧老照片，记录的是岁月无法抹去的温情。

话说“半旦节”

翁梓健

福州方言“做半旦”在年长者耳中一定是再熟悉不过的词汇。“半旦”其实也称为“半段”或“半丈”。福州“半旦节”，是福州地区一个特有的村庆节日，也是福州地区一年之中最隆重的节日之一，其热闹程度不亚于春节。福州民俗专家方炳桂曾介绍，“做半旦”即为“夏收夏种”，一年时间过半之后庆祝上半年的丰收，答谢农忙时亲友的“换工”等帮助。“半旦节”的周期较长，但有个特点，一定是在农历七月之后，并且各家各户轮流操办。“半旦节”闹得最有名的应属福州市闽侯上街一带，那里流传着“九月起，不买米”的俚语，说的便是闽侯上街这一地区从农历九月起，就天天有村庄“做半旦”，村民们可以轮流请客吃饭，不用在自家做饭。这也说明了“半旦节”其实就是一个食俗节庆，更准确点说，其实“半旦节”是一场庆丰收、农工总结的农事活动。

有人认为，“做半旦”其实就是福州人口

中的“菩萨诞”，他们认为福州方言发音的“半旦”，也可称为“半诞”或“搬蛋”。在宗亲观念较强的地区，“做半旦”一般都是由村落中德高望重的长辈组织族人或村民在宗祠里共同祭祀祖先，每年在先祖生日的这一天，全村人共同祭祀“神诞”，祈求平安，同时，也祭土地，以庆丰收。但实地调查中许多村落甚至一条马路之隔的邻村在“做半旦”时，并没有祭神仪式。这便与人们所说的“半旦节”就是“菩萨诞”相违背。笔者就这个问题咨询过许多村民，连一些老人都只能用“都是这么传下来的”来概括。也有的人认为“半旦节”其实就是中元节。中国自古将正月、七月、十月之十五日分称为上元、中元、下元。正月十五日称为上元佳节，即元宵节；农历七月十五日称为中元节；农历十月十五日称为下元节。福州民俗专家方炳桂曾表示，中元节，俗称“七月半”，即农历七月十五。因为“七月半”又叫“鬼节”，在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烧香



祭鬼、谨言慎行。相对国内其他地方，福州少有人过“鬼节”，多数人把这天当成尽孝之日。因为中元节的起源与佛教的“盂兰盆会”有着密切联系，在佛教中被称为“盂兰盆节”。“盂兰”是梵语，有倒悬之意，盆是指供品的盛器。他们认为供此器可解救已经逝去亲人的倒悬之苦。相传，目连为减轻其母亲的罪孽，邀十方僧众做盂兰盆，用以普度超生其母，因此“中元节”又有“孝子节”之称。2010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申报的“中元节（潮人盂兰胜会）”入选了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也许正是因为中元节为农历七月十五，并且越来越受人们的推崇，而福州有的地方的村民也在这一天操办“半旦节”，久而久之就有了“半旦节”就是“中元节”这一说法。就福州“半旦节”是否是“菩萨诞”或是“中元节”，还有待更多的学者们考究与论证。

但在对现有资料的检索中，笔者发现了一

个与福州“半旦节”极其相似的节日——“半年节”。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的佳山坞村，流传着800多年历史的“半年节”。早期在福建闽南地区的漳州人和泉州籍的同安人，也保留着“半年节”的习俗，就连台湾早期的漳州籍、同安籍人士，也都保留吃“半年圆”的习俗。而最具特色的，便是分布在中国西南一带的瑶族，他们的“半年节”，也叫作晒衣节，是瑶族重要性节日中仅次于过年的第二大节日。瑶族人将年中间的六月初六这一天定为“半年节”，并将“半年节”定于早上过。因为早年间的生活条件差、生活水平低，人们只有在特别重大的日子里才会多准备一些好吃的，甚至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吃到荤菜。同时，当时的医疗水平低，许多老人挨不到过年就已病逝，据传他们很想过一个年，阖家团圆，却不能得偿所愿。瑶族的年轻人们为了满足老人们过年的愿望，就将六月初六定为半年节，在这

天准备好吃的东西，和过年一样。也正因为过去生活水平落后，每逢过年，大家为了阖家团聚，才会将食物准备得异常丰盛，但也招引土匪山贼们伺机抢劫。人们为了躲避土匪，赶在大早上把年过了。后来，在早上过年的风俗就延续了下来，也影响着“半年节”。瑶族人最具特色的风俗习惯应属在“半年节”晒衣，在这一天，瑶族人没有任何忌讳，都将自己的衣服拿出来晾晒，甚至老人过寿时准备的寿衣等各式各样的衣服都晾晒于阳光下，吸引着小孩嬉戏其间，也为这个节日增添了一番热闹与风味。

“半旦节”究其根本，还是以宴请亲朋好友相聚吃喝的“食俗”为主。“半旦”亦是“半丈”，而“半丈”即为“五尺”，“五尺”在福州方言里是“有喝”的谐音。因此“半旦节”在民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操办“半旦节”的家庭邀请的宾客，可以携朋带友，从而，便有许多陌生面孔聚焦东家“做半旦”，场面十分庞大热闹。久而久之，年过半载，闲暇之余的村民们相互庆丰收、总结交流农作经验就演变成了以宴请吃喝为中心、炫耀自家经济财力的场面。再后来，许多村落借由“半旦节”演变出攀比、浪费、赌博陋习，渐渐失去本味。福州民俗专家方炳桂曾说道：“民国时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做半旦招待都比较简单，吃的拌面扁肉，喝的家酿的青红酒，同样其乐融融。”而现在的“做半旦”，文化气息少了，攀比性质的请客风气却逐年高涨，有的人家中更是摆上几十桌，花重金请来一



些商业明星在饭宴上表演，像是在给认识的或不认识的朋友“炫富”。在田野调查中，也有一位老人家表达了心中的无奈：“因为邻家的年轻人在深圳工作，每一年的9月份都会拖家带口回老家操办‘半旦节’，因两家关系好，常年都宴请他们。可近几年，邻家的‘半旦节’越摆越奢华，规模越来越大，导致自家的年轻人在‘做半旦’回请时，需要节省日常的开销甚至向亲戚借钱来操办。”这种“面子”上的礼仪被放大，扭曲了原本“半旦节”的初衷。

“半旦节”这一村庆活动，作为一种社交活动的载体和形式，是一个以“友情亲情”为主题、“饮食”为内容、“交流”为目的的民俗节庆活动，村民间呼朋唤友，不论认识与否都热情相聚，图的就是一个喜庆热闹，分享喜悦。“做半旦”的经久不衰，体现出福州人骨子里的热情与好客，福州人虽不善表达，但他们借“半旦”这样豪放的习俗表达心意，这才是应该让后人传承、保护的优秀民俗文化。

东渡扶桑谱新篇

戎章榕

2017年12月27日，对于福州开元寺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由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公明党干事长井上义久率领的日本代表团一行30多人，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等人陪同下，到访福州开元寺。

日本代表团是出席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七

次会议，取道参访福州开元寺的。福州开元寺与日本的关系源远流长，这些年来，几乎每年都有不同批次的日本客人到访，并不为奇。

但是，这次不同凡响。

据《人民日报》报道：到访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了二阶俊博、井上义久及其率领的代表团。习近



日本代表团参礼空海大师立像



开元寺方丈本性禅师当日向到访客人赠送墨宝

平赞赏两位干事长为促进两国务实合作和民间友好做出的努力，并对中日关系未来发展提出了希望。

会见的规格这么高！媒体和有识之士由此纷纷反观或重新解读日本客人福州开元寺之行。

“吉缘”“吉福”“吉善”，福州开元寺方丈本性禅师当日向到访客人赠送他的墨宝，这“三吉”或许能够道出事情原委。

二阶俊博一行的造访是因为日本僧人空海（弘法大师）当年作为“学问僧”，入唐时曾在开元寺驻锡、修学，从此结下了一段千丝万缕的

因缘。空海大师在长安驻锡修学回国后，在日本和歌山县的高野山开创了日本佛教真言宗，即唐密，成为一代高僧祖师。而和歌山县正是二阶俊博的老家。

在空海大师到访福州开元寺后49年，日本智证大师圆珍专程来福州开元寺研修，回国十年后被推为日本第五代天台宗座主，开创了日本佛教天台宗寺门派，即台密。圆珍与空海关系非同一般，他是空海在俗时的侄外甥。空海大师、圆珍大师与福州开元寺的因缘，堪称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当本性禅师讲起福州开元寺与空海大师、圆珍大师的渊源，开元寺因此被誉为“日本真言宗和天台宗的祖缘之地”时，二阶俊博先生不由得脱口而出：“心中炽热。”

2019年1月9日，为加强中日禅文化交流互鉴，由福建省佛教学院院长本性禅师率团前往日本，举办“中华禅·海外行”文化交流活动。

日本之行，是受邀也是回访。

抵达东京的当天，本性大师一行即受到二阶俊博先生的会见。二阶俊博拿出2017年底到访福州开元寺的照片，动情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让现场的日本国会众议院议员冈下昌平、日本国会众议院原议员冈下信子、日本友人木村朝映、日籍华人青山惠美等陪同人员无不动容，宛若亲历。

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二阶俊博的这一举动，令本性禅师感同身受，难以释怀。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本性禅师精心挑选一组照片，发到他



福州开元寺空海铜像



双方共同种下的象征中日友谊的桂花树

的微信朋友圈：既有二阶俊博近年来活跃在推动中日友好交流交往的政坛上的风采，也有2017年底日本代表团参访福州开元寺期间，双方共同在开元寺内植下一株象征友谊的桂花树的照片，还有此次会见时拍下的二阶俊博与本性禅师互赠纪念品的情景……

二阶俊博是日本政坛致力于中日友好交流交往的著名政治家，2015年曾率3000人访华，交流团成员既有日本参众两院议员、现任中央及地方政府官员，也有日本友好团体、专业协会代表，还有普通游客，涉及经济、文化、旅游、航

空、新闻等多个部门。如此大规模的交流团访华受到外界的广泛关注。对此，他表示，只有交流才能缩短距离。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本性禅师此行日本，是作《空海入唐，隐元渡日——由两位高僧事迹看中日文化交流互鉴》的主题演讲。他以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的中日交流为视角，深入浅出地阐释了空海大师“身、口、意三密相应”、隐元大师“儒、释、道三教融通”的佛教思想特色，剖析了他们对日本佛学、教育、文学、艺术、饮食、社会事业、国民性格、民族精神及对中日两国友好交往的深刻影响。

在日期间，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总领事詹孔朝会见了本性禅师一行。詹孔朝对交流团在日本举办的系列活动表示肯定，他说，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日关系也有很多重要的节点，2019年G20（二十国集团）峰会在大阪市举行，中日关系能取得更多更大的进步，获得更好的成果来造福两国人民。他还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努力为中日两国民间友好往来做出贡献。

总领事一席话，让本性禅师怦然心动，若有所思。他首先想到了空海大师，不论是大师“入唐初地”“第一驻锡地”的霞浦赤岸，还是“入唐首刹”“第二驻锡地”的福州开元寺，都与他有着直接的关系……

访日回榕后，他再度回忆起詹孔朝总领事的一席话，觉得意味深长。一查资料，再度怦然心

动。2019年既是空海大师诞辰1245周年、入唐求法1215周年，也是空海大师入定1185周年，日本高野山真言宗“空海赴长安之道访中团”成行35周年。四个“5”交集，因缘诸胜啊。

心动不如行动，一项谱写中日两国禅文化友好交流新篇章的构想在他心中再再生成……

他首先想到了从霞浦赤岸到西安青龙寺的“空海入唐之路”——与福州开元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空海入唐之路”。他多么希望，能将这条直线2400公里的“空海入唐之路”拓展为“海上丝路佛教之路”，让每年前来霞浦赤岸、福州开元寺的日本信众，在拜谒开宗祖师之后，再沿空海当年往长安的路线，一路寻访空海足迹。

“空海入唐之路”是中日佛教交流互鉴的一个经典范例。本性禅师决定从家乡霞浦、福州开元寺说起，整理有关资料，讲述空海大师入唐之路的故事，出版一本这方面的书。他相信，如果大家都能从自身做起，从身边事做起，以心交心，以情换情，相向而行，相向融合，就能由点成线，由线到面，蔚为壮观。

“桃李不言随雨意，亦知终是有晴时。”本性禅师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各国间佛教文化的交流互鉴——2019年12月20日，第二届南北传佛教国际学术论坛在泰国曼谷召开，论坛主题为“南北传禅法的理论与实践”；2019年1月开始，“中华禅文化海外行”分别于1月、3月、5月、12月走进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这已成为福建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的品牌项目之一。



霞浦赤岸，空海入唐之地

此外，这些年来，本性禅师的著作还在斯里兰卡和印度出版英文版，在韩国出版韩文版，为构建“海上丝路佛教之路”添砖加瓦。

本性禅师深感丝绸之路展现的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之珍贵。不论是“海丝”还是“陆丝”，都以经济合作为基础和主轴，以人文交流为重要支撑，开放包容的合作理念蕴含其中。历史上不论是闽籍民族英雄林则徐书写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还是隐元禅师在日本万福寺留下的墨宝“法门无内外，大道无遮拦”，都集中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品格。

中日两国文化一千多年来的交流，也包含着如鉴真、隐元、空海、最澄、圆珍等大师的努力。重启“空海入唐之路”的一小步，就是开拓海上丝路的一大步。

“让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阳光普照世界！”本性禅师默默祈祷……